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管中祥　博士

校園廣播做為田野實踐的可能與反思：以中正大學鳳梨急行軍《急行軍講東講西》為例

研究生：洪育增 撰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

誌謝

2018 年 6 月的某一天，完成了一份課堂期末報告的提案之後，赫然想起好久沒有跟指導老師管中祥聯繫了，於是也傳了一份給正在臉書線上的他。他才回了一句「看起來比之前都好」，我就爆哭了。後面的討論也沒有減少過，直到「這是個很值得討論的題目」這句出現時，眼淚更是不可遏止地傾瀉著。我已經好久、好久無法正視自己的論文問題了，也換過了很多次題目，每次都興高采烈地覺得這個題目 OK、那個題目有趣，但實際提筆時卻是設想不周全。管大的邏輯思維一直都是很清晰的，所以常常一語道破核心，然後我們迅速地結束 meeting。我常常不知道自己要設想的多周全、邏輯要怎樣才能進步到一一與老師對話，甚至不會馬上被老師的問題問倒。總是對自己很失望，做不太到這般進步，反而無止盡地下修自己的標準。(尤其本來就不是個高標準的人)

這篇論文的可讀性與趣味，完全要感謝鳳梨急行軍成員們的協助，而如果有不足之處，那就是身為寫作者的我必須加強的部分。同時，今天這份論文的成就應該要歸功於多年前那個在山城裡的一切與環境。沒有當時出入田野的夥伴與經驗，就沒有後續的反思與回饋。尤其，我始終不知道該如何回饋在田野中遇到的團體或個人，當他/她無私地與學生相處、共同擁有生活時，學生離開後，還可以做到哪些回饋呢？我預知著自己在田野環境的離開，所以不敢付出、實踐田野，捫心自問的是：「都注定會離開的人，是要培養什麼情感呢？」

所幸在研究的歷程中有鳳梨急行軍的夥伴讓我借鏡，在實踐田野的過程中看到夥伴們不同的思維與想法，我也逐漸明瞭許多事情沒有絕對的對錯，僅是「選擇」而已。假使我不敢付出田野、不敢投入其中，那就是選擇一種旁觀的視角觀看著這一切；假使我選擇跟著夥伴們一起進入三興村，一起瞭解田野中的村民與生活，那就是選擇較為主觀的視角，試試看能與村民之間共存哪些回憶與經驗。這兩種視角我都曾選擇過，也因此使得這篇論文大概是依循著這樣反覆、游移的節奏而前進。

碩士班的生活裡，感謝有容璟、昱青、麒元、妙妙等人的陪伴，生活裡充滿歡樂與苦澀，但前者仍是居多的。因為有同儕，研究之路才不孤單；因為志趣相同，你知道說什麼內容他們會笑會哭會感心。也謝謝鳳梨急行軍的夥伴，帶我進入田野，邊做邊學，探索深藏在內心的叩問。更謝謝爸媽，無止盡地支持我走到這個境地。「什麼時候才要畢業？」是很多家長心中的疑惑，他們也曾疑惑，但感謝他們，最後選擇相信。

另外，特別要感謝的是人生中不同時期的摯友，俞君、亦晴、宥蓉、芷寧、郁君、志龍、喵喵、一涵、南潔、佳霖、詠潔等人，在我困惑無助時，給了許多的幫助與療癒。還記得某些時日，收到來自遠方的祝福與問候，一句「寫不到畢業也沒關係，妳終究會是妳。」就讓人知道不能再自責渡日。最後想要跟多年不見的 D 說聲抱歉，實際讀了研究所之後，我也才知道你當時的處境與困難。

寫論文的過程需要一個決心與定力，無論是個質量如何的論文，必然都是花了每個人許多的心力才走到這一步。我也是在寫作的過程中不斷地質疑自己，步步質疑，卻也步步走向完成的境地。需要一個規律跟耐心，找到自己可以定下心的方式與時間，反覆思索著那些內容與字句，或者在文獻裡與自己對話，一路走來都是孤獨的，尤其當你發現自己所學的是社會科學，不是什麼社會上旁人津津樂道的理工派、管院派。屆時還是要告訴自己，這是一條值得走一遭的路，至少到目前為止我仍然很開心自己走了這條路。

誌謝是我完成論文的開端與結束，更是寫作過程中的動力，這聽起來著實荒謬，但我真的很想深刻記錄著這一路以來的點點滴滴。先感謝願意閱讀至此還沒闔上的你/妳，這份論文真的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甚至是邏輯、思路、想法上非常弔詭的地方，但如果你/妳還願意看完並且有收穫的話，那應該要給自己一個掌聲，因為在這過程中，妳/你拋除了部分的自我理解與認知，融入了我的寫作思維之中，才有辦法撐住看下去，並且還覺得有收穫。而這些在寫作的前、中、後過程中層出不窮的困惑與矛盾，也在寫作即將進入尾聲時一一地被解決了。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口試期限將至的壓力所致（笑），但更確定的是，有些問題想著想著，就沒有問題了，時間會給個答案。

最後的最後，要感謝指導老師管中祥，花了許多時間包容我、和我一起討論，真的是除了感謝之外仍是感謝！也謝謝口試委員唐士哲老師、劉明浩老師，有你們的鼓勵與祝福，這篇論文才得以問世。

Local
謹誌於 嘉義縣民雄鄉
2019.01.27

校園廣播做為田野實踐的可能與反思：
以中正大學鳳梨急行軍《急行軍講東講西》為例

《摘要》

本研究以中正大學藝術性社團鳳梨急行軍製播的廣播節目《急行軍講東講西》為核心，藉由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探討此一學生組織在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 月此段區間所製播的 26 集廣播節目過程中，如何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出具有特色的田野調查方法，並且在這過程中如何利用學生團體的力量，扮演大學與地方之間的橋樑。

研究結果發現，可以藉由 6 位成員參與《急行軍講東講西》節目製播的經驗，歸納、總結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的方法與途徑，但由於每位成員各有其背景與困境，因此在方法與途徑上亦有略為不同的表現。同時，本研究亦歸納出參與田野調查的個體該如何在互動的過程中累積經驗，形成一套方法。上述方法的產生皆是逐步建構而成的，並可在這之中觀察到 6 位成員如何進行相關的省思與後續行動。除此之外，亦可瞭解到「大學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關係並非一體適用的固定模式，反而需要理解其因地制宜的獨特性。

關鍵詞：三興村、中正大學、大學與地方、田野調查方法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參與的歷程，問題的堆疊 1
第二節 田野理論與實務的反思 3
第三節 行動的介入 問題的挖掘 4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對象 5
第二章 大學與社區 9
第一節 從世界局勢看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 9
第二節 以日本「地方創生」發展為例 12
第三節 台灣的「大學與社區」互動關係 13
第四節 中正大學與三興村之間的互動關係 18
第五節 小結 22
第三章 鳳梨急行軍如何串聯中正大學與三興村 24
第一節 什麼是鳳梨急行軍 24
第二節 什麼是《急行軍講東講西》？ 25
第三節 鳳梨急行軍如何製播廣播節目？ 26
一、從紮根理論看鳳梨急行軍的製播方法 26
二、鳳梨急行軍製播節目的準備 27
三、小結：試著做出以「人」為本的節目 31
第四章 《急行軍講東講西》田野現場 32
第一節 從認識開始 32
一、該海撈村民還是建立人脈？ 33
二、該如何現身？ 37
第二節 從交流累積信任 42
一、關鍵事件「你、我」一體 42
二、從生活到相處 47
第三節 從信任到廣播製播 59
一、庶民的生活、生活的庶民 59
二、節目主題如何制定？ 61
第五章 鳳梨急行軍的省思 64
第一節 節目製播結束後的檢討 64
第二節 迷惘與省思 66
第三節 我與村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77
第六章 結論 84
第一節 鳳梨急行軍的田野調查方法如何形成 84
一、鳳梨急行軍田野調查的方法 84
二、田野現場停看聽 88

第二節 急行軍如何形成大學與地方的橋樑.....90
第三節 研究後記.....92
參考文獻 94
附錄 1：《急行軍講東講西》第一季至第三季主題簡介 **..... 96**

表目錄

表 1：受訪者基本資料 **..... 8**

圖目錄

圖 1：國立中正大學特定區計畫示意圖 **..... 20**
圖 2：受訪者黃詠潔移動路徑圖 38
圖 3：第一次拜訪李伯，李伯(中)向鳳梨急行軍介紹家族歷史**..... 44**
圖 4：受訪者宋慧昱所述內容圖示化**..... 46**
圖 5：鳳梨急行軍廣播製播田野調查方法圖 **..... 85**
圖 6：參與者在田野現場的方法產生及過程 **..... 8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參與的歷程，問題的堆疊

一項從 1994 年開始推動的政策，深刻地影響著我截至目前為止的生活。

我大概是從國、高中開始，參與所謂的「社區營造」活動。1994 年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那一年，在傳統生肖的安排上剛好輪到「雞」與「狗」，因此有這麼一群被戲稱為「雞飛狗跳」的生肖群體誕生，而我，身在其中。包括這群「雞飛狗跳」的群體以及之後出生的個體們，各個擁有著更不同於早期台灣的生活型態及樣貌。唯一不變的是，終於有一項政策看似可以好好地跟「北漂」抗衡，但又好像沒有。而在這項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裡，人們更能意識到什麼是社區、什麼是營造，「一鄉一特色」也在平凡的生活中有了形形色色的雛形與模組。

在這些體驗、參與的經驗裡，伴隨著年年歲歲的增長，我發現自己在田野現場中存在著許多迷惘。而我也試圖在梳理迷惘的過程中，找到一個出口與方法。

田野現場迷惘二三事——從小時候談起

要參與社區營造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著手的起點是好奇、疑惑。當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社區每年舉辦的夏令營課程，尤其我和妹妹報名了一堂最冷門的課程「北管課」。即便暑假已經到了尾聲、甚至夏令營早就結束了，老師傅還是繼續指導我們。每首曲子的口白與樂器練習，交織出了台語對話的日常，每次酬神與開鑼的瞬間，也更讓人深刻地記取何謂看門道而非看熱鬧，烙印在腦海裡的不僅只有音韻，還包括對於這項在地傳統文化的歷史與未來。

但當時的我不願面對「傳承」這件事，我覺得學習北管是重要的，但我不知道自己值不值得、是否承擔得起傳承這項技藝的重任。老師傅當時曾說，有人質疑他為什麼要教這兩個女孩子北管？在傳統觀念裡，女孩子未來是要嫁人的，怎麼可能幫忙在地傳承這項傳統技藝呢？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面對老師傅期待的我，後來就以課業繁忙為由，沒有再去參加練習。而後來這樣的躲藏行為也被老師傅發現了，老師傅一句：「唉，看妳回來都躲的遠遠的哦！」讓我驚覺自己那種「不知道該怎麼回應」的迷惘，是多麼的重如泰山、亦是輕如鴻毛。

在未知的田野場域裡——透視大學時期的社區參與經驗

2013 年夏天，當時還是暨南大學經濟系學生大一升大二的我，因緣際會下加入了學長姐在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的一項參賽活動，在那半年以來，為了策劃小旅行、深入瞭解在地，我們進入南投縣魚池鄉的仙楂腳社區、深入田野、甚至利用暑假期間進行為期 2 週的蹲點生活。

仙楂腳社區是一個遠離塵囂、四面環山的茶鄉環境，坐落於暨南大學與日月

潭之間，騎機車的話，距離暨南大學約莫 30 分鐘的車程。為了深入在地，我們認識了在地的老茶農、返鄉青農，體驗茶鄉生活、跟著茶農們在晨起的雲霧繚繞之中尋找一心二葉，在烈日下跟著烘茶、揉茶；即便滿手小黑蚊的印記，也忘不了茶農們熱情款待的筍乾有多麼的入口回甘；更難以忘懷的是，每次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總能喝上一、兩杯最道地的紅玉紅茶、阿薩姆紅茶、蜜香紅茶等。所有關於茶鄉的知識與身體記憶，都在當時刻劃於心頭上。那時才發現，原來所謂的「蹲點生活」比字面上的理解與想像還困難，包括如何真正進入當地居民的生活之中？如何在日常的枝微末節裡看見清晰的社會脈絡與思考？這都是當時的我所無法理解與實踐的目標。

後來，伴隨著參賽活動的順利落幕，我也逐漸離開了仙楂腳社區。當時我心裡有無數個納悶，最主要的癥結點是——「我無法對自己交代」，在這個心裡與地理距離很遠的社區，當我田野結束、離開後，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和村民維繫著彼此的關係呢？

我們是朋友嗎？或許是。
我們只是來做作業的學生嗎？不太是。
我們只是完成短程計劃就走的學生嗎？大抵是。
那我們離開之後社區居民一樣日復一日地生活著嗎？想必是。

離開了之後該維繫點什麼樣的情感？或者做點什麼事嗎？關於這個問題，我始終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也帶著這樣的疑惑，繼續在大學期間隨著課程或者其他活動，在埔里的其他地方進行田野協作等，僅有偶然的機會，能夠路過那些曾經被拜訪的茶農家門口，但卻再也不知道該如何走進茶農的家、與他們促膝長談了。我開始不知道和這些曾經合作過的居民們在時隔幾個月、幾年之後，我該如何「現身」？「現身」的第一句話該如何開始？要從哪裡說起？彷彿連開口說上一句話的能力都消失殆盡。

當時，我所有的田野經驗與認知是透過邊學邊做、逐步建構起來的。我不斷地在自己的認知與經驗裡建立一套 SOP 系統，讓自己在每次踏入新的場域時能有面對、適應的能力，但是無論我怎麼歸納與探詢，當時沒有上過任何與研究方法相關課程的我，即便看著學長姐、老師們如何以「和村民當朋友」的心態出發，但始終感到困惑的是，這些因為田野關係而建立的情感該如何繼續維繫、延續或割捨呢？

第二節　田野理論與實務的反思

2016 年 9 月，搬到民雄的那時，我參與了中正大學鳳梨急行軍舉辦的「走踏三興村」活動，當時我還只是初來乍到所謂的「三興村」、「中正大學」，甚至預計讀個兩年就離開此地的研究生。想報名走踏活動的理由只有一個——因為沒什麼認識的人可以帶路，認識在地就靠這個活動了！至於為什麼認識在地是重要的？當時我心底沒什麼想法，是直到後來我才發現，這一切都與自己急於尋求的「在地認同感」有所相關，其實我不是個只是想走馬看花認識環境的人，更真切的是，我想跟著此地的人、事、物休戚與共，將自己融入在地的生活與環境之中，「歸屬感」是我在求學歷程中多次遷移的過程中，最想追求的安定。

後來的年年歲歲中，我在研究所的時間超過兩年、也在這段過程中參與了鳳梨急行軍的各式活動。藉由和同伴們一起進行田野調查的方式，著手於民眾劇場的實踐與發想，將地方上的真人真事化為劇場上的肢體與劇本，並輔以實際的田野感受，揣摩鄉民們的情感與生活。也曾經跟著同伴們一起製作廣播節目，為了讓節目的內容更具意義與真實性，總會找些空暇的時間到村子裡拜訪村民、邀請村民錄製廣播內容。

萬事起頭難——田野現場的初探與延續

起初，我並不知道怎麼進入田野，尤其不同於過往有師長、學長姐帶領的經驗，三興村這樣一個對我而言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只能相信鳳梨急行軍這樣一個學生團體。開口的第一句話該說什麼？要用「我」還是「鳳梨急行軍」的身分現身在村民面前？如果開口第一句話是打招呼，那第二句話該說什麼好呢？

踏入田野之前與之後的困惑總事層出不窮，像是：我們是在瞭解村民不是幫助村民對吧？怎樣的介入與參與才不會讓村民感到困擾呢？村民們是把我們當作朋友還是客人呢？每一次當下的叩問都是下一次再度進入田野的契機，然而，心中對於「因為田野關係而建立的情感」諸如此類的困惑卻始終未解。

追根究柢，我發現即便自己過往曾經有隨著課堂活動、課外競賽進行田野調查的經驗，甚至也在課堂上學習所謂的「質性研究方法」，但是在進入田野現場之前、之後、甚至是過程中，每一個未知的環節，都是令我備感焦慮的時刻。或許是過往的經驗累積中，仍有許多未被自己歸納、整理的內容，以至於仍不曉得如何做(How to)才是進入田野的最佳方式，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在未來的日子裡，延續著與村民之間的情感；也或許是課堂上的質性研究方法、田野調查法等內容並沒有實務上的操作與體驗，無法消除我心頭上的焦慮，使我變成了空有理論但卻無法實踐的人。

在研究所學習的過程中，透過學術與實務的交融呼應，我發現自己想探尋的答案，就是關於「如何在田野現場裡感到舒坦」的方法。我之所以無法歸納自己過往的田野經驗，即是因為在過往的經驗中，我總是以焦慮作結，例如：該如何跟村民打招呼？我總是邊焦慮邊打招呼；該如何在田野現場維持清楚的思慮？我

總是邊焦慮邊進行田野紀錄；該如何在田野調查活動結束後與村民維繫情感、保持聯絡？我總是抱持著近鄉情怯的心情焦慮地無法再與村民聯繫。所有焦慮的總和，在在顯示著我急於尋求、歸納出一套屬於田野調查的 SOP，但是田野現場真的有 SOP 可言嗎？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對於大學時期、學習著林林總總經濟學理論的我而言，舉凡是古典經濟學理論、凱因斯模型、完全競爭市場圖形與變化等，這些大千世界的經濟現象可以被模組化、甚至被預測發展概況，那麼應該也能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找出一套方法，將自己的焦慮與應對方式進行 SOP、系統性的整理吧？但姑且不論田野調查方法是否有 SOP 可言，換個方式問，田野現場是「需要」SOP 的嗎？我們都知道人與人的相處、認識無法被規則化，但卻在不知不覺的日常生活與習慣之中，想找出一套方法，並且循著這套方法，處理著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及互動、甚至是解決互動時的焦慮問題。「這豈不是一件很矛盾的事嗎？」屢次捫心自問後總是無語問蒼天。

第三節　行動的介入 問題的挖掘

在前期與鳳梨急行軍進行戲劇展演時，我對於田野調查活動的參與是非常零星的。而在後期，大夥兒為了完成製播廣播的目標，幾乎每周都要進入田野場域一至二次，如此一來才有辦法深入村民的生活之中。相較於一般的廣播節目製播，或者是新聞採訪過程，大多講求的是「效率」與「速度」，至於如何與受訪者之間累積信任感、培養關係？這類的要求相較於效率與速度反倒較為其次。但鳳梨急行軍製播廣播節目的做法卻也讓我耳目一新，著實地理解到原來有更不一樣的方式，可以維繫與受訪者之間的相處。

也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了「廣播」不單單只是個傳播媒介，也不只是急行軍預計的「聲音保存」成果，它還是一種隱形的媒介，橫跨於中正大學與三興村之間，甚至對於參與其中的成員們來說，在田野的意義上有著不一樣的突破與想像。尤其相較於一般的媒體採訪、課堂作業，鳳梨急行軍的廣播節目宗旨建立在「和村民當朋友」的目標之下，即便是錄製廣播時所需進行的採訪與互動，也都讓這段互動關係更加微妙。急行軍的成員該如何在維繫節目品質之餘又能與受訪者之間達到良好的互動？又或者怎麼樣才稱得上是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良好互動呢？這些都是需要實際的田野經驗才有辦法呼應的問題，也唯有呼應這些問題之後，我們才能知道，在未來的社會脈動中，該如何讓「媒體」與「在地」之間有更美好的聯繫。

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逐步從「田野現象」聚焦於「行動者自身」，並放大於「行動者的省思與歷程」，透過不斷地聚焦與放大過程，層層堆疊出屬於行動者個人的經歷與方式，盼能總結歸納以下提出的問題：

一、探討中正大學與三興村之間的關係及發展：
中正大學與三興村之間如何互動與發展？鳳梨急行軍的成員們在製播的過程中又有哪些發現？

二、探討鳳梨急行軍製播《急行軍講東講西》的田野歷程：
隨著廣播節目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中，鳳梨急行軍成員們有哪些尷尬、迷惘或者不知所措的經驗與困難？透過何種方式克服困難？有哪些新的發現與反思？

三、探討急行軍在田野調查活動過程中所衍生的方法：
鳳梨急行軍成員們如何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衍生出屬於自己的一套方法？這套方法有哪些更進一步的發展與可能？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使用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以及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進行。參與觀察是被用以涵蓋觀察和訪談的混合體；在田野中，研究者的目標是瞭解研究中的文化如何「運作」，也就是攫取那些住在漁村、寄宿學校或礦業社區的人們眼中世界的樣貌(Seale, Gobo, Gubrium, & Silverman,2004/許夢芸、陳育含譯，2012：415-416)。由於研究者具有參與鳳梨急行軍 2 年的經驗，包括參與民眾戲劇演出、廣播節目製播，以及平日的田野調查活動等。逐漸從鳳梨參與急行軍活動的過客身分，轉變成參與組織共識、討論的成員之一，因此在參與觀察法的運用上，除了有更為深刻的經驗可作為與受訪者對話的依據之外，也可做為研究者進行此份研究時的分析素材。

關於參與觀察法的運用與真諦，Seale 和其他學者也指出（2004），「參與」觀察一詞通常並非意味著真正的參與；研究者通常不需要捉魚、授課或採礦，取而代之的是觀察這些是如何進行，並偶爾「伸出援手」。至關重要的是足夠的參與，以便能發自內心地書寫出這種著作的本質：它的痛苦與歡愉、氣味與聲音、肉體與精神壓力(Seale et al.,2004/許夢芸、陳育含譯，2012：415-416)。Michael Angrosino（2007）也針對參與觀察法提出相關的建議，尤其是在關係的建立上，研究者不能假定地理位置靠近、擁有類似文化的社群，即是較容易研究的對象，同樣的道理，不要假定如果你研究的社群與你自己的社群十分類似，你就有辦法掌握如何與他們融洽相處（Angrosino,2007/張可婷譯，2009：45）。「不把所有事情視為理所當然」是 Michael Angrosino 認為研究過程中的最高原則。因此對研究者而言亦是如此，必須在「參與」與「觀察」之間拿捏適當的距離與角色，而這樣的課題也未必是輕鬆簡單的。

而在這段將近兩年多的參與觀察過程中，研究者也不斷地拿捏著自己的角色與態度。正如 Catherine Marshall 和 Gretchen Rossman（1995，轉引自 Earl

Babbie,1975/林秀雲譯，2013：472）說明研究者的角色時提到的，研究者可以規劃各種不同「參與者」（participantness）程度的角色——亦即，實際參與日常生活的程度。若以光譜兩端來比喻的話，其中一端的極端角色是「完全參與者」（full participant），當扮演此一角色時，研究者必須實際進入研究情境中所建構的一個角色或角色組（set of roles）的日常生活，Michael Angrosino（2009）也提到，在此種角色中研究者甚至可能完全不提到己身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Angrosino,2007/張可婷譯，2009：80）。而光譜另一端的極端角色則是「完全觀察者」（complete observer），研究者完全不介入社會互動，甚至刻意、避免涉入所研究的世界。Michael Angrosino 也建議，有時候我們會假設該文化的「在地人」(native)比較能夠與被觀察對象建立較為和諧的關係，但事實並非盡然如此，因為有時候「融為一體」反而會滯礙研究者進行研究的能力（Angrosino,2007/張可婷譯，2009：80）。也因此，研究者常常將自身的角色放置於這兩大極端光譜的中間，參與的同時，也觀察著。

尤其在每次的日常會議、活動結束後，若有較為充裕的時間，鳳梨急行軍的成員們大多會聚在一起，檢討、聊聊彼此的感受與想法，因此也讓研究者能有更多與其他成員休戚與共的機會，並且更能確定在共同參與的活動場域裡，其他成員的狀態及感想為何。上述的經驗也讓研究者與鳳梨急行軍的成員之間累積出更多的信任與共鳴，為本研究建立了一定的基礎架構。

在本研究中，同時也使用深度訪談法中的半結構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向受訪者進行提問。林本炫（2007）在討論不同質性研究方法的使用與分析時提到，所謂的「半結構訪談」就是事先設計訪談大綱，按照訪談大綱的提示和受訪者進行訪談。因此訪談大綱可以很正式，也可以很彈性，研究者可以按照各個受訪者的不同情形，彈性調整訪問問題的順序乃至於發問方式等（周平、楊弘任，2007：129）。以質性研究為專長的學者 Uwe Flick（1989）也指出，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可以達到重建主觀理論（subjective theories）的研究目的。所謂的主觀理論，指的是受訪者對於研究者的研究主題，有著豐富、複雜的知識（a complex stock of knowledge），而這些知識包含了一些清楚外顯，並且直接、可取用的諸多假定（explicit and immediate assumptions），受訪者在回應問題時，不太需要費盡心思就可以取用這些假定，並且直接回答問題，除此之外，人們還有一些內隱的假定（implicit assumptions），因此研究者必須使用各種不同類型的問題，藉以協助受訪者重建關於研究議題的主觀理論（Flick,1989/李政賢、廖志恒、林靜如譯，2007：132）。也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使用較為彈性的訪談大綱進行訪談，並輔以自身經驗，延伸訪談大綱的內容與提問，透過不同的假定內容，與受訪者建構更趨於研究議題的主觀理論、進行更全面的對話。

除此之外，鳳梨急行軍的組織分工多為水平分工，讓每一位成員皆有機會在參與急行軍活動的同時，也參與籌備、紀錄等工作。綜合上述原因，以研究者的經驗為例，研究者透過報名參加「走踏三興村」的活動作為起點，並再進一步加入鳳梨急行軍、參與組織開會、協助招生、參與戲劇演出與廣播製作等，將這些

「點」一一連成「線」，拓展為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場域與思考面向，更可進一步觀察其他成員們的變化與歷程。

尤其，田野調查的準備工作所需要的並不只有耗費腦力。另一個主要的問題是如何進入田野、研究場景的選擇以及允許進入的協商過程（Payne, G., & Payne, J.,2004/林育如譯，2012：149）。而這些歷程不僅研究者經歷過，更可以透過相同的經驗過程，取得其他成員的信任、瞭解更多關於田野調查的困境與解方。

因此，本研究將 6 位鳳梨急行軍的成員列為訪談對象（表 1），這 6 位成員皆參與了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 月、2018 年 3 月至 6 月，總共 26 集的廣播節目製作。而在本研究中，更是特別針對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6 月此段區間的節目製播經驗進行深度訪談，此段區間為鳳梨急行軍首度「踏出同溫層」，擴大節目嘉賓範疇至其他村民，因此在展開人際關係及開闢田野天地的情況上較適合作為研究內容。

鳳梨急行軍目前是中正大學校內的藝術性社團，在成為學生社團之前，鳳梨急行軍起源於 2014 年開始，由中正大學中文系與圖書館藝文中心共同推動而成的學生團體，配合相關課程與工作坊的發展，早期以民眾劇場等相關表演活動為主，並發展出兩部劇本——《三興村的滋味》、《人像顯影——滋味三興村》，近年來轉型為學生社團後則以廣播製播的活動為主軸。自鳳梨急行軍發展以來皆是以認識三興村為核心基礎，將在三興村田野調查到的資料整理為田野筆記，並且融入於戲劇表演以及廣播素材之中，因此在本研究的受訪者當中，有些人參加鳳梨急行軍的時間較長，因此田野調查的經驗較資深，對於三興村的認識與理解也較深厚。

如〈表 1〉所示，參與急行軍的資歷由深至淺分別為：黃顯淨、宋慧昱、郭育伶、許雅如、黃詠潔、黃釋賢，其中黃顯淨在鳳梨急行軍草創初期即擔任民眾劇場工作坊助教一職，針對鳳梨急行軍的發展除了有實際的體驗之外，更因此產生中正大學第一篇討論民眾劇場、三興村以及鳳梨急行軍的論文著作。而僅次於黃顯淨的民眾劇場參與次數，再來則是宋慧昱，也是相較於其他受訪者資深，甚至也因為透過鳳梨急行軍對三興村有所瞭解、認識，因此在其大四的畢業製作中，與研究者偕同黃詠潔，再加上宋慧昱的班上同學劉聰，共同完成中正大學第一支關於三興村的紀錄片《陳先生》。至於郭育伶與許雅如則是分別參與了鳳梨急行軍最後兩次、以及最後一次的戲劇演出，並且在演出前、後皆持續參與鳳梨急行軍的活動討論與讀書會等活動。至於較為資淺的黃釋賢與黃詠潔，則是一加入鳳梨急行軍即參與廣播錄製以及讀書會等活動。這些受訪者在資歷上的深淺雖然不足以做為所有田野經驗的參照，但卻也能在之後的章節中，看見他們彼此之間的差異，無論是想法上、行動上，還是視野上，都有各自不同的因應方式與特色，甚至也可看見每個個體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成長的歷程。

表 1：受訪者基本資料

姓名	背景 經歷	參與時間	受訪時間	訪問地點
宋慧昱	中正大學傳播系校友 曾參與戲劇演出，並以三興村為題材拍攝傳播系畢業製作作品《陳先生》，擔任導演與剪輯。	3 年	2018/07/27	嘉義市
郭育伶	中正大學成教系四年級 曾參與最後兩次戲劇演出	2.5 年	2018/08/07	北捷台電大樓站
許雅如	中正大學法律系三年級 曾參與最後一次戲劇演出	2 年	2018/07/25	嘉義縣民雄鄉
黃詠潔	中正大學傳播系二年級 曾參與傳播系畢業製作作品《陳先生》，擔任製片助理一職。	1 年	2018/06/27	中正大學社科院
黃釋賢	中正大學電傳所二年級 曾觀看鳳梨急行軍戲劇演出	1 年	2018/08/07	北捷市政府站
黃顯淨	中正大學電傳所校友 曾擔任鳳梨急行軍民眾劇場工作坊助教	4 年	2018/11/15	中正大學社科院

第二章 大學與社區

承接第一章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的說明，以及關於受訪者身分的描述，在第二章的內容中我們將探討大學與社區之間的關係，如此一來才有辦法在第三章至第五章的部分更清晰地思考，鳳梨急行軍的出現如何讓中正大學與三興村之間產生互動與連結。因此在本章節中，我們必須先將脈絡回溯到中正大學的出現與解嚴前、後的台灣社會發展之間有哪些關聯，以及整體世界針對大學教育發展的角度又有哪些影響與深厚的連結。

因此下面章節內容將會先從整體台灣社會、國際局勢的視野觀看高等教育的發展，再來從鄰近的國家——日本的案例來看大學如何與地方互動，接著則是回到台灣現場檢視近幾年來高等教育如何改革、如何與社區共同發展，最後再回到中正大學自身的經驗進行剖析，看看這之中有哪些的經驗與變化。

第一節　從世界局勢看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

解嚴後，台灣整體社會步入自由化的歷程，黃俊傑（2015）認為，21 世紀日益壯大而過度發展的教育市場化巨流，使得世界各國大學之理念不能免於知識的「數量化」、「標準化」和「商品化」的趨勢。舉例言之，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界過度強調「產業合作」或「研究成果商品化」等考評指標，大學爭排名，教授計點數，其實對大學之理念傷害甚大（黃俊傑，2015：5）。也因此，黃俊傑藉由戰後世界史、戰後台灣史，爬梳大學理念與實踐發展的歷史脈絡。從戰後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二戰結束後，世界的高等教育可以分為：1945-1980 年代、1980 年代中期-2000 年，以及第三階段的「21 世紀」，也就是 2000 年以後。

在第一階段（1945-1980 年代）中，美國成為世界霸權，也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佼佼者，高等教育的擴張史無前例地快速成長，不僅人人可自食其力上大學，若畢業後要尋覓教職也是供不應求。而在台灣，配合著七十年代以後經濟起飛的相關政策發展，教育彷彿是為了經濟發展所存在的，像是 1965 年的「經濟建設計畫」，以及 1980 年代後期由國科會（現為科技部）成立的新竹科學園區等，配合國家政策發展著相關的人力資源與產業。同時，隨著 1987 年 7 月戒嚴令的頒布，使得社會上有了階級流動、教育普及的動力。

發展到第二階段（1980 年代中期-2000 年）時，世界各國的大學擴張速度也逐漸向美國看齊，「如何提升教育品質」也成為首當其衝的問題，也使得「教育改革」成為各國努力的方向。(黃俊傑，2015：12)台灣為了推動教育改革而在 1994-1996 年成立層級與教育部平行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簡稱「教改會」)，由當時剛回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領導，漸漸使教育從菁英走向普及，從管制走向自由的方向發展，但也激起了許多問題，引起社會各界人士對教改運動的批判。像是 1994 年 4 月的「410 教育改造運動」，「廣設高中大學」的訴求使得平均每個縣市具有一所大學，甚至是 1994 年李遠哲提出的「教授治校」理念，對教育改革也有著或優或劣的影響。

而到了第三階段（21 世紀、2000 年以後）受到全球化的影響，知識經濟

（knowledge-based economy）發展的時代接踵而至，尤其在高科技發展的輔助之下，大學的研究與服務開始與過往有很大的差異，包括翻轉教育等教學方式。當教育現場回到台灣時，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系所的劃分越趨細緻，但同時結合產業發展的狀況下，系所的發展又朝著知識重新整合的方向邁進，於此同時也正呼應著少子化的困境。但是究竟大學的理念何去何從呢？一直是這三個階段中不斷需要反省的問題。

我們更可從中發現，從第二階段開始，「大學」不只存在於都會區，更開始湧入社區、竄進鄉間，楊思偉（2009）也曾提出相關的隱憂，包括：大專院校過多及未來少子化之威脅、公部門教育經費編列減少之趨勢、研究型大學成為百大之目標、一般大學提升教育品質之社會壓力、大學培育人才與產業需求之結合、如何提升科技研發、大學生就業等（2009，轉引自 Kerr,1993/楊雅婷譯，2009：9)。楊思偉更指出，1994 年廣設高中大學的當時，台灣社會經濟處於較佳的狀況，高等教育入學率也已進入普及階段，因此高教入學率逐年增加，加上鼓勵私人興學，技專校院升格為學院和大學，大學校數達一百六十餘所，使得高等教育呈現一片榮景，從經濟環境與政策層面等條件中，促成高等教育進入馬丁·特羅（M.Trow）的後普及化之「普及管道」（universal access）階段。但事隔不久，即出現大學生素質下降、十八分或七分就可進入大學、部份私立技專校院逐漸招生不足、專科紛紛停招改設學院、教學品質受到質疑等（2009，轉引自 Kerr,1993/楊雅婷譯，2009：9-10)，同等的代價與批判也在社會上逐漸發酵。

在大學生滿街跑的情況下，「18 分上大學」不再只是 2007 年大學指考的新聞，反而成為台灣教育改革頗受爭議的語詞，因為之後還出現更低分的情況——7 分、10 分、14 分……，演變到後來，幾分上大學已經不重要了。受到少子化浪潮的影響，反而變成「幾年後有大學」的疑慮，廢校與併校的爭議層出不窮，當年的「廣設大學政策」如今變成「廣收大學生」的異相，竄進鄉間的大學生們又在不知不覺間，被收編到都市邊緣、城市的交界，莘莘學子們還到鄉下讀大學嗎？或許依舊是看分數也看機緣呢？這些層出不窮的問題也正是美國學者柯爾（Clark Kerr）（1993）所探討的「大學之理念到底何在」之問題，其理念鐘擺之兩端不外乎以下幾項（Kerr,1993/楊雅婷譯，2009：11)：

●辦學應重視人文與歷史——還是重視科技發明
●理念應該儘量超脫——還是重視功利與實用
●辦學效能應以教學為重——或重視研究成果
●學生應被指導成完人——或培養成技術性專才
●學習應重視博雅教育——或是某種學科專業之發展
●大學規模應該有所控制——或是愈大規模愈好
●校長應做學術人格之楷模——或是掌管知識之經營者

大學與社區、國家之間，應該以什麼樣的關係維繫呢？以 19 世紀的美國為例，形塑美國大學體制的兩股主要力量分別為「捐地運動」（the land grant movement），以及從二戰期間開始，聯邦政府對於科學研究的支持，這些力量來自於與大學相關的外部資源，同時也呼應著全國的需求。然而，其實這兩股力量之間是互相衝突與矛盾的，以聯邦政府支持的科學研究為例，正是希望大學做為國防、科學、科技發展的角色，透過學術的角度提升國家的發展與戰力。相反地，「捐地運動」是為了回應上個世紀中因美國快速的工業及農業發展所引發的重大關注（Kerr,1993/楊雅婷譯，2009：43）。「捐地運動」的力量源自於林肯總統（Abraham Lincoln）在 1862 年簽訂的〈莫里諾法案〉（the Morrill Act），在這之中，大學必須負擔起輔助發展的任務，藉由相關的訓練，創造出超乎教師、牧師、律師、醫生等之外的人才，並透過農業、製造業的科技發展等相關研究，再加上社會許多面向的服務，最終目標在於服務社會上所有經濟與政治層面的事務，並且削弱菁英階級壟斷知識的現象，開啟一個相對較無階級意識的社會型態，也讓大學不再只是知識的象牙塔，必須與外界對話、交流。

而當視角回到台灣，在上述描寫的歷史脈絡中，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大學湧入地方、社區後，又在上述浪潮的影響之下，產生了哪些關係與發展呢？大學與地方之間的關係與發展，可以從「大學社區參與」談起。周晨虹（2014）研究指出，「大學社區參與」是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美國興起的新型大學社會服務模式。透過大學與地方社區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將社區的需求與社會發展作為動力，主要目的在於從大學領導階層、組織結構、教師參與、大學和社區之間的權力關係等層面，進行層層結合，推進大學的教學、科技研發與服務功能等綜合性的發展，而這類的發展同時具有學術性、綜合性、互惠性、公共性等特徵。

而所謂的「大學社區參與」其實是逐漸發展出來的概念，前些章節也有提到，美國的大學發展脈絡中產生了捐地運動、與國家及企業等政府政策合作之外，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由於美國經濟發展形勢以及大學面臨的各種挑戰，美國大學開始注重社會的需求以及與社區之間的合作，努力建立雙向的「大學與社區」的平等夥伴關係，其主要方式是大學的社區服務、公共參與和服務學習等（周晨虹，2014）。因此，在這個「大學社區參與」的模式當中，「大學」以社區的需求為優先，提供更多元的社會服務，而不再只是將社區視為被動的服務接收者。同時，社區也能在大學參與的過程中，提供不一樣的角色與幫助，讓大學各方面的發展能有不同的場域與資源支持。這類型雙向、夥伴間的合作關係，使得大學社區參與的特徵——「綜合性」可分為三個組成，包括：參與式教學（Community-engaged Teaching）、參與式科研（Community-engaged Research）、參與式服務（Community-engaged service and outreach）。

這股由美國引領潮流的發展，到了亞洲地區也有了不同的景況，尤其是與台灣情景相似的日本，又產生了哪些政策與發展上的不同呢？

第二節　日本「地方創生」發展

從 2014 年開始，為因應日本少子化問題、城鄉發展落差等問題，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內閣提出「地方創生」的概念。在這段期間，各地方政府不但擬定實現地方創生的計畫（地方版城鎮、居民、工作創生戰略），也在鼓勵創造工作機會（地方產業革新）、引導人口回流地方、再造新市鎮等方面，積極推動許多值得關注的政策（事業）（神尾文彥/王榆琮譯，2018：11）。神尾文彥（2018）認為，即便仍然無法降低人口遷入東京圈的情形，但是像東京、名古屋、大阪、福岡、各地方郊區或觀光都市，從 2015~2017 年之間開始出現人口穩定增加的情形。

與台灣不同的是，日本建立了「廣域都市圈」與「地方經濟樞紐」，用以分散人口、資源、產業發展過度集中於東京圈的現象。「廣域都市圈」是要徹底放寬限制，並且實施人才及資本的招攬戰略。比起廣域都市圈，「地方經濟樞紐」因需要讓地方逆轉大都市圈吸引力，所以會較為困難。（神尾文彥/王榆琮譯，2018：13）「地方經濟樞紐」是地方（Local）擁有可以和世界接軌的機能（Hub），具體而言，這是可以產生出能在世界上一較高下的資源，也能穩定賺取外匯（人才、資源），而且不受地域限制的都市。（神尾文彥、松林一裕 /王榆琮譯，2018：40）即便目前札幌、仙台、廣島、福岡等地方中樞都市（圈）已具備優越的都市機能，包括：購物中心、音樂廳、綜合大學、研究開發設施、會議廳、大規模航站機場等，人口持續地增加中，但險峻的是，這些都市的企業多為東京圈的分公司，經濟型態容易受到總公司操控與影響，一旦出現人口減少或者外部環境等問題，便能輕易地撼動經濟結構，使這些地方中樞都市的功能與地位逐漸瓦解。因此，優良的「地方經濟樞紐」的形成，必須具備按照都市自身的安排實行拉攏國際市場、人才的戰略能力，以及在時代環境上可以不斷創造商業環境（職場）的能力。此型態的形成重點在於什麼才是城鎮最需要獲得的能力（神尾文彥、松林一裕 /王榆琮譯，2018：40）。

找出城鎮最需要獲得的能力之同時，更必須瞭解在地、深耕在地，而這番挖掘除了仰賴公部門之外，更可透過學術機構進行串聯。場景轉換到日本四國的高知縣，在天下雜誌的「CSR@天下」專欄中有一篇報導為一一「【USR 案例】 衝破高教紅海　日本大學地方蹲點[1]」，內容描述高知縣內的國立高知大學，如何成為「地區中心」計畫（COC，Center of Community）中的佼佼者。在日本 86 所國立大學、600 所私立大學中明列第 13 名的高知大學，所在位置高知縣所具備的悠久人文歷史與古蹟，同時也被列為日本文化遺產。不同於「學術象牙塔」的形象，從 1949 年建校以來，高知大學即協助推動當地農業，甚至讓當地居民免費來大學上課，學習如何將農產品加工、以利擁有更好的價格等。

為了區別出和其他大學的差異、向地方學習，高知大學提出的創新方法有三種，分別為：改變教授的評鑑目標及方向、雇用 4 名專職的地區專家（coordinator）

[1] 【USR 案例】衝破高教紅海　日本大學地方蹲點
https://csr.cw.com.tw/article/40466

下鄉蹲點、和當地銀行合作群眾募資平台協助村民開發產品。尤其是雇用專職地區專家此方法，更是要求這些具備教授資格的專家必須深入地方、每天都要跟地區內的一個人見面，甚至每周提出 1 個當地問題、尋找解方。而認識在地的方式除了見面拜訪之外，還包括到地方政府機構共同開會，或者是透過融入地方的喝酒聚會等，深入瞭解在地後，才有辦法理解如何結合地方與大學的特長，進一步釐清與解決問題。也難怪高知大學校長櫻井克年說：「以前，大學對於地方的人來說，像是山丘上的城堡，可望不可及。但是我們要讓大學跟地方在同一個水平，即便他們不來找大學，大學也會去地方。」面臨人口外流、高齡化等困境的日本發展如此，那反觀台灣呢？台灣的高教現場又是經歷了哪些改革的歷程呢？

第三節　台灣的「大學與社區」互動關係

回到台灣高教現場，李筱嬋、陳政宏（2015）指出，解嚴之前的台灣教育政策較為國家化、一元化、權威化，解嚴之後，隨著民間出現的教改聲浪，政策方面也開始出現了轉變，像是教育部於民國 88 年開始推出競逐型教育計畫——「推動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目標是透過重點補助來改善大學學術發展之基礎建設、整合資源、促進學術競爭（2015，轉引自楊倍昌、陳政宏，2015：136）。這些計畫像是公民素養陶塑計畫、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及最近正流行的 USR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等。在這些計畫中，公、私立大學無不卯足全力投入其中，藉由爭取經費的方式，試圖做出一點改變，也試圖改善校園的軟、硬體環境，但這些改善的成效是否如同日本的地方創生成效呢？

執行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的李筱嬋、陳政宏（2015）也提到，尤其教育部中綱計畫所具備的實驗性特徵中，強調的目標包括：為什麼要培育這樣的人才（why、who）、什麼是適當的策略（what）、如何於校內推動（how），縱使參與的校方提出可能的作法，但同時也被期待著提出突破現有想像的行動方案，面對這樣一個目標抽象、成果不可預期、重視理由及因果的工作，卻以一個需要不斷概念化、結果導向的管理工具進行評估，管理的信效度令人質疑（2015，轉引自楊倍昌、陳政宏，2015：145），也讓這些計畫往往淪為無人獲利的零和賽局（Zero-Sum Game）[2]。王振寰也指出，如何連結大學與社會或社區發展，將大學的教育與國家社會發展連結起來，是當今教育需要正視的問題（2015，轉引自楊倍昌、陳政宏，2015：4）。

苑舉正（2015）也分析，在世界局勢中，國家社會與大學之間的發展歷史大致有以下的改革內容：以科技實用、培育人才、建設國家為主。於是，在科技人才建設國家的口號下，原來大學中應當存在的學術自由風氣，逐漸在科學家與工程師的單向思維裡，成為了次要的教育目標（2015，轉引自楊倍昌、陳政宏，2015：29），這些世界局勢裡的發展概況也逐漸推進到亞洲國家中。尤其在歷史的長河

[2]零和賽局：表示參與的雙方利益之和為零或一個常數，意即一方有得，則另一方必有失。

之中，國際間也因為強烈的教育目的及發展，不僅曾經引發兩次世界大戰，更讓世人開始思索何謂「人的價值」。當大學以「科技」為主軸進行教育時，不僅與大學的精神背道而馳，甚至未必能真正地訓練出所謂的「人才」，朝著「理想國家」的方向邁進。如果「人」被理解為是一個受到外在目的而決定的「工具」，那麼這個人不會貢獻所學於他成長的社會（2015，轉引自楊倍昌、陳政宏，2015：29-30）。當人們不願活在被決定的社會裡，又該如何談及思想層面的活絡、對於公共議題的討論與關心呢？

相同的，沈宗瑞（2015）也提到，自從 1980 年代英、美推動全球新自由主義後，高等教育逐漸被視為商品，大學的發展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關聯已越趨密切，包括：大學爭取世界排名、國際化接軌、國際學術分工下的論文發表、產學合作等政策發展，使得大學的地位與角色受到挑戰，同時，大學教師或在學校存續或在升等獎勵下，尚須兼顧日漸多元的教學任務，負擔之沉重，不言可喻（2015，轉引自楊倍昌、陳政宏，2015：34）。但在這二十幾年來高等教育的改革之下，是否又有哪些發展成果以及有待改進的空間呢？

國內的高等教育改革計畫從「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到最近的「USR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等，無論改革是否有所成效，大學與地方之間的共生共榮其實未必都需要透過計劃才能達到，以大學傳播科系達到的「社區媒體」成效來看即是一例。胡元輝（2016）統整了三位學者——Ellie Rennie、Crispin Maslog、Nicholas Jankowski 對於社區媒體的特質，發現即便看法上有所落差，但仍可歸納出三項共通的特質，分別是：近用（access）、參與（participation）、非營利（non-profit）（胡元輝，2016：9）。而透過地方大學的非營利特質，搭配傳播相關科系設備、技術的近用，以及大學實習媒體實地參與社區事務，也可以讓「傳播媒介」成為大學與社區之間的橋樑，形成新型態的社區媒體。

尤其，大學既以擁有媒體產製的設備與資源，又坐落於全國各角落，成為當地社區的重要成員，甚至是發展核心，從大學的社會功能與公民使命來看，讓實習媒體成為所在社區的資訊與意見交流平台，不僅符合其成立宗旨，更是惠而不費的作法（胡元輝，2016：26）。因此，例如政治大學的《柵美報導》、世新大學的《小世界週報》、輔仁大學的《新莊報導》、佛光大學的《蘭陽報》和《蘭陽網路報》、中正大學的《中正 E 報》等，都具有相關的效果與累積。

而除了文字與影像兼具的實習媒體之外，全台約有 14 所大學具備實習廣播電台，包括：中正、政大、輔仁、世新、南臺科大、長榮等校，其中擁有無線頻譜的約莫為 11 所學校。透過頻譜的發送，讓校園廣播電台有機會配合在地居民的作息與生活，紀錄在地聲音，並且讓在地發聲（管中祥、洪育增，2018）。就像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急行軍講東講西》一樣，該節目即是利用中正大學傳播系的廣播設備，透過既有的硬體設備，搭配鳳梨急行軍整理出來的軟性節目內容，讓校園內的實習廣播電台發揮更大的功用。而像這類藉由媒體近用、社區媒體的方式，讓大學與在地之間能有更多緊密的連結與互動，其實是不需要透過各項改革計畫達成的，反而能以大學作為出發點，誠摯地向在地學習。

在近年來，教育部與各大專院校合作的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中，主要宗旨也是希望大學與在地之間有更好的互動關係。尤其大學因為獲得公共資源挹注而得以匯集各個專業領域的菁英，但是近年來社會問責的聲浪也越來越高，大學師生除了在自己專業領域持續研究創新外，更應該主動積極和當地社經及產業發展結合，將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帶動所在地區的繁榮與發展[3]。USR 計畫從 106 年開始，並在 107 年時與「高教深耕計畫」進行連結，希望能讓大學扮演地方智庫的角色，並且在挖掘在地需求的同時，也能運用在地的優勢進行問題的解決，讓大學生感受到「被社區需要」，凝聚在地認同。尤其整個計畫最主要的核心目標在於人才培育、區域鏈結以及社會創新，讓地方大學的人才與產業皆有升級的機會與關照。

以近年盛行的 USR 計畫為例，陳婷玉（2018）在「獨立評論@天下」的投書[4]中指出，台灣自 2017 年實施的大學社會責任 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看似與日本的 COC（Center of Community）、COC+（COC for regional revitalization）計畫相似，但不同的是，規模、指導層級、經費分配、中央、地方政府的角色責任、大學的目標、人力、制度等各方面的配置卻是相去甚遠。以 COC+計畫為例，該計畫是以舒緩大都會東京的年輕人口為最終目標，因此區域大學必須與地方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等合作，共同創造大學生有興趣的工作機會，並且將在地的年輕人或大學畢業生留在本地，而非遷移至外地。但若要達到上述目標，除了辦學方針、課程結構需要調整之外，大學不可能不與在地合作，大學必須與鄰近地區互動，甚至學習如何在社區扮演角色等，才有機會成功。

但是反觀台灣的高等教育現況，不僅辦學方針與課程結構難以翻轉，大學如何與地方互動？也是從教職員乃至學生都必須學習的課題。甚至大學該如何與地方政府、地方社區合作？更時常受到經費限制、人力短缺、時間有限等因素而無法踏實地累積合作經驗。

然而在高等教育的改革之下，透過階段性的省思與規劃，我們可以發現近年來除了有上述的省思之外，更有一些不同的成果與發展，像是以「校級」規模參與相關計畫發展的南藝大、暨大、甚至是近年來中正大學的 USR 團隊等，或是以「系級」規模為單位參與在地社區發展的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乃至於像鳳梨急行軍這般小規模的「學生團體」，其實都有一定程度的累積成果。

以校級規模參與周遭社區發展的南藝大為例，結合南藝大在音樂、藝術、建築、影像等各方面的人才與系所，拓展到台南後壁的土溝社區、台南官田的大崎社區、彰化溪洲的圳寮社區[5]等，將傳統音樂與影像紀錄、數位化、美學呈現等進行更深入的結合，讓藝術的價值與行動更具涵義。又例如以系級規模參與在地發展的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建築的技術不再僅止於技術層面，反而能深耕在地，透過瞭解當地的歷史發展與人文關懷，進行更不一樣的保存與修復，包括

[3]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http://usr.moe.gov.tw/about-2.php
[4]〈【投書】「大學社造」不該只是扮家家酒！台灣 USR 的實踐困境〉：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7266
[5] 社區所在藝術中心：http://art.tnnua.edu.tw/start/index.php?a=i

嘉義縣大林鎮上林社區的老屋活化、嘉義舊監宿舍群活化利用，以及嘉義市二通老街的社區計畫等[6]，透過建築資料的盤點、認識與理解，輔以在地居民的生活記憶，讓建築的功用發揮到淋漓盡致，也成為了近年來不可小覷的亮點成果。而以下則針對研究者參與過、且較為熟悉的暨大案例與中正大學 USR 團隊案例做更詳盡的說明，從中分析、觀察這些累積的成果。

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暨大）的案例來說，從 1997 年開始設校於南投縣埔里鎮的暨大，是南投唯一的一所國立大學，建校兩年多，恰巧遇上台灣史上嚴重的地震災情——九二一大地震，位於震央一帶的暨大並無倖免，剛啟用的學生宿舍、教學大樓等也受到波及，當時無論是關於遷移校本部至台北地區、借用台大教室上課等相關資訊的批評，亦或是學生們自告奮勇留守埔里協助賑災的經驗與澄清，災難的發生也讓更多暨大師生、埔里在地居民、社會大眾等，對於大學的存在能有什麼樣的功用與成效，多了不同的見解與體會，大學與在地之間該有什麼樣的互動與關係？成為了這近 20 餘年以來的暨大課題。尤其，大學內部擁有極為龐大且可貴的學術和研究能量，如何將能量導引進地方，促成在地資源和大學資源的雙向有機流動，這對習慣強調專業知識乘載度的大學教育工作者們而言無異是一項新的挑戰（劉明浩，2018）。

根據廖嘉展、江大樹、張力亞（2016）的研究整理，埔里在地除了有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等民間、政府部門進入之外，暨大從 2007 年起將通識課程中的服務學習納入必修學分，在 2011 年以「建構水沙連大學城生活圈」為目標，預計從課程教育、學生活動、宿舍生活等 3 面向推動「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因此得到教育部 3 年經費補助、成立「水沙連大學城行動辦公室」。到了 2013 年更獲得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的 3 年期補助經費，成立「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並且以行動參與的方式，在暨大周遭的桃米社區、籃城社區、眉溪部落進行蹲點研究以及課程場域規劃。除此之外，暨大也在 2015 年參與教育部推動的「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規劃並參與 B 類無邊界大學計畫，開創 R 立方學程[7]以及 R 立方學堂、R 立方辦公室等。這之中，研究者自身參與過的即是「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在暨大發酵的歷程，透過電子刊物發行的方式，進行更多校內外公共議題的討論。

除此之外，劉明浩（2018）認為，尤其是 2015 年開始，暨大參與的「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其實對於暨大本身的影響是很大的。奠基在過往的九二一地震以來造成的隔閡，再到近幾年的關係修復，暨大逐步檢討和反省做為一所國立大學之於地方的意義感與存在感。透過和地方的連結合作，也在反省和改

[6] 搶救繁華到衰敗的街區 南華建景系挑戰任務：https://udn.com/news/story/7326/3122607

[7] R 立方：據陳彥錚、劉明浩、陳文學（2016）的研究指出，R 立方創新實務學程以培養青年留鄉與返鄉的創發能力做為教學目的（R3 = Return for Rural Re-creation），因此開設跨領域實務學程，讓暨大學生重新思考返回（return）的意義，並且思考如何在現實中面對傳統產業發展為主的鄉村型（rural）城鎮，發展出新的機會與挑戰，提出創新模式或行動方案（re-creation）。

進大學的教學方式（劉明浩，2018）。而這些一直以來不斷投入的關係修復，也讓師生關係、教學與行政關係、大學與地方關係這三者，有了不同的目標以及微妙的轉變。劉明浩參與在這些改變的歷程當中，更深刻地體悟到，師生之間的關係應該要從不同於過往「上對下」的型態，轉變成「夥伴討論」的關係。教學與行政關係也應該要從互相「管理」的角色，轉變為「協助」的關係。大學與地方的關係更應該要愈趨緊密，因此，教師教學的熱情需要被召喚、學生學習的渴望要被激發、行政工作要能適時適當跟上教學方法的改變、大學和地方要成為學習共同體（劉明浩，2018）。

再者，陳彥錚、劉明浩、陳文學（2016）的研究也點出了當代台灣社會、高等教育環境中常見的問題，許多學生大學畢業之後，無論是故鄉所在的偏鄉、還是大學所立足的偏鄉，幾乎無法提供對應的工作產業與環境給學生，因此學生畢業後往往能選擇的求職地點即是大都市以及都會區，融入都市運作的體系之中，溫飽三餐。人才往都市流動、青年人口外流、城鄉的差距拉大，這些實際的社會狀態，在一系列高等教育的演變過程中，大學幾乎可以說是青年離鄉的最大推手（陳彥錚、劉明浩、陳文學，2016）。而要達到改革的成效，其實並不容易，尤其是從大學教師的角度著手時，更有著與眾不同的責任與義務。大學教師肩負著「大學學術與地方知識的轉譯平臺」的角色，誠摯了解真實社會，讓大學學術接地氣，與地方平等對話，發展共同行動（劉明浩，2016），讓這些從學術上、對話上、行動上等各層面的內容進行改變，也成為了大學教師首當其衝必須面對的景況。而當大學願意將眼目所及的熱切關注於地方議題，並不全然是完全在地化的過程，有時是「去在地化」，將好的經驗、好的知識技術帶入到地方（劉明浩，2016）。

因此以暨大的案例來看，在這年輕的校齡、座落的地區等背景之下，即便所在之處並非都會區，但也透過長期以來不斷的努力，讓埔里鎮上開始出現了許多與校方合作、向在地學習的榮景，藉由講座、活動、刊物、學程、以及問題的發想與解決等，不斷地促進大學與地方之間的交流，甚至帶著一種希望，期盼未來能夠產生更多適合學生就地就業的發展與探索。

而反觀近年正流行的 USR 計畫，同為計畫參與者的中正大學，又與地方有了哪些互動呢？以「大學路護樹聯盟」的案例來看，「大學路護樹聯盟」的成立源自於一篇中國時報的報導[8]，當時消息一出來，在嘉 106 鄉道周遭，也就是中正大學前大學路一段至三段的社區居民，赫然發現周圍的景物與道路即將轉變。尤其影響最為深遠的民雄鄉豐收村豐收社區發展協會，裡頭的村民、協會幹部等完全沒有人知曉此一消息，大夥兒都是看了地方報導之後，才知道原來所謂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即將擴及生活的範疇之中，甚至有可能危及這些與村民生活歷史息息相關的百年芒果路樹。同時，民雄鄉的在地鄉民中有些人長期關心路樹議題，因此也在得知消息之後前來中正大學尋求支援。而恰巧中正大學參與 USR

[8] 2018/10/05 中正大學附近嘉 106 鄉道將移除快慢車分隔島 改置中央分隔島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005004411-260405

計畫子項目中的「重構大學路」團隊[9]正是以關心在地議題為主，因此也在多次與村民們討論、開會的過程中，從參與豐收發展協會的相關會議開始，將討論的能量傳遞於校內與校外之間，用更多不同的面向探討護樹的意義與適當性，落實所謂「民主討論」的真諦。在鄉民與社區發展協會的極力奔走之下，不僅將更多鄉民們對於芒果老樹的記憶進行整理，更與鄉民們討論用什麼樣的方式保存老樹較為適切，甚至是讓學生與鄉民之間進行交流，瞭解砍樹、改道之後，究竟學生與村民們的車禍事故率是否會下降等問題。

也因為這些滾雪球式的討論活動，使得已經開始跑完行政流程、發包工程的民雄鄉公所、嘉義縣政府等公部門單位不得不正視在地的力量與聲音，並且在2018年12月時召開說明會、與在地居民們共同討論適切的方式。無論是暨大的案例，還是中正大學的案例，其實都說明著大學必須與地方有更多的接觸與交流，才有辦法促進更多溝通的機會，相互理解之後也才有辦法共同承擔、面對、解決地方上的問題，甚至更多的時候，是必須「向鄉民學習」，運用在地的知識與能量，讓學術的高談闊論得以著陸。

除了這些校級、系級的案例之外，那反觀中正大學與三興村之間呢？達到了什麼樣的認識與理解、認同與包容？鳳梨急行軍又如何以學生組織的方式進入在地呢？以下章節將探討箇中的互動關係。

第四節 中正大學與三興村之間的互動

三興村座落在嘉義縣民雄鄉，根據《民雄鄉志》的記載，三興村舊名為陳厝寮莊，地名的由來源自於乾隆年間，漳州人陳得意拓墾結莊而得名。且三興村開發既早且發達，昔時設廍製糖有三所，即陳厝寮二所，溪底廍仔一所，因此陳厝寮昔有頂廍、下廍之分。溪底廍仔，因位於三疊溪底邊，設廍製糖而命名(張萌芽，1993：49)。三興村的行政區域流變也可從清代開始探討。在清朝時，三興村屬於「打貓東下堡陳厝寮莊」，後來到了日據時期、宣統元年，改為隸屬於「大貓支廳大崎腳區」，到了民國九年改為「民雄莊陳厝寮保」，直至國民政府遷台後，因為和溪底廍仔及葉子寮三部落合為一村，故改稱「三興村」(張萌芽，1993：49)。

在三興村囊括的地域範圍中，包括陳厝寮、溪底廍仔、葉子寮三個聚落，其中尤其是陳厝寮，特別是鳳梨急行軍主要進行田野調查的活動範圍。在鳳梨急行軍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現，三興村的產業發展並非一開始即是生產鳳梨為主，還包括早期的蔗糖、麻竹等農產品，甚至可以從產業的變化一探舊地名的由來。以甘蔗為例，當時蔗糖產業在日據時期甚為興盛，對於中、老年一輩的三興村人來

[9] 重構大學路團隊：為中正大學USR計畫中的團隊之一，團隊成員中包括計畫主持人的傳播系管中祥教授，以及生醫系李政怡教授、中文系楊玉君教授，以及法律系的廖蕙玟教授。計畫核心目標為「認識、認同與共同行動」，藉由課程與活動的方式，促進學生與在地之間的交流及學習。

說，現今三興國小的位置即是早期糖廠工人的員工宿舍，因此在舊地名的稱呼上又稱之為「工寮」，而這些關於舊地名的記憶，也是研究者跟著鳳梨急行軍進行田野調查時統整出來的內容。

同樣地，產業的發展不僅與在地相關，更與大學的興建息息相關。在中正大學的建校用地部分來自於台糖用地，部分來自與鄰近村落——豐收村的五穀王廟贈地。根據周妙穎等人（2018）的研究指出，在中正大學附近、自 1912 年設立的好收農場，早期除了由大林糖廠（原為大林製糖所）負責管轄之外，更是協助載運採收甘蔗的糖鐵大坵線支線陳厝線上，相當重要的節點之一。在此研究中更是拜訪了曾在好收農場工作的台糖員工吳大哥，吳大哥表示，目前中正大學附近、三興村新的活動中心用地，甚至一路延伸至嘉惠電廠一帶，都曾經用來種植甘蔗。而在 1989 年，由於中正大學建校，甘蔗種植面積下降，再加上配合都市計畫，原本通往好收農場辦事處的糖鐵大坵線，以及支線陳厝線都在同期被拆除，而在大林糖廠廢除之後，目前好收農場歸屬於虎尾糖廠所管轄，農場裡收成的甘蔗也都以卡車運往虎尾糖廠做後續的處理（周妙穎等，2018）。

大學對地方的影響不僅展現在產業層面，更可從早期的開發計畫一窺究竟。中正大學位於民雄鄉的三興村之中，建校於民國 78 年，校地面積約為 130 公頃。建校之初，也與三興村鄰近的豐收村五穀王廟有所關連。當時中正大學的校地來源為部分廟產，而民眾的土地之所以會變成廟產，也與歷史的流變有所相關。根據黃顯淨（2017）論文裡提到的鳳梨急行軍田野調查資料顯示，在早期為避免繳交稅租，部分民眾會將私人農田登記為廟產，並以香油錢做為登記費用。但在國民政府來台之後，廟方為了避免被國民政府追究，因此開始以「番薯租」的形式替代現金作為登記費用，並在近年改為現金的方式進行收費，久而久之農民們也逐漸接受了這一套方式，並且隨著廟宇神祇的庇祐將土地的產權歸屬於廟方（黃廷皓，2016，轉引自黃顯淨，2017）。

尤其建校初期中正大學一帶被規劃為「特定區」，係依都市計畫法第十二條及第十六條之規定，為配合中正大學，發展為本特定區獨特風格之大學城都市型態（張萌芽，1993：399）。而究竟中正特區的範圍與邊界在哪呢？根據《民雄鄉志》記載，東至台電變電所西側，南以陳厝寮嵌頂、嵌腳為界，西以好收重劃區之東為界沿好收圳向南延伸，北鄰三疊溪，涵蓋於三興、豐收、東興三村，計畫面積 540 公頃。計畫年期自民國 81 年至民國 105 年（張萌芽，1993：399）。但是在這長達 24 年的計畫期限中，三興村和中正大學之間有達到哪些共識或互動呢？

尤其以當初的特區計畫來看，《民雄鄉志》裡的內容更指出，為了達到校園環境的恬靜與舒適，除了需要有寧靜、優美的居住環境之外，更需要將校園空間與鄰近地區的開放空間、服務設施相結合，形成「大學城」獨特的「都市形象」（張萌芽，1993：399）。因此除了部分用地範圍之外，其餘私有地都是以「區段徵收」的方式辦理。同時，也可透過以下規劃圖（圖 1）發現當時的土地使用規劃包括：住宅區、商業區、河川區、農業區等，並規劃出中正大學用地以外的公

共設施，包括：零售市場、廣場、公園、兒童遊樂場、停車場、溝渠、綠地、園道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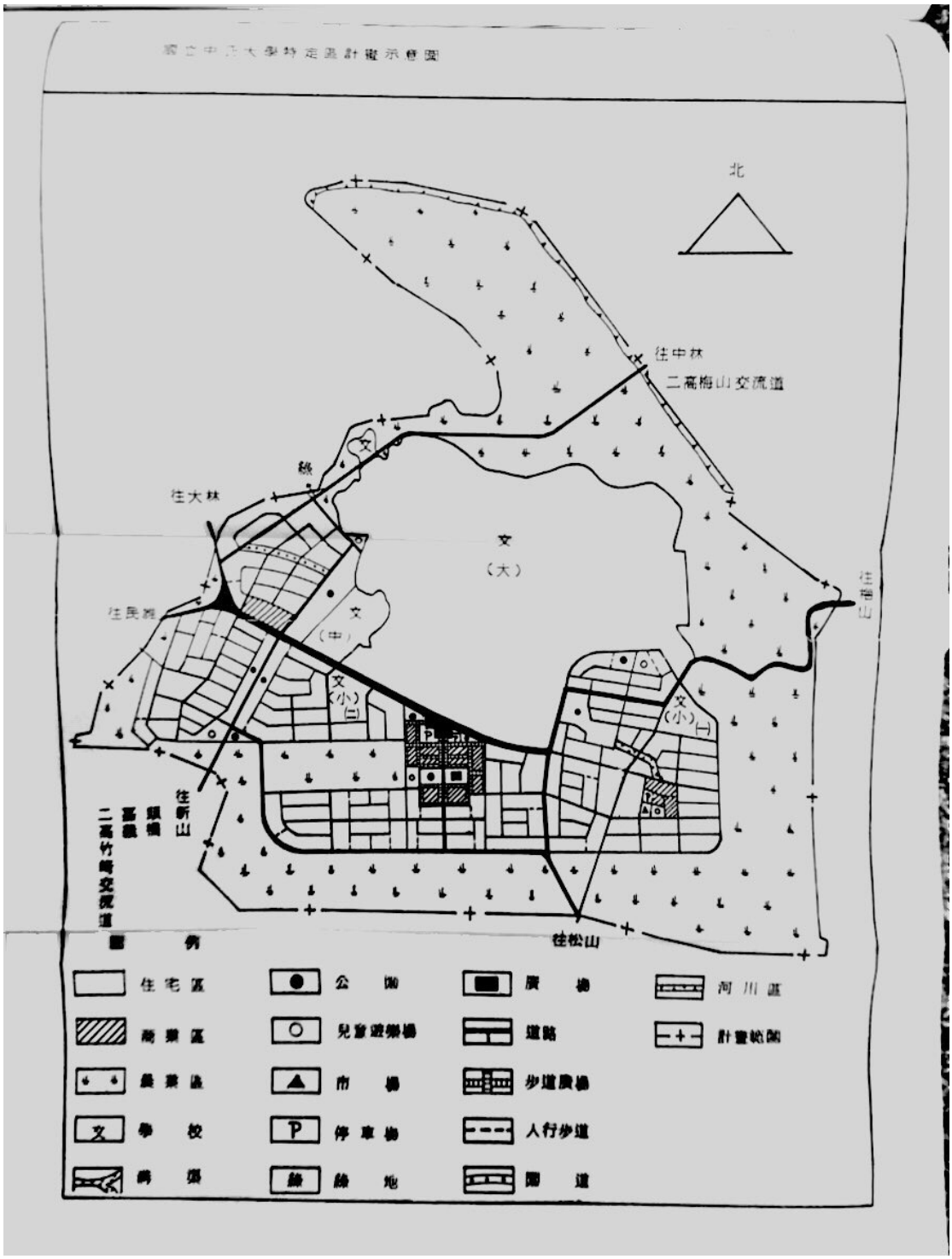


圖 1：國立中正大學特定區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民雄鄉誌（張萌芽，1993）

與現今眼目所及的景觀相比，確實與當時的規劃藍圖有許多出入。包括並沒有所謂的零售市場、商業區、兒童遊樂場等。當時的規劃藍圖究竟是為鄰近的三興村村民的需求設計的？還是為了中正大學師生的到來所準備？彼此之間是否有哪些生活與想法上的落差及期待？想必是截至目前為止、建校將近 30 年間逐一累積、浮現的問題。

而在當時，民國七十六年、該區域人口為 1,756 人，估計二十五年後，扣除中正大學宿舍容納量，其餘學生及其他人口計畫可達 29,000 人(張萌芽，1993：399)。但如今，當我們依照教育部大專校院資訊公開平台的資料進行粗估時會發現，中正大學 107 學年度，於 10 月 15 日仍具備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人數[10]為 11,512 人，先扣除掉提供一年級學生住宿之比率[11]為 68.86 %，因此未住宿舍的學生人口數[12]約為 3,608，再加上其他人口計畫之人數，包括校內相關教職總計[13]為 767 人、三興村總人口數[14]為 1,573 人，全部加總也不過 5,948 人，與當初開發規劃、預計可達到之 29,000 人，相差甚大。

縱使上述的粗估計算中，缺漏了中正大學裡的約聘雇職員等，但在少子化浪潮、人口外移等影響之下，將近 30 年之間、人口估算的落差仍然不容小覷。尤其我們更可以進一步探討的是，「廣設大學」與「城鄉發展」之間是否確實有達到平衡呢？當大學並無法帶入如此大量的學生人數、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時，那麼對於在地造成的困擾與污染，又豈是能忽視的呢？如果大學招收的人數確實如當年貴畫的預期時，是否對於在地而言更容易是災難一場呢？

關於中正大學與三興村之間的互動，黃顯淨（2017）提到，在早期的規劃上，中正大學以自身的主體思維進行建設，未能看見從在地出發的文化價值；而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因為地緣關係，導致「大學」與「村落」這兩個主體在生活上有著許多衝突，包括交通事故頻傳，許多外地建商進駐建設增加租屋競爭、導致房價增高，以及曾經發生過學校將校址上原有的「陳厝寮」地名以翻譯不易為緣由而去除，在地方引起紛爭（黃顯淨，2017）。研究中也提到，校方與村落間的互動可分為三種，分別是「計畫型、政策型、產學合作型的地方高齡化工作」、「研究型、知識性的地方文史工作」以及「活動型地方工作」這三種。在第一種的合作中，主要與三興社區發展協會每周四上午九點半到十一點半的「樂齡智慧學堂」有關，由中正大學心理系等單位與大林慈濟醫院共同合作，每周在三興社區活動中心進行 2 個小時的長照課程講座與活動，但這方面的參與其實校方是較為被動

[10] 根據教育部大專院校資訊公開平台（https://goo.gl/4EYZRb）針對「在學學生人數」的定義及說明如下：係指學校當學年度(10 月 15 日)具備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人數，包括本國籍學生、僑生、外國學生(含雙聯學制學生) 、大陸地區來臺就讀之學位生等；但不包括選讀生、休退學生、學分班、交換生(非學位生)、保留入學資格或無學籍學生等。備註：不包括「附設進修專校及附設進修學院」之在學學生數。

[11] 係指學校提供一年級學生住宿之比率，其計算為【一年級學生實際住宿人數】除以【一年級學生申請學校宿舍人數】。

[12] 本研究的計算方式為：11,512*31.34%=3,607.86，四捨五入為 3608 人。

[13] 包括：專任教師數 542 人、兼任教師數 203 人、輔導人員數 19 人、就業輔導人員數 3 人。

[14] 參考自 107 年 10 月份民雄鄉人口統計資訊：https://goo.gl/dmBdUz

的狀態，有相關的機會才會參與其中。而關於長照議題校方也與各系所合作，成立「高齡研究基地」進行相關的研究計畫。至於第二種合作，則是關於嘉義地區大學與嘉義縣政府的地方文史工作，共同在 2009 年編纂出版《嘉義縣志》，由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雷家驥和嘉義大學史地系教授吳昆財，協同其他相關的專業人士進行該項任務。而關於地方文史的工作，中正大學在 2015 年設置研究機構「媽祖文化研究中心」，進行在地民俗等相關研究與文史資料的保存。

第三種合作——「活動型地方工作」則是與「民雄鳳梨文化節」有關。在 2001 年時由中正大學學生自主發起該項活動，並且與三興村、民雄鄉農會、嘉義縣政府、民雄文教基金會等共同籌辦活動。但是在持續辦理四屆活動之後，2006 年時由於受到選舉宣傳期的干擾導致意見分歧，再加上學生代表認為該項活動已經與在地之間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因此退出第五屆的民雄鄉鳳梨文化節，改由民雄鄉農會主辦，但活動也在 2012 年因為經費不穩定等因素而停止舉辦了。從上述第一種到第三種的合作內容中可以發現，即便中正大學曾經有教授、學生參與瞭解地方、融入地方事務，但是許多相關的活動僅停止於「成立研究單位」這樣的目標上。「成立研究單位」雖然也是大學作為研究機構的功能之一，但是如何更接地氣的將地方需求與回應歸納到研究範疇中進行討論？或是如何去定義、舉辦真正屬於三興村的「民雄鳳梨文化節」？大學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否也存在著許多先入為主的想像？從過往的區域規畫、人口演變，乃至於共同合作過的活動等，我們其實可以發現這之中存在著許多落差。

第五節 小結

從世界的經貿發展到台灣社會的發展脈絡，整體、連動性地影響著大學教育的發展，而在這些發展的過程中也隨著政府政策的施行，大學的發展似乎反覆地在不同的計畫之中流連，然而在這之中也有些不一樣的發展，奠基於過往的認知與突破，層層地破除了政策型計畫的限制，在有限的範圍內做出無限的連結與共好，如此具有深度與廣度的累積成果也是不容忽視的。

而以中正大學為例，在大學進入地方之後形成的行政特區，從選地建校初期即受到矚目。如今 30 年過去了，大學的招生體系、學院分布、師資等軟硬體建設已漸趨完整、飽和，但相對來看，三興村內的發展是否更加有利於村民們的生活以及需求呢？至少目前看來是存在著部分落差的。

學生與村民、大學與在地該如何互相視為己出？從來都不是一項簡單的課題。尤其在大學入駐後，包括車禍事故的頻傳、垃圾運量的增加等，其實都是可見的直接影響。而中正大學自身也曾在建校初期舉辦相關的在地性活動，邀請三興村的村民一同共襄盛舉。但在近年，類似的活動卻逐漸消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大學社團或系所透過課程或計畫等媒介進入社區的日常生活之中。

也因此，直接的影響還包括了——學生與教師屢次進入地方打擾村民就為了完成作業、研究等相關的問題。從這般學校與在地之間的互動，更可透過近年來倡議的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一一檢視。以中正大學與鄰近地區的互動為例，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管中祥（2018）就曾歸納整理出一篇研究報告——《中正大學「積極學生」對本校社會參與及公共責任的看法》，內容中關於「本校『積極學生』對中正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的評價」其中有兩點提到（管中祥，2018）：

> ●由於相關基礎知識與調查的缺乏，不論研究者或服務者對在地文化與歷史亦為陌生，以致於學生進入社區或相關場域，並難以了解社會的真正處境與需求，也無法提供相對應的解決之道或進行社會服務。
>
> ●雖然有多位教師執行相關在地服務（研究）計劃，但彼此之間較少連繫，不僅無法有效整合資源，也可能讓被服務者重複受到打擾。也有受訪同學指出，教師的研究只在蒐集資料，成果未能回饋社區。

因此，地方大學該如何找出在地需求？並且有效地運用在地的研究資源回應地方的需求？甚至在收集、整理資料的過程中仔細地爬梳地方的人文歷史等脈絡，以利有效使用在地研究機構與中心的資源？這些也都是地方大學可以努力的方向，並且可以有效地讓教師們的研究與學生們的作業介入，不再只是打擾地方居民的象徵，反而成為彼此良好互動的橋樑。

反過來看，除了相關的研究計畫、服務學習課程之外，中正大學還能透過哪些方式進入三興村呢？下面章節內容將會針對鳳梨急行軍進行詳細的介紹，說明這一個學生團體在做哪些事情以及如何介入地方，進行更多的互動與連結。

第三章 鳳梨急行軍如何串聯中正大學與三興村

承接著上一章節的內容，從高等教育的改革現況影響到大學與社區之間的互動，在本章節中將介紹鳳梨急行軍以及廣播節目《急行軍講東講西》，並且從中進一步瞭解鳳梨急行軍與中正大學、三興村之間是什麼樣的互動關係，以及如何互相串聯。

第一節 什麼是鳳梨急行軍

鳳梨急行軍源自於 2014 年的「鳳梨急行軍—身體與社區行動工作坊」，黃顯淨（2017）提到，當時由中正大學文學院中文系的「戲俊人」計畫以及圖書館藝文中心共同合作，邀請差事劇團團長鍾喬、團員李哲宇作為「駐校藝術家」，到中正大學的所在地「三興村」，透過民眾戲劇與田野調查的方式與學生進行工作坊(黃顯淨，2017)。

透過中正大學藝文中心及中文系兩方的合作，將中正大學與三興村進行了「民眾劇場」與「在地」的結合及嘗試，試著透過「認識」與「瞭解」的歷程，讓學生與村民之間不僅能有契機與空間，產生對彼此的好奇，更可以進一步地達到「共好」、「向鄉民學習」的目標，讓大學不再只是一座堆砌知識的城堡，更可以與在地之間產生連結、建立屬於在地的文史資料及文化保存。

藉由多次的工作坊、田野調查活動，鳳梨急行軍在 2014 年到 2016 年之間產出劇本《三興村的滋味》、《人像顯影——滋味三興村》，並在村裡、校內展演。過程中，參與的成員除了必須演出戲劇之外，也必須要走入三興村，藉由感官知覺的認識體會過往演出劇本中的實際內容，或者是透過田野調查的筆記書寫，發展不同的劇本內容。而在 2016 年年末，由於校內藝文中心組織變革的緣故，鳳梨急行軍經過內部討論後，選擇在 2017 年獨立成為中正大學的藝術性社團之一，並且暫停民眾戲劇的工作，著重於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製播廣播節目等相關工作。

第二節 什麼是《急行軍講東講西》？

從 2017 年開始，鳳梨急行軍轉換型式，但仍延續以往的做法，從在地出發、從民眾的歷史、記憶、故事出發，訪談村民錄製廣播節目於傳播系的「中正之聲荊聲荊事 FM88.1」電台放送（管中祥、洪育增，2018）。節目名稱為「急行軍講東講西」，該項合作暫停於 2018 年 6 月，總共完成了 3 季的廣播、共 40 集節目。

關於急行軍從民眾戲劇轉型為校園廣播節目的歷程，成員黃顯淨經歷鳳梨急行軍從無到有的歷程，並且持續參與至今。當時對於轉型的雛型源自於中正大學傳播系管中祥老師的建議，因此她將這樣的想法帶回社團裡與大家討論：

> 就是，沒有做民眾戲劇了嘛，然後就有想說要做什麼，然後好像有空檔、一段時間吧，後來就是有一次（管中祥）老師有建議就是說，中正的傳播系有廣播電台，然後說我們可以把廣播節目錄成故事，給村民或者是有在村子裡聽廣播的人聽，就也是一種傳播的效果這樣子，傳播的方式、或者是說產製的方式。然後那時候我就有跟大家說，就再跟大家討論看看覺得怎麼樣，後來就決定可以試試看這樣……那時候是想說就一樣都是說故事，只是說換一個方式說故事，比較沒有想那麼多（黃顯淨，2018/11/15，訪談紀錄）。

轉型的過程也正如黃顯淨所說的「換個方式說故事」，轉換說故事方式之餘就像是在盤點鳳梨急行軍過往累積的田野筆記、內容、人際網絡等。而為了能與村民更深刻的互動，也強化製作者的背景知識，每學期節目製播前，鳳梨急行軍會進行讀書會、工作坊、田野調查訓練。他們讀的書大致以藝術類、社造類、歷史類、方法類為主，讀書會與廣播節目製播同時並進，雖然閱讀的讀本和節目製作未必有直接關聯，但無形中卻影響著成員們製播節目的思維（管中祥、洪育增，2018）。也在這反覆討論的過程中，驗證著書籍與田野現場的異同之處，並且為彼此在田野現場遇到的困境找出解方。而在這些基礎上，學生們又該如何進入田野現場採集資料呢？以下章節將有更詳細的介紹。

但是，若要實際達到上述目標其實並不容易，尤其是在「紀錄在地聲音」之前，必須先學習如何進入在地、瞭解在地。若沒有相當的體驗與認知，便很難產生共鳴，也較不易在節目產製內容上與在地有所連結，或許透過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更能降低降入在地的門檻，因此像是國外的 StoryCorps 就是一個不錯的案例。

StoryCorps 是一個座落於美國紐約的非營利組織[15]，宗旨在於收錄美國各地不同族群、不同成長背景人們的故事，StoryCorps 的創辦人大衛・艾塞（David

[15] StoryCorps 官網介紹：https://storycorps.org/about/

Isay）[16]從 2003 年開始，與工作團隊在紐約的中央車站設置錄音間，針對參與者進行 40 分鐘的訪談記錄，通常兩兩一組，會有較為主動的約訪者，以及被邀請來參加的受訪者，約訪者與受訪者之間可能是親屬關係、夥伴關係等，錄製的過程中可能是傾訴對彼此想說的話、互相訪談，或者是描述彼此之間的故事等。而在訪談結束後約訪者會拿到錄音檔，同時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民俗學中心也會收錄一份。成立至今 14 年之間已收錄了大量的庶民聲音，錄音間也從紐約拓展到亞特蘭大市、芝加哥市、舊金山等城市，甚至也有透過改裝露營車的方式發展「行動錄音間」，這些音檔數位化、分門別類後也同時放置於 StoryCorps 的網站上供人聽取，並在 2015 年利用在 TED 大獎中得到的 1 百萬獎金進行免費 APP 的開發，讓社會大眾可以更方便地收聽、近用這一套公共資產。在發展至今的歷程中，StoryCorps 也將收錄到的故事文字化，產出了 5 本關於親情、愛情等不同種類的故事集冊。同時 StoryCorps 也與美國公共廣播電台合作，讓這些聲音固定放送於電台之中，更與其它非營利組織、企業基金會等單位合作，鼓勵社會大眾註冊、申請收錄故事，豐富資料庫的內容。

這些內容的擷取與收錄，除了有賴技術人員的培力之外，更有賴於在美國各地的開枝散葉，當人們意識到口述史的重要時，便會發現生活無處不是歷史。看完國外的聲音保存案例之後，下面的章節我們可以回過頭來觀看，鳳梨急行軍的藝術行動與廣播錄製行動達到了哪些效果呢？

第三節 鳳梨急行軍如何製播廣播節目？

在本章節中，將會分為兩部分進行介紹。一部份關於鳳梨急行軍的製播方法，在這部分的討論也會參照紮根理論的視角加以剖析。至於另一部份則是關於鳳梨急行軍製播節目前的準備，從這一套由學生團體自主發展出來的模式，也可以觀察到學生團體如何與在地、大學進行互動。

一、從紮根理論看鳳梨急行軍的製播方法

當一般的學生要進入在地、採集田野資料時，其實有許多可以參照的經驗與方法。最基礎、簡單的方法，就是透過課程內容的吸收，瞭解到進入田野場域時該如何問問題、找問題以及想問題，但是對於鳳梨急行軍而言，社團上並沒有這類的相關教學，更多的時候反而是透過成員之間的交流、舊成員帶著新成員一步一腳印地認識在地之後，逐漸發展出一套每個人各有不同的田野調查方法。縱使在定義上，學者 Geoff Payne 和 Judy Payne 認為，任何無法接受其整套理論程序

[16]改革先鋒 16 廣播創意人艾塞邀您： 一起採集生命的故事：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397152

的研究，都不能且也不應該被稱作是「紮根理論」（Payne, G., & Payne, J.,2004/林育如譯，2012：154），但是在紮根理論的概念、精神上，「歸納」與「演繹」的這一套方法，其實正好與鳳梨急行軍田野調查的方法有所呼應。

尤其紮根理論試圖從對觀察資料中所發現的模式、主題與類別的分析中推展出理論（Earl Babbie,1975/林秀雲譯，2013：484），它是一套企圖結合自然論與實證論以建構「系統性程序」（systematic set of procedures）的方法，並且用歸納的方式，對現象加以分析整理所得的結果（Strauss & Corbin,1990/徐宗國譯，1997：25）。甚至，發展紮根理論的人不是先有一個理論然後去證實它；而是，他先有一個待研究的領域，然後自此領域中萌生出概念和理論（Strauss & Corbin,1990/徐宗國譯，1997：25）。而當我們要檢視紮根理論是否能適用於社會現象時，也必須要透過四個標準進行判斷，包括：適切性（fit）、瞭解（understanding）、推廣性（generality）、控制。Anselm Strauss 和 Juliet Corbin（1998）也主張研究者要遵照下列方式進行研究：思考時保持比較態度、獲得多元觀點、定期回頭檢視與質問、保持懷疑的態度、依循研究程序（轉引自 Earl Babbie,1975/林秀雲譯，2013：485）。

這些歷程與精神，就像鳳梨急行軍在進行田野調查時的工作與準備一般。在進入田野場域之前，成員們除了閱讀相關書籍之外，也會將田調主題分門別類、進行延伸與探討等，這樣的延展與探究歷程，確實與紮根理論的精神不謀而合。尤其，「如何融入村民的生活之中」、「和村民當朋友」這樣的理念也是鳳梨急行軍一直以來的目標，但是該如何帶著與村民成為朋友的心態，進而製作廣播節目呢？製播的過程中又有哪些準備與因應之道呢？下一章節將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二、鳳梨急行軍製播節目的準備

鳳梨急行軍與中正大學傳播系實習電台「中正之聲—荊聲荊事廣播電台」於 105 年 3 月開始合作，正式對外放送廣播節目《急行軍講東講西》。製播期間依照寒、暑假劃分為第一季至第三季，截至 2018 年 6 月為止，總共完成了 40 集節目的製播，全部節目的製播內容如後面的〈附錄 1〉所示。從〈附錄 1〉我們可以發現，每集節目搭配 1 至 3 位主持人，並邀請三興村村民或者其他特別來賓參與節目。而在第一季的節目內容中，主要針對三興村的概況、歷史發展及文化著手，每集節目長度為 30 分鐘，首播時間為每週六晚上 9 點、重播時間為每周日上午 10 點。

為了讓節目內容更能記錄居民們的生活、並讓廣播資源的近用更為普及，因此第二季的節目內容則是將村民們本身的生命故事作為節目的主軸，節目長度也調整為平均一集 45 分鐘，播出時間也在詢問完村民收聽的情況之後，發現晚上時段不宜超過 9 點就寢時間，因此配合村民的作息進行調整，首播時間是每周一

上午 10 點、重播時間為每周二晚上 7 點。

與前兩季有所不同的是，到了第三季時，鳳梨急行軍有感於每周的製播時間較為短暫、準備時間較為倉促，因此決定拉長第三季節目的準備時間。在第三季前半段的節目中，擷取部分第一季與第二季的節目內容，重新修改、剪輯後再進行重播。而在後半段的節目集數中，則依舊發展新的節目內容，針對自身欲探討的主題、想認識的村民進行訪談並製播。即便有些主題後來並未發展成功、僅能以其他重播的節目內容替代，但對於主題順利發展的成員來說，卻也在製播的過程中有了不同的收穫與感受，這部分的內容也會在後面的章節進行詳細的描述。

節目製播的準備

為了妥善經營《急行軍講東講西》廣播節目的發展，在這三季的學期期初、期末，鳳梨急行軍會召開會議，討論社團事務之餘也討論廣播節目的「宗旨目標」及「主題規劃」。通常宗旨目標的討論較為費時，必須訂定一個大家都能接受、且持續運作一整個學期的宗旨目標，再由宗旨目標延伸出主題規劃、以及後續的製播執行。

像第一季的宗旨目標是「整理並延伸過往田調資料」，因此著重於將廣播內容與過往的田野筆記內容進行整理與連結，並且增加其他的資料、書籍閱讀，豐富田野筆記的內涵與深度。再藉由過往鳳梨急行軍累積的村民人脈，進行相關的訪談。透過層層堆疊知識的歷程，再透過訪談的歷程驗證知識的層次，更有機會以小見大、從大歷史中反思在地的影響與變化。

而依據第一季的宗旨目標，延伸而出的主題規劃，主要希望能讓收聽對象對於三興村的地理範圍、村落建築、過往的生活歷史等有概括性地認識，因此有了《走踏三興村》、《二戰前後的民間生活——民間生活的日本影》這些節目主題。概括性地認識之後，延伸到社區與大學之間的關係，因此出現了《給我一個鳳梨苗，給你一個陳厝寮》、《我家隔壁蓋大學》這兩個節目主題。從節目內容可以發現，先有村落、後有大學，然而大學進駐村落後，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為何？與村落互動關係良好的校園社團——鳳梨急行軍，又是如何在大學及社區之間互動、省思？依循著這些想法，產生了《鳳梨急行軍的前世今生》、《路邊 Club》、《進來社區的第一步》、《日文班的故事》等此類節目。

綜上所述，可以歸納出第一季的節目聚焦在三大方向：學校、社區、急行軍。學校部分談建校歷史，社區部分談產業、水文、社區營造等，集行軍部分談到民眾劇場等，而這些主題彼此又相互依存、環環相扣。尤其從節目的內容脈絡中其實可以發現，大多數成員們奠基於過往的田野調查經驗、戲劇展演以及讀書會等活動，對於大學及社區之間的關係已有較為草根性的先備概念，並且期待能串起大學和社區之間的友好關係，更希望能讓閱聽眾瞭解三興村的歷史脈絡與生活文化等民俗風情。尤其在第一季最後一集《日文班的故事》節目中，更是廣邀三興村日文班的村民一同進入中正大學傳播系實習電台錄音間裡、更真實地參與節目錄製，此舉是急行軍講東講西節目的里程碑之一，讓校方的廣播設備得以被村民

們近用，並讓村民們「眼見為憑」地進入錄音間的空間裡。事後部分村民也會以「我們有進去學校錄音喔！」見證著參與廣播錄製的實況。

從三興村的整體概念出發之後，第二季節目注重在三興村中個體的日常對話，也希望能讓更多村民聽到彼此的故事，因此搭配著第二季的宗旨目標——「開拓人脈」、「生活化主題」與「輕鬆製播」，在第二季的製播過程中，成員們必須走入在地、拓展不同於過往的村民人脈，並且將這些新認識的村民，他們的生命故事採集為廣播素材，因此有了和婚嫁習俗、嫁娶儀式相關的《阿公阿嬤羅曼史&婚姻習俗》、與女性生命史、家庭史相關的《女強人故事 & 三興村女性原生家庭成長故事》、以及與個人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身體保健知多少》、《小時夢想 & 小學（求學）時之日常生活》、《育兒經》、《行行出狀元 & 打工經歷》等，也有包括了與在地飲食、作息習慣相關的《庄內好滋味——早餐篇》，甚至是與大時代生活氛圍相關的《流行歌曲介紹分享》、《選戰風雲序幕》等。而在節目的實際操作上，成員郭育伶與許雅如共同擔任過主持人，這一系列較為生活化的廣播主題也讓郭育伶有不同的期待與想法：

> 我們這一年訂的主題就是跟生活比較相關的，然後我們那時候預設的就是說，這些都是跟他們生活很相關的事情，所以對他們來說應該會有很多可以談的，或者是說，相對來說沒有那麼的艱澀，然後是一個很日常的東西可以做紀錄。所以我們原本預設立場就是不管什麼主題，應該去問、都會很順利，因為是很容易回答的事情……因為我們那時候一方面也想說就是，我們上學期（第一季）做的廣播其實都侷限在我們原本就很熟識的村民之中，例如說珠華啊、簡敘啊等等的，所以我們就想說其實也可以、就是擴展更大的人際圈，因為就是希望可以接觸更多的村民，那我們才不會就是看的面向很偏狹，就是可能都是某一個族群，例如比較高齡的族群，然後像是比較、這村子裡比較中生代啊，或者是比較年輕一點，或者是說從事別的行業的，然後比較沒有在活動中心活動等等的，這些我們沒有接觸到的人。然後他們呈現的東西或他們的想法什麼的，就是我們可能會不知道，然後就是希望可以把這村子裡面對於這些議題的面向看得更廣吧！所以我們就希望可以再接觸更多的人，而不限於我們之前就是比較熟悉的那些村民（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正如郭育伶所述，透過拓展人脈的方式，瞭解村子裡不同世代的人們的觀點與想法、生活與經歷，成為了做廣播之餘所期待的面向。而究竟這樣的作法是否能讓田野調查與廣播產製的過程更輕鬆、較不困難呢？會在後面的章節中詳細介紹。而在這些節目中，有些是超乎原先的安排與規劃，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出來、並且足以發展為一集節目規模的，像《庄內好滋味——早餐篇》、《選戰風雲序幕》，在這些節目內容中即便沒有邀請村民參與錄製，也不代表沒有歷經田調的過程，甚至比起其他節目內容耗費更長時間的蹲點與觀察。因此，相較

於第一季大範圍的歷史層面，第二季談的是在歷史、經濟發展之下，每一位村民、個體本身如何面對與生活。透過較為輕鬆對談的方式，和村民們聊聊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與生命故事。

而在第二季的節目裡，由於成員們發現，第一季最後一集《日文班的故事》雖然提高居民的近用程度，但以實際狀況而言，要讓居民「走入校園」參與錄製存在著距離上的困難，也是大學與居民之間心理上的距離。因此為了克服器材方面近用的困難，以及因應第二季的宗旨目標，成員們決定採用「行動錄音間」的模式進行嘗試。藉由攜帶輕便的錄音器材進入村民生活的環境中，例如小型的指向性麥克風，或者是手機的錄音功能等，透過這些簡便的器材介入，試圖讓「錄製廣播」這件事情不再需要大費周章地邀請村民踏入校園，進入狹小的錄音間內，面對陌生的機器等，而是能在村民習慣、自在的日常環境中，營造共同參與、錄製廣播節目的氛圍。

綜觀而言，第一季到第二季的節目內容從整體三興村縮小至三興村村民個人，但又能從個人的生命及闡述中回歸到整體大歷史的脈動及發展。廣播的規劃上是希望能讓村民們聽見自己生活環境的聲音，但卻也在潛移默化中，讓更多急行軍的成員、中正大學的師生，聽到村民的聲音、向村民學習。

時序來到第三季，當時的宗旨在於修正第二季倉促的田野調查狀況，因此將田野調查的時間拉長，以便和村民之間進行更多的情感培養與故事採集。為了讓較為長時間的田野調查時間裡廣播不致停擺，因此第三季的前半段集數以重播的節目為內容，而在這段重播的時間裡，可以讓成員們有更多的時間走入田野，慢慢與村民培養關係，而後再將這些田野調查的成果製播、安排在第三季後半段的集數中。像是延續第二季的《行行出狀元—日本打工經驗》，該集成員黃詠潔延續第二季訪談過程中得到的資訊，跑到三興村裡的另一個聚落——溪底廊，認識其他也有前往日本打工的阿嬤，並將訪談內容擷取為廣播內容。同樣拓展田野調查地理範圍的還包括《豐收百工地圖》這一集，該集成員許雅如透過不同的田野調查方式，一邊與販售蔥抓餅的村民當朋友的同時，一邊瞭解村民對於學生的看法，並且進行廣播節目內容的錄製。又或者是由研究者製播的《草藥的秘密》這一集，亦是延續第二季的人脈關係，邀請村民闡述早期生活中常見的草藥以及當時的生活景況。

從第二季到第三季的歷程中，縱使節目內容產出速度較為緩慢，但其實也是鳳梨急行軍調整步伐、思考方向的階段。在此一階段中，剛好成員們都較為分身乏術，有些人忙於課業、課外活動等，因此也一定程度的消耗了原先預計要長時間進行田野調查的機會，但在此一階段中，完成廣播製播的成員們也有不同於過往的收穫，而未完成廣播製播的成員們也並非一無所獲，依舊跟著鳳梨急行軍的讀書會、電影討論會等活動持續培力、增能。

尤其，從鳳梨急行軍創立之初的部份活動中，即有進行相關的閱讀活動與討論，而從 2016 年開始，由於深感田野調查的廣度與深度除了有賴參與田野的經驗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更多相關知識的連結，才有辦法解決當前田野調查時遇

到的困境，或者開創更不一樣的田野調查內容，因此藉由安排更密集的讀書會、電影討論會等活動在社團課程之中，鳳梨急行軍共同閱讀過的書籍與影片有許多種，包括探討民眾劇場發展的《民衆劇場與草根民主》、《戲台頂的媽媽》，與田野調查經驗及方法相關的《芭樂人類學》、《邁向屏東學：認識論、社會結構與社區營造》，或是與在地社造及人文發展相關的《茶鄉社會誌》、《走進內壢》、《新類型公共藝術》、《老鎮新生》，也包括與大時代背景有關的《形塑歷史》、《純勞動：臺灣勞動體制諸論》、《勞工看的台灣史》等，而這些透過閱讀與觀影所累積的養分，也同時開創了廣播節目的深度與廣度，成員們藉由討論書籍或影片中的內容，將實務上田野調查到的資料進行參照，得到了許多不錯的成效，也更能明白三興村的歷史不再只屬於這個地區，反而是受到整個大環境歷史的影響、甚至是學生們的參與，而有了更多不同的發展。

三、小結：試著做出以「人」為本的節目

在聆聽《急行軍講東講西》廣播節目時也可發現，縱使廣播製播的技術層次未必高深，有些內容的收音甚至還有雜訊、過大的環境音、多位村民七嘴八舌討論的聲音等，但也因為每一季的廣播宗旨與目標漸趨明確，使得這些作品裡的每一種聲音都格外的具有意義。

尤其從廣播節目的發想到執行，整個歷程都需要經過不斷的嘗試與討論，才會成為最後的成品，因此如何以「人」為本、以村民為核心，慢慢建構出屬於三興村聲音紀錄的內涵，也是鳳梨急行軍不斷討論與修正的方向。

一項廣播節目的製播不是只有成品結果與閱聽眾的收聽狀況，還包括在製播過程中媒介如何介入、製播成員如何克服問題、以及讓村民參與製播的意義及目的何在？因此在下面的章節中即是要介紹，在這些以人為本的廣播節目當中，無論是製播廣播的學生成員、還是被邀請參與錄製廣播的村民朋友，彼此之間是如何激盪出火花的呢？

第四章 《急行軍講東講西》田野現場

本章節將時間點鎖定在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6 月此段區間，也就是鳳梨急行軍製播第二季與第三季節目的時間點，特別針對 6 位參與鳳梨急行軍廣播節目製播的成員，進行深度訪談。主要訪談方向及內容亦針對當時田野現場的狀況進行闡述，並依田野調查的狀況分為四個小節進行探討，分別是第一階段的「從認識開始」、第二階段的「從交流累積信任」、第三階段的「從信任到廣播製播」，乃至最後一個階段的「廣播製播結束後的省思」。

透過上述四個階段的抽絲剝繭，探討成員們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有哪些可循或不可循的規則及方式，有助於自身進入田野的環境之中？亦或在這些階段中有什麼樣的累積與做法，有助於自身在田野中與村民相處得宜？相關的提問與探討會在以下的章節分析中更趨立體化。同時也可以發現，在這 6 位受訪者當中，黃顯淨、宋慧昱、郭育伶、許雅如參與鳳梨急行軍的資歷較深，皆有參與過民眾劇場時期的演出，過往在三興村累積的田野調查經驗也較多，相反地，另外 2 位成員黃詠潔、黃釋賢參與鳳梨急行軍的資歷較淺，但一加入急行軍即參與田野調查及廣播的錄製，因此也可以在以下章節的內容中發現，在有些時候資深組和資淺組所需面對的問題有些不相同，也有些雷同，甚至彼此的因應方式也有各自的特色。

第一節　從認識開始

Geoff 和 Judy（2012）認為，田野調查的模型，是源自於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人類學者離開他們舒服、熟悉的家庭與校園並遠渡重洋、與他們不熟悉的人居住，而生活在缺乏工業化的地區，種種都與他們本身的文化相差甚遠（Payne, G., & Payne, J.,2004/林育如譯，2012：146）。這樣的描述就像是鳳梨急行軍的成員們踏入三興村進行田野調查一樣，成員們來自不同的地區、生活環境、生活背景，初來乍到中正大學讀書之後選擇進入三興村進行田野調查，在如此陌生的環境之中，「認識」成為進入田野的關鍵第一步，而這不僅代表著田野調查者自身必須要先瞭解田野的環境以及相關人事物，更包括田野調查者該如何被田野中的民眾們認識。

「認識」與「被認識」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關係，但是在「認識」之前，又該如何找到一個對象，甚至建立人脈呢？與他人的對話又應該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開啟呢？

一、　該海撈村民還是建立人脈？

在每學期的期初，鳳梨急行軍的成員們會帶著新成員「走踏」三興村，瞭解當地的人文風情，主要透過舊成員的帶領，帶著新成員進行田調等活動。但是在製播廣播的這段區間中，由於鳳梨急行軍決定開拓田野中的人脈新視野、蒐集更多不同的聲音，因此在內部會議中達到共識，希望每一組製播廣播的成員能盡量發展新的人際網絡、尋找其他村民，一同參與廣播節目的錄製。這麼一來，無論是新成員還是舊成員，必須面對的第一個難題即是——如何認識其他村民？

對於經驗較資深的郭育伶與許雅如來說，當時為了製播《育兒經》此集廣播節目，尋找具有育養孩童經驗的村民進行訪談，她們決定先從田野中熟悉的關鍵人物著手，而這位關鍵人物即是村子裡洪媽媽早餐店的老闆娘。起初之所以會認識老闆娘洪媽媽其實也是個巧合，因為倆人常常一早就到三興村準備進行田野調查與廣播錄製，總會在行動之前先到洪媽媽早餐店集合，邊吃早餐邊進行倆人的「工作會議」，規劃並討論當日的行動該如何進行，卻也在多次光顧洪媽媽早餐店之後，觀察到老闆娘洪媽媽本身其實對於三興村的事務瞭若指掌，也透過洪媽媽的介紹拜訪陌生村民：

> 我們從洪媽媽吃起，然後洪媽媽原本有推薦說就是金桔農莊旁邊有一戶人家有小孩，因為我們有跟她說我們想做《育兒經》，然後她就說那邊有小孩啊，他們應該蠻願意受訪的。只是我們去問的時候就是他們家裡忘記是誰剛好生病，比較不方便接受訪問這樣子（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由於原先預計訪談的計畫失敗，因此她們決定直接在村子裡走走逛逛、「海撈」村民：

> 有遇過就是她明明帶著小孩在身邊，但她就說：「噢！我不好意思接受採訪。」之類的這種。就是在經過「大樹下」[17]的時候遇到一個媽媽帶著小朋友，然後那時候本來說想要去採訪，可是她看起來就是不太想受訪……跟她聊一些就是跟小朋友有關的事，可是她看起來就是沒有想要受訪，我們就沒有繼續問了（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屢次計畫失敗的倆人，後來決定繼續往村子裡走，來到了一間雜貨店[18]，也是先在雜貨店外海撈一位村民想要進行訪談，但是未能成功，直到轉移陣地、直接與雜貨店大姊攀談後，才逐漸確信——雜貨店大姊似乎就是她們尋覓多時的受訪對象。對於這般屢次失敗的海撈行動，郭育伶認為仍然可以對此一行動保持樂

[17] 大樹下：三興村的便當店，也有提供便當外送等服務。根據鳳梨急行軍的田野資料指出，「大樹下」是村內居民公認乾淨又好吃的便當店，用料實在、食材乾淨衛生等，皆是有口皆碑。

[18] 雜貨店：三興村陳厝寮共有兩間雜貨店，各有不同的特色與樣貌。文中提及的雜貨店曾經在日治時期為糧食配給所，並從日治時期營運至今，雜貨店門口常有村民聚集、聊天。

觀，因為可以在海撈的過程中對陌生的村民有循序漸進的認識與瞭解：

> 因為海撈就是我們不認識他嘛，然後我們可能就是不知道他的個性或者是說不知道他對於這件事會有什麼反應啊、他的立場是什麼啊等等的，就是這些資訊我們其實是一無所知的，所以我覺得不是說不能海撈，因為你海撈的時候你跟他打招呼還有跟他談話，你才可以大概去認識這個人或者知道他的什麼。
>
> 可是就是我覺得要注意就是可能你談話的過程，或你跟他相處的這個過程要再更多一點，然後要再想更多一點，就是你可能要從你的話語裡面聽出說，他這個受訪者適不適合問這個主題？或者是說他散發的感覺、他會不會願意讓你錄他的音？等等的，然後適不適合我們很快地跟他說我們可不可以邀請你？還是說我們要再多拜訪幾次、跟他更熟一點我們才提出這個要求？然後我們那個態度要是什麼？要是很認真那種學生的感覺？還是說好朋友啊、很熱絡這種感覺？等等的。就是我覺得海撈這件事沒有不好，可是你在海撈的時候你是用什麼樣的態度，然後你要做什麼樣的觀察，然後在這些觀察之後你決定你下一步怎麼做？我覺得這才是重要的（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在海撈的情況下，雖然與村民的認識時間較短暫，但也讓郭育伶與許雅如發現，必須學會如何在短時間內對於當事人有更清楚的理解與認識，並在這過程中修正自己先入為主的想法、也修正自己原先預計詢問的問題等。而海撈的方式除了在路上閒逛、尋找目標村民之外，更能透過不同的媒介進行關聯性的海撈。像是當時奠基在過往累積的戲劇經驗，鳳梨急行軍共同討論出「照片尋人」的方式，藉由帶著一張輸出完整、最近一次〈2016 年〉戲劇演出後與村民共同合影的照片，走到村子裡主動找村民聊天、介紹鳳梨急行軍，並且隨機指著照片上未接觸過的某位村民，詢問可以在哪裡找到該位村民：

> 因為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些以前沒有接觸的村民，就是拓展人脈。然後拓展人脈就是先從那個照片裡面的那些人、就是有看戲的人，有些是本來就跟我們有接觸的人嘛，然後有些就是我們沒有接觸過的人，所以從這些「來看過戲但是不曾接觸的人」開始著手，就是比起去找一個完全沒有參與過急行軍活動的人來說，更好入手的感覺(笑)（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照片尋人」看似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然而實際執行起來卻也需要相當大的勇氣與決心，因此這項照片尋人活動也在田野經驗較為豐富的宋慧昱帶領之下，帶著田野經驗較資淺的研究者、黃詠潔、黃釋賢三人，一起前進三興村。研究者

發現，宋慧昱對於隨機接觸陌生村民的行動並不怕生，甚至也能藉由以往累積的田野經驗與人脈，透過熟悉村民們所說的位置與人名，慢慢循線、滾雪球式地找到照片中的陌生村民。宋慧昱親身體驗之後，她發現確實藉由照片尋人的方式更容易進入田野場域、和不同的村民接觸：

> 我覺得是有比較好入門吧！因為你去的時候，你就可以第一句話劈頭就說：「我們就是那個之前來演戲的那個！」然後就開始喚起他的印象，例如：我們在哪裡演啊？然後可以拿照片給他看、跟他說：「看！你在這裡啊！然後我們演的那個什麼什麼……」慢慢喚起他的印象，雖然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印象，但是至少就是有照片為證的，我們是曾經有見過面的人，就是有圖為證。而且因為他們已經來看過戲代表說他們是願意參與一些社區的活動，或是怎麼樣，然後就是也不要放過這個機會去跟他們認識啦，所以才會想說從照片裡面去找（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照片裡的村民或許未必完全瞭解、認識鳳梨急行軍，但是之前參與看戲的印象，卻也能透過具體的大合照相片一一被喚醒。同時也能讓進行田野調查的成員們進一步說明目前的廣播製播計畫，讓這些「來看過戲但是不曾接觸的人」更有機會參與廣播的錄製。也在這段現身與認識的過程中，透過村民們彼此有趣的牽線，拓展了更多的人脈。像是當時由宋慧昱、黃釋賢、黃詠潔共同製播的廣播節目《阿公阿嬤羅曼史&婚姻習俗〈下〉》，裡頭所邀請的村民夫妻來賓——李伯、彩鳳伯母，即是透過其他村民的牽線所認識的。尤其一開始其實是從照片中循線要找一位村民阿嬤，但是卻在誤打誤撞中找到了阿月阿嬤，並且透過阿月的介紹，認識了李伯與彩鳳：

> 認識李伯跟彩鳳就是因為要做《羅曼史》，然後羅曼史.....那時候先去找阿月，然後阿月就很害羞，她就推薦了她的好朋友彩鳳、挖坑給彩鳳，然後我們就去找彩鳳，就認識了李伯和彩鳳。可是其實那是我們第一次認識李伯跟彩鳳，我覺得李伯應該是認識鳳梨急行軍，因為鳳梨急行軍之前就是在赤牛居[19]演戲，所以他應該是知道的……那時候本來要找大合照裡其中一個阿嬤，可是我忘記到底是誰了，我們找不到她，不知道她到底在哪裡，然後就問了舜泰柑仔店的老闆娘，她其實也有點認不出來吧，然後她就說應該是那個誰誰誰，然後我們就找到了阿月，在社區活動中心對面那條巷子進去。然後.....後來發現好像可能應該不是她吧（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有趣的是，在這些誤打誤撞的過程中，也會發現像阿月這樣的村民其實是具備

[19] 赤牛居：三興村中的百年三合院之一，目前為李伯、彩鳳夫婦倆的住處。三興村在日治時期赫赫有名的保正——李赤牛，即是李伯的祖父，也曾經在國民政府時期擔任三興村的村長。早期鳳梨急行軍的民眾戲劇演出就曾經在赤牛居的戶外場地進行展演、並且邀請村民前來觀看。

錄製廣播節目特質的，但基於害羞或者是怕麻煩，因此反而介紹了其他村民給鳳梨急行軍認識：

> 阿月好像.....我也不知道欸，就是對鳳梨急行軍的印象模模糊糊的，因為就是問她說：「欸我們之前有演戲你有來看！」然後她就可能把我們演的戲跟別人或者其他活動混在一起吧！不確定她到底知不知道我們。反正因為一開始去的時候她就問我們說：「要衝啥潲[20]？」然後就跟她聊、跟她問了問。她其實也不吝嗇的跟我們分享一些，就是其實她也講了蠻多她婚嫁的事情，就是媒人啊、如何認識丈夫啊那些，可是說要錄音，她就說：「不要啦！」然後就叫我們去找她的好朋友彩鳳，她說彩鳳比較會講話，她自己不會講話（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不會講話」是阿月阿嬤與眾人再三推辭的理由，依據研究者在現場的觀察發現，其實當時阿月阿嬤並不吝於向急行軍分享婚嫁的事情，並且逗得大家非常開心，但是問起廣播這件事情時，卻是笑笑著拒絕，甚至介紹了好友彩鳳給大家認識，宋慧昱憶起這件事時，認為「廣播」這件事帶給村民的感受是：

> 普遍來說，跟村民訪談、聊天什麼這些都還O.K.，可是一提到說要錄廣播可能很多人就會覺得不要，就是可能覺得自己沒有講那麼好啦，不要錄廣播，感覺錄廣播是一件很難、很重大的事情。或是會覺得很麻煩，好像還要做什麼準備（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為了避免讓村民們覺得錄製廣播很麻煩，鳳梨急行軍的成員們也逐漸改成攜帶簡易的錄音設備，像是手機、輕便型的指向型麥克風等，甚至也不限錄音的場所，盡量以村民方便的現場為主，像是村民的住家、雜貨店前等村民日常聊天的場域等，但是該如何讓廣播這件事變的不只是場域與設備上的平易近人呢？除了必須透過急行軍的努力宣傳之外，還有一些實作上、循序漸進的改善，這些內容也會在後面的章節逐一展現。

在當時的廣播製播過程中，有些人使用海撈的方式，有些人則透過鳳梨急行軍以往累積的人脈、藉由舊成員帶著新成員認識既有人脈的方式，慢慢累積廣播節目的成果。無論使用哪種方式，在這些嘗試的過程中會發現，要從既有的人脈中進行廣播製播確實阻礙較低，因為已對既有人脈中的村民有相當的瞭解與背景累積，當提出要錄製廣播時，熟識的村民們幾乎都是答應配合的，甚至也願意協助急行軍的成員拓展更多適合的人脈。不過，無論是透過「海撈」的方式培養新的人際網絡、還是透過既有的人脈累積廣播錄製的經驗，都不是唯一的指標，相反的，一體適用的準則就是「觀察」，必須透過觀察與行動，才能瞭解村民願不願意參與廣播節目的製播。但是在行動的同時，還可能會遇到哪些困難呢？下一

[20] 衝啥潲：台語發音為 tshòng-siánn-siâu，「要幹嘛」之意。

章節將針對成員們遇到的「現身」問題進行討論。

二、該如何現身？

Geoff 和 Judy（2012）也提到，如何進入田野的重要問題在於：誰能給予進入的許可？或誰是所謂的「守門人」？守門人可能是給予正式核可的資深管理者、可供諮詢的工會官員，或是各種其性格或經驗足以影響同僚的非正式「領袖」（Payne, G., & Payne, J.,2004/林育如譯，2012：149）。而在三興村進行田野調查時其實並沒有所謂特定的「守門人」，所有的「許可」其實都是建立在與村民之間的熟識與交流過程中，而在取得村民們的認識與許可之前，田野調查者必須先「現身」。但是該如何讓自己被村民看見呢？或者又該如何克服自己的恐懼、出現在村民們熟悉的場域中呢？在進入三興村之後，該如何「現身」於村民面前，反而成為部分成員開口的困難之一。以黃釋賢為例，當時第一次拜訪陌生村民李伯時，是與田野經驗較資深的宋慧昱共同前行的，之後再次拜訪、單獨前行時，反而不知道該如何現身：

> 特別是剛認識不久的時候，就是那時候慧昱帶我們去認識李伯的之後幾次，再去找他的時候，因為第一點是自己一個人過去，第二點是他只看過我一次，然後我這次不知道怎麼開口……一個是介紹自己，我要說我是誰？就是如果有慧昱在的時候，我可能可以一起被介紹，說我是鳳梨急行軍的，可是如果慧昱不在的時候我要用什麼身分告訴他？譬如說我是用我自己嗎？還是我自己這個人？還是我要說：「噢，我也是急行軍的其中一位」？因為我同時有具備兩個身分（黃釋賢，2018/08/07，訪談紀錄）。

在這段「現身尷尬期」，黃釋賢既需要介紹自己是鳳梨急行軍的成員，同時也要不斷地反覆介紹自己的身分，讓李伯至少對於「這張面孔」有所印象。但隨著黃釋賢主動接觸李伯的次數增加，使得這段尷尬期並沒有持續太久，而也在跨越了這段尷尬期之後，彼此對於「稱呼」這件事不再感到尷尬，不僅是黃釋賢介紹自己時不再感到尷尬，稱呼李伯時也不再感到彆扭：

> 就是熟了之後我們其實不太介紹，他就知道說我來，就過去這樣子。就是我覺得可能一開始還不熟、可能還需要講一下我是誰……然後後來我覺得久了他其實知道你這個人，然後也對你有一些印象或是一些既定的看法……我一去我就直接叫「阿伯」，我也不會說「啊！李伯！」怎麼樣的，就是直接叫「阿伯」然後就直接開始聊天，就沒有前面那個不自在的感覺。到後期就是已經比較知道要怎麼跟他互動，因為可能在一開始還沒有很熟的時候都會想很多吧（黃釋賢，2018/08/07，訪談紀錄）。

同時，據研究者觀察發現，從「李伯」到「阿伯」這兩個字的演進過程中，雖然僅是一字之差，但卻將參與節目的村民從「受訪者」拉近至日常的「村民」角色關係中，也因此可以發現，在急行軍內部討論事情時，仍會以「李伯」稱呼該位村民，但到了田野現場，大部分的成員會以「阿伯」作為稱呼的起點，彷彿鄰人般的稱呼也讓拉近彼此關係的契機於焉而生。

然而，「現身」分為兩種，一種是姓名、身分的現身，如同黃釋賢的經驗中所呈現的。至於另一種，則是關於場域的現身，例如：急行軍成員如何在田野裡參與村民的生活及活動？如何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該怎麼進入場域並現身？看似簡單、毫無門檻，實則不然。

以下為成員黃詠潔的親身經驗，在前幾次進入田野場域、與村民聊天、製作廣播節目的過程中，黃詠潔都是由其他急行軍成員帶著同行的。然而在節目製作完成、播出後，急行軍成員檢討發現，該集廣播並沒有當場徵得該位受訪村民——素蘭阿嬤的同意，雖然內容並無涉及任何不實，但是在傳播倫理上確實有些疑慮，因此請參與製播該集節目的成員黃詠潔利用課餘時間拜訪素蘭阿嬤、徵得她口頭上的同意。但那次的拜訪卻是黃詠潔第一次獨自一人前往田野現場：

> 我第一次自己去的時候，就想說有點緊張，然後我就先繞到對面的資源回收場遠處觀望，然後我想說看一下有沒有人啊，後來發現好像來得太早沒有什麼人，於是我就去繞了村子一圈……就是從資源回收場那邊開始繞到琪琪優格，然後再轉個彎、然後就到後面，然後再切到珠華阿公那邊，然後再過來……然後我來得太早了，我就又在遠處觀望，發現有人了！可是我不太敢過去，我想說那我就等阿嬤少一點的時候，於是我就跑到金桔工廠去，然後去那邊吃吃喝喝再回來（黃詠潔，2018/08/07，訪談紀錄）。

依據黃詠潔的經驗來看，當時她的移動路徑如（圖 2）所示：



圖 2：受訪者黃詠潔移動路徑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紅色標誌區為主要經過的地標，綠點處為當時她預計要前往的田野場域——販厝[21]區，販厝區前方有一塊空地，每當下午時分，左鄰右舍的阿嬤們就會出來群聚在此聊天，有時只有 4、5 人，有時多達 10 幾人，當時黃詠潔與其他急行軍成員就是因緣際會下，在此處熟悉、認識村民，並且錄製廣播。

一開始黃詠潔走在圖中的橘色路徑上，抵達販厝區對面的資源回收場先行遠處觀望，當時人群還不多，因此她折返回到路口、並沿途經過琪琪優格、珠華阿公家，再接著紫色路徑回到販厝區一帶，觀望一陣子之後深覺太多人，因此前往金桔觀光工廠，待一陣子後再回到資源回收處觀望，發現人數實在沒有銳減，便敗興而歸。平常若是實際走一趟此路線，所需時間約莫為 20-30 分鐘，而當她首次獨自一人來到此處時，心裡反而充滿著游移與不安，表面上看似在三興村的其他各處「打發時間」，但實際上卻也在田野場域對面、隔著一條馬路的資源回收處觀望 3 次，總共花費了 2-3 小時，始終無法鼓起勇氣走入田野場域中，心中的緊張與焦慮不言而喻：

> 結果我就一直覺得阿嬤沒有減少，然後我還……就是繞完金桔工廠，我還繞到後面去，就是巷子的另外一端，然後想說：「唉，真的實在是沒辦法了。」我就回去（宿舍）了（黃詠潔，2018/08/07，訪談紀錄）。

黃詠潔表示，當時「很挫敗，想說我都搞了這麼久，一點說話的空間也沒有！」然而事後她選擇自行消化這樣的挫折經驗，當時也沒有特別跟其他成員提起此事件，反而是當下一次再度拜訪該田野場域時，再進行一次挑戰。黃詠潔描述當時的景況：

> 就是蠻尷尬的，因為她們就一直在聊天，然後我其實沒有講什麼話，可是我還是硬是坐在那邊，後來他們竟然還請我吃湯圓……我那時候還跟一位輪椅阿嬤聊什麼天氣，然後就覺得已經快講不下去了……然後那個阿嬤也沒有辦法移動，她就跟我聊天，就講那個天氣好好之類的。後來我就想說冬至快到了，就問她湯圓的事情，然後她就要請我吃湯圓。她就跟她媳婦講，然後她媳婦就端了湯圓來，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尷尬，就是好像沒有做什麼可是又吃人家的湯圓，而且其實我是要來問素蘭妳到底願不願意（上廣播節目）……(笑)然後我想說怎麼辦，一直沒有把事情達成，我還跑了那麼多趟。後來顯淨跟慧昱就來了，然後我就把湯圓分她們吃，顯淨就有問說：「啊我們最近有在做廣播啊，如果有問到你們的話，你們會不會願意上廣播節目？」之類的，然後素蘭就說：「啊這個沒差啦！」(黃詠潔，2018/08/07，訪談紀錄)

[21]販厝：台語發音為 huàn-tshù，連棟住宅之意。文中所述的販厝區每到下午時間，總有許多阿嬤們聚集在一起聊天，也成為了鳳梨急行軍蒐集田野素材的所在之一。

素蘭阿嬤的一句「啊這個沒差啦！」總算是間接地答覆了黃詠潔的問題、完成任務，應著村民與她共享的冬至湯圓，以及其他較為資深的急行軍成員出現，才使得她在當時不致無功而返，甚至在後面的章節也會提到，黃詠潔如何逐漸地在後來的田野調查經驗中，找到了自己在田野中的容身之處。

從以上的經驗來看，我們可以發現，「現身」這件事看似簡單，但是實際上卻是困難重重，包含著「身分現身」以及「場域現身」，如何跨出第一步現身、並且讓村民記得急行軍成員的臉孔？反而成為了一道難題。Geoff Payne 及 Judy Payne 認為，田野調查的準備工作所需要的並不只有耗費腦力，另一個主要的問題是如何進入田野、研究場景的選擇以及允許進入的協商過程(Payne, G., & Payne, J.,2004/林育如譯，2012：149)。但是究竟該如何進入？如何選擇？如何被允許進入？以上的提問常常是教導質性研究方法、田野調查等相關內容的書籍所無法解答的，必須透過親身進入田野現場，感受之後再進行抉擇、調整，才有辦法付諸實現所謂的「協商過程」。

而有些人對於「現身」的恐懼其實來自於「同理心」，深怕自己的出現會讓村民感到困惑、覺得不安，設身處地的思考著假使自己在家門口遇到類似的情形時，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 我覺得（做廣播）前期好像也會徘徊欸，那時候就是跟許雅如一起，就是都會在遠處觀察那個村民，然後再想說：「欸！要不要去問？要不要去問？」什麼的。對啊，就是會有點怕說、就是可能會想說：「欸.....他會不會很不友善啊？」然後就是沒辦法接受我們的問題？我們這樣是不是很怪啊？因為我們有時候也會想說啊如果我在家門口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然後問我這件事，我可能也覺得蠻怪的。然後就會想說到底要不要去問？後來想說：「啊！試一下好了！」就是這樣試。可是我到後來就會比較不那麼害怕，我覺得也跟我之後的其他經歷有關係（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以郭育伶的經驗來看，當時為了製播《育兒經》這集廣播節目的內容，必須瞭解村民養育子女的狀況，但是在不熟悉的情況下，又該如何讓對方願意說得出口？如何讓對方認識她們、並且接受她們提出的問題？換個角度想，假使自己是村民、遇到這般詢問時，大抵也是覺得很不太尋常、詭異的。但所幸這種對於「現身」的恐懼，也會隨著行動次數的增加、田調經驗的累積，以及其他相關活動的參與經歷而有所不同，像郭育伶就是這樣一個案例。除此之外，「現身」所產生的焦慮與不安，也會在某些時刻獲得舒緩：

> 我們那時候其實有遇到一個我們以為是（在地）村民、但是其實是定居在那裡好像沒有很久、一個物理系的老師。然後就是那時候以為遇到村民，他看起來感覺很緊張，好像是覺得說：「欸怎麼有人一直在看我？」因為我們在

那邊走來走去、走來走去，他就一直看著我們……之後我們就去問他，就說：「欸你好，我們是中正大學的學生，然後在三興村裡面做一些廣播。」這樣，然後他就說：「喔！你們是鳳梨急行軍？」喔！天啊！聽到「鳳梨急行軍」我們就整個鬆下來了，就會沒有那麼緊張（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尤其是當對方已經知道自己的身分時，現身時期的尷尬與緊張就能很容易地被化解、消除。當然，在這個案例中，先是由鳳梨急行軍累積一定程度的經驗與成果，再加上對方先前已有所聽聞、瞭解鳳梨急行軍，才有辦法在聽到關鍵字的情況下互相連線成功。但相反地，現身時期的尷尬與緊張也有可能產生落寞與挫折，同樣以《育兒經》這一集為例，當時許雅如和郭育伶想找具有養育子女經驗的村民受訪，最明顯的特徵與方法就是看誰家門口有小孩。剛好他們看到有一戶鳳梨農人家門口有高齡長者、中年人以及一旁玩耍的孩子，因此他們決定鼓起勇氣前往認識，並且在詢問養育子女相關的問題之前，先詢問對方關於鳳梨種植的問題、瞭解對方的背景與狀況，但是卻踢到了鐵板：

剛好就看到有一台卡車，就是他們在搬鳳梨不知道要運去市場還是哪裡，然後我們就問說：「欸，我們看到你們有在採鳳梨，那我們可不可以就是訪問你們一些關於鳳梨的問題？」然後他們那時候說：「啊！我們在沒空啦！你去問那個誰誰誰誰！」那時候就覺得蠻尷尬的，因為那時候我們其實是猶豫很久，然後才對他們發問。我們其實那時候已經來回走、在那邊走來走去然後踱步，在人家家門前踱步，想說：「到底要不要問？到底要不要問？到底要不要問？」就是猶豫了很久，才終於問他說我們可不可以問一下關於鳳梨的問題？然後就被拒絕了（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上述的情況看似很容易發生在任何一位初次進入田野的學生身上，但唯一不同的是，即便許雅如跟郭育伶已經算是鳳梨急行軍較為資深的成員，先前也已經在三興村進行過相關的田野調查了，但由於廣播的核心意義在於拓展過往未接觸的人群，使得她們的人脈經驗必須歸零、從頭累積，而在詢問這戶鳳梨農家之前，兩人已經先在村子裡其他地方認識村民未果，多了些挫折感但同時也多了些觀察與構想的準備，可惜的是在實務層面的結果看來，仍然吃了閉門羹。

然而這些關於現身階段的尷尬、不知所措與挫敗等情緒與焦慮，必須透過經驗的累積加以克服。縱使從上述案例來看，像郭育伶、許雅如這種對於田野場域較為熟識的人，相比黃詠潔這般初次熟識田野場域的人，看似擁有較多現身成功的機會，但其實未必能直觀地認為「田野調查經驗的次數」與「現身成功的機率」呈正比，反而是必須觀看每個個體進入田野現場時自身存在的差異性，以及進入田野的實況與心境，才有辦法逐一細細討論。但唯一不變的是，「觀察」成為了進入田野、認識人群的普遍通則，必須學習如何在觀察的過程中等待、如何在觀察之餘掌握切入的時機點等，才能更加提高現身成功的機率。

第二節 從交流累積信任

有了初步的交流與認識後，當累積到一定程度時，也能替彼此帶來信任的契機。但「信任」關係建立在許多事件上，未必是口頭上「我相信你」等字眼足以呈現的，或許會被縮影在互動的過程中、言談的關鍵裡。

一、關鍵事件「你、我」一體

對許雅如來說，當時為了製播廣播節目，她和郭育伶常常一早就先跑去村子裡的洪媽媽早餐店用餐，起初只是想要填飽肚子之餘，順便討論當日的廣播錄製行動該如何進行、該設定在哪些議題上，但也在用餐的過程中發現，早餐店本身就是村子裡的資訊交流站，再加上老闆娘洪媽媽不吝與她們互動、交流，因此洪媽媽也成為了她們在製播廣播節目時的關鍵介紹人，而也在某些時刻的互動過程裡發現，洪媽媽不僅把他們視作客人，甚至還有一層「朋友」關係的存在：

> 我覺得被村民視為「一體」的話可能還沒有那麼濃烈，可是會有把自己當「自己人」的時候。像是有一次吧！也是在洪媽媽早餐店，那時候就是因為我們想說要找洪媽媽，去的時候她正在跟一個客人聊天，然後聊一聊我們就說：「欸洪媽媽，我們今天來找妳了！」然後她就跟那個客人說：「啊！她們今天又來找我了！」、「她們今天可能要來找我做訪問！」或者什麼之類的，她就會跟她的客人講完之後，馬上就是過來跟我們聊天、跟我們寒暄幾句。那時候我覺得她就是有把我們當朋友，就是我們是朋友的關係，而且不是客人跟老闆之間的關係，那時候比較是感覺這樣，就是一個「欸！今天朋友來，然後我要來招待朋友！」的概念（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對於彼此是「朋友關係」的界定或許是主觀感受所致，但卻也是許雅如認為在相處過程中最為直接的感受。尤其有時候當她們在洪媽媽早餐店講起廣播的事情時，洪媽媽也會幫她們介紹給其他來吃早餐的客人認識，這層「關鍵介紹人」的身分，也彷彿為她們打上一劑強心針，讓她們在廣播製播的過程中更能與其他村民接軌、認識，甚至也讓許雅如認識了店裡的另一位常客阿嬤，藉機完成了另一集廣播節目《小時夢想 & 小學(求學)時之日常生活〈下〉》的錄製，這些累積的過程也有賴平時的交流，以及對方的性格所致：

> 洪媽媽真的讓我覺得那個關係是比較深入的……我覺得可能是跟洪媽媽的個性有關係，還有跟我們頻繁地去找她也有關係。因為我們每次都是去那

裡然後坐下來，我會先跟郭育伶聊廣播的事情，然後洪媽媽有時候也會聽到，聽到了就會說：「啊！妳們要做廣播了，今天要做什麼主題啊？」之類的，所以那時候她也會瞭解我們在做什麼，然後我們會回應她說我們正在做什麼東西，我覺得她已經是知道我們在做什麼，然後也知道我們正在找什麼樣的素材……我覺得應該也是她個性的關係，她是很容易跟人建立起老朋友關係的人（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也有成員認為，比起「學生來拜訪村民」的這種消費型關係，更多時候是好比祖孫之間的溫情與互動，像是成員黃詠潔和另外一位成員一起去葉仔寮製播第三季的廣播節目《行行出狀元—日本打工經驗》，遇到初次見面的受訪者秀碧阿嬤的時候：

我去拜訪那個秀碧阿嬤的時候，她就拿了這樣子（動作：手比出一個大體積）的鳳梨說：「這是今天早上摘的！」然後就削給我們吃，就是在我們訪談的時候她就拿出來削好，但是我們沒有吃幾塊，大概一、兩塊，結果她就叫我們帶回家、帶回去宿舍。她就說：「妳們是住宿舍嗎？」我們說：「對！我們是住宿舍。」然後她就說：「那我拿袋子給妳們裝。」後來她孫子就拿了一個袋子，把它全部都裝起來，然後她說：「你怎麼可以這樣裝！她們兩個是住不同的房間！你應該就是要把它分開裝啊！」我們就說：「阿嬤沒關係，我們這樣也可以分。」之類的，她就堅持說：「不行不行，就要分開，妳們這樣比較好弄。」然後她就分開裝，分開裝的時候還說：「我再去拿那個紅色的線把它綁起來。」我說：「沒關係！沒關係！」 但她還是去拿，然後她又說：「那我再去拿袋子！」就是要分成兩袋，讓我們比較好帶回家（黃詠潔，2018/08/07，訪談紀錄）。

相比初次在三興村進行田野調查的經驗，黃詠潔在後來的田調歷程中有了不少的進步，包括在葉仔寮第一次拜訪秀碧阿嬤就能相談甚歡，也讓她不再只是緊張難耐，更多的時候是能在言談中擷取田野資料，並且觀察到了秀碧阿嬤的貼心與零距離。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互動的過程可以看見村民與鳳梨急行軍成員之間的關係變化。像「珠華阿公的鐵皮屋」除了是急行軍成員常常拜訪的據點，也是村子裡的資訊交流站之一。尤其每周一到五下午兩點開始，珠華阿公的鐵皮屋就會聚集許多阿公阿嬤前來練習唱日文歌、臺語歌，每當急行軍來訪時，他們也總是熱情招待：

可能是像是跟珠華唱歌的時候吧！就那個當下好像就是反正大家就是開心的唱歌啊、練習啊、然後練習唱日語歌，就不會有太大的區別說：「啊！你們是學生，然後你們來這邊就是訪問。」的那種感覺，而是「欸！來，來，來，來唱歌！來吃水果！」這樣子。我就會覺得說，那時候好像比較沒有學

生跟村民的那種分野，沒有那麼的明顯吧！就是一個一起唱歌的狀態（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唱歌同歡」是在珠華阿公的鐵皮屋裡常見的情景。據研究者觀察也發現，他們對於學生的拜訪總是熱情以待，也會邀請學生點播自己會唱的歌曲、現場獻唱。「唱歌」這件事不僅是這些村民們的日常生活，更是讓學生融入這些群體的媒介及儀式。除了這些之外，也有成員觀察到，與村民之間的互動在熟識前後有所不同，像是成員黃釋賢因為做廣播節目的緣故認識了李伯，後來也因為要完成課堂期末報告而繼續與李伯保持聯繫，彼此之間的互動也與起初剛認識時不太相同：

我不知道李伯有沒有把我當成自己人，可是我覺得現在已經沒有像一開始那麼像是客人了。沒有像以前那麼客人、像客人的對待。像泡茶的時候他就會說：「自己來。」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對大家都說「自己來」，他就會說：「啊你要自己倒。」這樣子，所以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他把我當成自己人，還是這是他一貫的待客之道這樣子。他剛開始認識的時候會幫我們倒茶，然後後來他就說：「啊你要喝茶的話就自己拿。」他也沒有特別的客氣這樣（黃釋賢，2018/08/07，訪談紀錄）。

研究者也曾參與第一次拜訪李伯的過程，在當時的訪談環境中，大夥兒坐在李伯家亭仔跤[22]的茶几座位一帶，聽著李伯介紹家族歷史故事與發展，還有村裡的大小事、與彩鳳伯母相戀結婚的故事等，一邊聽故事之餘手中的茶杯也沒有空過，李伯總是泡出一壺又一壺的茶，熟練地邊聊天邊看著我們的茶杯是否空了、是否要多斟一些茶等。因此和黃釋賢後續的田野經驗相對照之下，發現與黃釋賢的觀察結果不謀而合，比起一些明確的字詞，互動過程中的某些環節有了變化時，也似乎意味著彼此的關係不再生疏。



圖 3：第一次拜訪李伯，李伯(中)向鳳梨急行軍介紹家族歷史

資料來源：研究者攝

[22]亭仔跤：台語發音為 tîng-á-kha，騎樓之意。

而在成員宋慧昱的經驗中，反而有出現明確字詞、讓她有「一體」感受的經驗，這個經驗後來宋慧昱也有回到鳳梨急行軍裡和大家討論、分享：

> 有一體的感覺，最明顯的故事就是你也知道的，黃菊那個。那個是去珠華那邊，就是珠華本來要去準備東西，然後黃菊就說：「不用啊，都是『家己人[23]』！」（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珠華阿公的待客之道也是眾所皆知的熱情，每當有人來訪時，珠華阿公總會端出水果、糖果、餅乾、飲料等，擺滿整桌、招待訪客，就連學生來訪時也是如此，在阿公阿嬤唱歌的過程中，珠華阿公還會不斷地提醒我們：「勿細膩！[24]」邀請我們趕快吃茶點。而宋慧昱經歷的那次經驗也不例外，當時即便已經結束了廣播節目的製播，但由於宋慧昱仍有持續關注珠華阿公鐵皮屋的日文班故事，甚至將此題材拍攝為畢業製作的紀錄片成果，因此與珠華阿公、黃菊阿嬤等人的互動更為密切。當宋慧昱來訪、珠華阿公正要準備茶點時，就被一旁的黃菊阿嬤叫住了，短短的三個字「家己人」卻也讓人更加理解在對方心中的地位與關係，在長時間的相處之下，變的更加不同。但從上述的案例來看，成員們即便與村民之間有許多良好的互動、關係的維繫，但是究竟能否透過這些經驗讓成員們認為這就是所謂的「一體」呢？倒也不是那麼地絕對，原因可能如下所述：

> 我覺得村民應該還是沒有把我們當作是一體的，因為實在是還是有太多地方不了解，生活習慣都還是差太多了。就是到目前為止，要成為「一體」，一定是要生活習慣有一些充分的相同之處，可是現在包括「住的地方」都還是分隔開來的，我們就是住在學生套房。或者是一些「人的關係」都還是很模糊的、就是他可能是他的誰誰誰，譬如說簡敘是紀穎的親戚。然後還有誰住在哪裡、或是他們平常的生活型態和方式，或是平常吃的東西，或是怎麼運作的，或是農業的產銷班，或是哪個合作社，那些都是怎麼運作的？我們都不知道，那就很難變成一體的吧！如果以現在這種狀況，只是說我們可能就是村民比較熟悉的學生、比較面熟的學生這樣。……應該是譬如說這邊是一體（動作：手往右邊比），然後這邊疏離（動作：手往左邊比），然後那種從來不認識、平常騎車咻咻咻經過的學生，可能就是很疏離的（動作：手往左邊比），但是我們可能是有時候會去找他們、稍微有點印象的，那可能就是有稍微移過來一點（動作：手從左邊往右邊比）。可是，如果有記住名字的、或是有時候在路上他們會主動跟我們打招呼的，不是只有我們就是說：「欸阿嬤你還記得我嘛？」那樣子的，就是像她們也會主動說：「欸！阿昱啊！」的那種，可能就又稍微過來一點（動作：手從左邊再往右邊一點比）。可是就會覺得如果說這邊是紅色（動作：手往右邊比）這邊是藍色（動作：手往

[23]家己人：台語發音 ka-k ī -lâng，自己人之意。
[24]勿細膩：台語發音為 mai-sei-li，別客氣之意

左邊比），可能就還是沒有踏到紅色那邊，就是要踏到紅色的話你至少要有生活是有共同的地方，才有踏到紅色，所以現在的狀態就可能比較接近、可能是黃加藍？紫色？紫色區塊，但我覺得到紅色還是差很多（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如果將宋慧昱描述的情況畫成圖表的話大致如下（圖 4）所示：



圖 4：受訪者宋慧昱所述內容圖示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疏離」的位置就好比沒與村民相處過的學生，「一體」的位置較類似一種未來願景、與村民生活環境類似的願景，在宋慧昱的想法中，若要被村民認為是一體的、或者自己產生與村民一體的感受，那麼在生活的各個層面就必須要有更多重疊的機會。相較於色條兩端的「疏遠」與「一體」，鳳梨急行軍的成員們大概是在中間的紫色地帶，這也大概是為什麼從上述的案例中，較不易看見成員們肯定地認為和村民之間產生了「一體」的感受，因為所謂的一體，在定義上因每個人感受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或許是發生在單一事件上，也或許是發生在某些互動的片刻裡。而本質上認為無法成為「一體」的原因，其實也是因為身為「學生」的過客角色：

> 其實在聊天的時候，我會覺得如果是一個社區的概念來講的話，我覺得我們和村民是分離的。對啊，還是之前也常講到，還是會覺得我們就是待在這裡唸四年就會走的學生。他們（村民）不會把我們真的當成這裡的居民來看，然後同時我覺得我們自己也有一種自己把自己帶入到「我們就是來這裡四年，然後四年之後就會離開」那種感覺，所以還是忍不住會這樣子想，然後以這種身份跟他們聊天、講話、互動之類的。就像洪媽媽也會說：「啊你們四年後就要離開了啊，之後要常回來看我們喔！」之類的這種話（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過客般的學生角色植基於每個人的身分裡，因此也直接地構成了「你們」、「我們」這般的區分，即便要消除這種身分上的分隔是不可能的，但如何從互動的過程中看出彼此的想法與心意，反而是郭育伶認為更為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好像也不一定要都變成「我們」啊，因為可能我們就是有這個身分，我們終究是中正大學的學生，但是「你們」的這個「你們」它可能不一定要是一個就是、跟他們完全無關的一個個體或群體，我覺得我們在這個跟他們截然不同的「你們」之中，他們(村民)對這個「你們」的想法或是態度，或者是這個互動的關係，我覺得是更重要的。因為我覺得他們(村民)把「我們」當「你們」其實是一個很常見的狀態吧！因為「我們」終究是一群外來者，然後我們是在他們的生活圈、也不是生活圈啦！就是跟他們生活的關係本來就沒辦法到那麼的密切，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好像是沒有關係的。然後重要的是，他對這個「你們」的想法是什麼？還有那個互動的過程（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即便離開、留下與否都不是構成你、我之分，甚至是「一體」與否的最大因素，或者換個角度思考，「一體」或「疏離」本身亦不是影響廣播製播的主要困境，但基於鳳梨急行軍製播廣播的初衷與原因，感受上的體會與累積是和真實的廣播節目成果同等重要的事情。再加上鳳梨急行軍從 2014 年開始透過民眾劇場工作坊等方式累積關於三興村的戲劇經驗、田野調查經驗等，使得彼此之間的關係經過長期的累積與基礎後，更為深遠，也逐漸能在三興村內累積出一股能量，讓村民們知道有一群中正大學的學生會來關心在地、拜訪在地，也在無形中形成村民們對於中正大學的看法，彼此之間的認識與理解或許不如「鄰人」般的熟悉，但卻也不似「過客」般的陌生，反而在這長期的互動累積經驗裡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或許「一體或疏離」這般的感受能否構成村民與成員之間、彼此心目中一致的感受，仍然不得而知，但若以達成田野調查的目的來看，其實能跨越「疏離」的範疇，已是不小的成果。除了特殊事件、互動上的進展之外，成員們又是如何與村民相處的呢？以下的章節將逐一探討與村民相處過程中的喜怒哀樂。

二、從生活到相處

起初鳳梨急行軍製播廣播時，即是希望能將在地的聲音、故事進行記錄，並利用「廣播」此一媒介，讓這項聲音紀錄更具價值與意義。但是該如何讓村民理解這層聲音媒介的涵意呢？又或者急行軍做的這件事是村民認為需要的嗎？甚至不談如此遠大的方向，村民會願意參與錄製廣播嗎？在互相理解與信任的過程中，該如何讓村民理解急行軍的作法與用意、並且願意參與其中呢？這之中其實藏著許多的未知數。

以郭育伶與許雅如所負責的廣播主題《育兒經》為例，當時她們拜訪了村子裡某間雜貨店的大姊，經過幾次的閒聊與對話之後，也獲得了大姊的認可與讚賞：

> 我們一開始就是走到那個大姊的雜貨店，然後就跟大姊搭訕.....她就是人蠻好的，跟我們聊天，我們一開始就閒聊，就聊說她在這邊做什麼工作啊、然後這雜貨店開了幾年啦、然後就是這裡村子的面貌是怎樣，就是例如說大家會常常在她家(雜貨店)聊天，大概四、五點或晚上的時候會到她家聚集聊天然後講八卦，誰生病，整個村子都知道，等等的，就是閒聊，然後聊得很開心。她也問我們說我們的學校啊、我們的科系啊什麼的，就是原本聊得很熱絡……後來我們就想說切入主題.....就是我就跟許雅如眼神對視，然後就想說可以切入主題.....應該是說我們在跟大姊談話前，我們有說明我們的來意，就是有說我們是誰、然後我們是鳳梨急行軍的育伶跟雅如，然後我們會在村子裡做廣播，她原本也覺得很認可贊同，然後覺得說很棒啊，就村子裡有很多歷史（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通常一般人如果接受到受訪者的認同，大抵會認為與受訪者建立了一定的互信基礎。但是互信的基礎該有多深？該達到什麼樣的程度才是足夠？卻是相當因人而異、需要加以確認並判斷的狀況。尤其在郭育伶跟許雅如認為已經取得受訪者的信任之後，想要針對《育兒經》此一主題加以詢問時，卻遭到了拒絕：

> 我們一開始沒有說我們這集要做的是《育兒經》，講到後來的時候我們就說：「噢！我們這次其實主題是《育兒經》，然後剛好聽到大姊你說你有兒子什麼的，那我們可不可以就是問妳這件事情呢？」大姊那當下的反應就是好像突然態度變得沒有這麼親切，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反正她就是一直推辭說什麼：「啊不要啦！不要錄啦！」然後就是：「也沒有什麼育兒經阿！小孩就是這樣養啊！」後來就說她有事，就走了（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在當時，對於大姊這樣的反應，郭育伶跟許雅如很是受挫與詫異，僅能先以「下次再來拜訪」等說詞化解尷尬。當她們下次再度前往拜訪時，大姊也推薦了她婆婆讓兩人受訪，但或許礙於對《育兒經》廣播內容的不瞭解、對於彼此的不熟悉，甚至可能是礙於此一主題過於敏感、有些私人的事情不方便透漏，大姊的婆婆也是再三推辭、甚至是推給坐在旁邊剝蒜頭的村民阿嬤（以下簡稱：剝蒜阿嬤)，但剝蒜阿嬤起初也是一邊剝蒜頭一邊跟大姊的婆婆勸說：「啊不要接受她們的訪問啦！」

在這種人際網絡與事件多重的雜貨店場域之中，也有一旁的村民跟剝蒜阿嬤說：「噢沒關係啦，你就跟她們講啊！」甚至一陣七嘴八舌討論後，郭育伶跟許雅如發現一旁的村民阿伯也想要回應問題，因此到最後，大姊的婆婆反而沒講上幾句話，倒是剝蒜阿嬤有一句沒一句地在回應許雅如的問題、一旁的村民阿伯則回應郭育伶的問題：

那時候大姊有說那不然問我婆婆好了，沒想到她婆婆也是一個低調的人不願意受訪，所以她婆婆就把受訪這件事情推給她旁邊的左右鄰居，她就說：「啊問她！問她啦！」問那一個在剝蒜頭的阿嬤，然後那個阿嬤其實也沒有很想要接受訪問，可是還是會回答我們的問題.....後面就好像剝蒜阿嬤也不太想理我們講話，然後旁邊有個村民阿伯就一直講話，我們想說直接轉移目標、轉移到那個村民阿伯身上，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是雙軌，就是育伶是訪問那個阿伯，啊我是訪問這個剝蒜阿嬤，剝蒜阿嬤不太想講話之後，她就說：「好，今天就這樣！」所以我就轉到育伶那裡去，直接專訪那個村民阿伯（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後來的廣播節目成果就是在上述的情況中，做成了一集「雙軌制」的內容，包含剝蒜阿嬤和村民阿伯的聲音紀錄及故事。也因為雜貨店大姊、大姊的婆婆、剝蒜阿嬤等人對於參與廣播錄製的抗拒，讓郭育伶及許雅如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有了不一樣的省思，包含製作廣播節目的「目的性」會讓田野調查中彼此的關係有什麼樣的變化：

我那時候蠻擔心的欸，因為我覺得就是好像是一種「帶有目的」的感覺。因為我們其實做廣播的初衷不是這個「目的性」啊，可是又因為這個題目(育兒經)好像就是要這個目的。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個目的放在心裡，就是《育兒經》這件事情，然後去問這個村民……然後就是因為原本的初衷也其實是我覺得這個廣播只是一個媒介，好讓我們去拉近跟村民的關係，跟可以去訪問到一些他們日常生活的事。但是當我們就是提出說我們要錄《育兒經》然後大姊這樣反應的時候，當下就覺得說，就是會不會被認為說我們去找她聊天其實是有目的的？那時候其實我跟許雅如就蠻錯愕的，我們也有討論一下，就覺得說這個資源的取捨有點難吧！而且就是一個陌生人突然來跟你聊天，然後就說要錄你的音，這連我們自己也會覺得很奇怪，而且《育兒經》這個主題好像也不是說這麼的親近（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郭育伶反思著自己在被大姊拒絕的過程中，是否會讓大姊產生「目的性」的誤解，然而這般「目的性的誤解」其實產生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及日常當中，甚至是無法避免的關鍵，也是許多媒體從業人員為了完成訪談必須直接面對的問題。縱使在一般媒體採訪的操作中，「目的性」是無須費心因應的問題，只要能夠完成採訪任務即可，但是以鳳梨急行軍的立場來看並非如此，要在與村民之間進行更為深刻的交流之餘仍要同時完成「廣播製作」此一目的，究竟要認識的多深刻才算足夠呢？認識多久才算深刻呢？會不會有些話題是永遠無法跨越的鴻溝呢？又該如何讓被田野調查的村民真心的覺得自己被當成朋友看待呢？郭育伶反過來思考著，當鳳梨急行軍使用「廣播」這個媒介時，該如何和村民的互動關係之

間進行平衡，也回憶起當時急行軍內部也有進行類似的討論：

> 就有在思考說，我們做廣播是不是也太有「目的性」了？就我們到底「跟村民的互動關係是什麼」這件事情。因為廣播就是有一個題目啊，然後你就是要去達成那個題目，可是那感覺就是帶有一個目的性去接近村民啊，可是我又覺得我們的初衷好像不是那樣，然後就會再更去思考說，就是廣播之外要用什麼與這個村民做互動嗎？怎麼讓他覺得說我們不是只是一次性地為了做廣播而接近他？之前好像也有就是我們在跟其他社員討論這件事的時候，然後也有人在討論一個問題是說，到底是要跟他多瞭解幾天之後，然後再去表達說我們要做廣播這件事？還是說一開始就說明清楚我們要來做廣播，然後再直接問他這件事情？後來好像也是說要觀察這個對象欸……可是我覺得就是好像也是要因應不同的對象或不同的主題，然後選擇不同的方式（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因應不同的對象與主題，進行不同的田野方式，成為了「目的性與否」這個問題的間接解套方法，成員們必須先盡可能地瞭解村民，並且藉由村民們能接受的方式進行廣播的錄製，或許也能消彌心中對於「目的性」的不安與疑惑。針對這些難以解答的問題，郭育伶和許雅如認為以《育兒經》此集廣播為例，如果換個身分、立場，當自己成為受訪村民時，在感受上勢必也會產生抗拒。反而應該在有了更好的認識基礎之後，信任感才會愈趨鞏固，也或許更有機會理解村民的想法：

> 我們覺得應該是從一開始就要有個比較好的基礎，就是不是直接去問說：「欸，我要問你《育兒經》。」或是什麼之類的，我們應該是從一開始就有良好的關係，然後建立久了之後，我們才可能問到關於育兒之類的、就是比較私密的這種東西。像我們那時候就覺得《育兒經》其實應該是要去問一些我們交往比較深的村民……相處比較久，然後也比較頻繁接觸的人，我覺得他們會比較願意跟我們說；可是如果像一般的村民，如果你當下一開始直接跟他見個一、兩次面就要說那你怎麼養小孩，那他可能就會覺得有點奇怪，我們那時候是這樣子想的（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對於節目製播時所選擇的對象與思索，許雅如認為應該要有更深入的認識、瞭解後，才能有機會理解到底節目的核心與本質，挖掘該集節目適合哪些村民的參與，許雅如甚至因此對比了參與《育兒經》與《流行歌曲介紹分享》這兩集節目的製播經驗，而發現看似簡單、生活化的節目主題，其實不比想像中容易執行：

> 當時就是被打槍到覺得說，《育兒經》是不是不太適合問？就是那時候有反省說，是不是《育兒經》這種東西其實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好聊？它其實蠻私

密的，因為就是關於講到「養小孩」，而且大家對於養小孩其實應該不會有一套系統，反而很多可能是「前人怎麼養那我就怎麼養」，啊不然就「隨便養隨便大」，那時候會想說《育兒經》會不會其實是這種狀態？很多人可能是要等到都養大了才知道：「喔！原來我是這樣養小孩的！」……那時候會想說其他的像是《流行歌曲介紹分享》這種就會比較好聊，就是會覺得《育兒經》可能真的是比較私密的東西，其實養小孩沒有想像中那麼好聊啦（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從這一整個實作的過程中，更讓許雅如及郭育伶發現採集廣播節目的內容時，必須有更謹慎的規劃與操作，甚至是更深層的認識之後，才有辦法作出更生動的節目內容。因此，在認識與理解的過程中並非理所當然的一帆風順，更多時候是必須在初次見面時，就要迅速地認識、理解村民，並且盡可能地引起村民的興趣。同樣也是受挫案例的還包括成員黃詠潔在第三季的嘗試。當時因為製播第二季的《行行出狀元 & 打工經歷》時，黃詠潔發現同樣擁有到日本削蔗金[25]經驗的不僅有三興村的素蘭阿嬤，當時也還有在陳厝寮隔壁的村落葉仔寮進行招工。因此延續對於這個主題的興趣，在第三季時黃詠潔進行了《行行出狀元—日本打工經驗》的製播，先和其他成員到葉仔寮走踏，並且透過前幾期的田野調查訓練，瞭解到必須先認識在地的關鍵人物，因此透過當地廟公、雜貨店老闆娘的介紹等，終於循線找到擁有打工經驗的阿英阿嬤，但是當時的田野現場卻有一些需要克服的狀況：

因為一開始我覺得那隻狗真的超可怕的，然後那隻狗讓我超緊張，後來見到阿英阿嬤問她的第一句就說：「啊你有沒有記得去日本打工的經驗？」然後她說：「啊！那個忘記了！」我想說這個也太直接了吧！然後我想說就是如果是一般的村民問她的話，就不會被這麼直接的對待。也許是她的個性、也可能是因為學生這個身份，或者我們對葉子寮很不熟的關係。我就覺得說，就是去到別的國家工作這件事情應該蠻特別，然後應該不會被問就說：「我忘記了！」因為感覺她說出：「喔那個太久遠了！」她說她忘記了、不記得了，就覺得好像……應該不會到完全都沒有辦法回憶，或是就是沒有辦法提供任何資訊，而且到日本感覺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應該會有一點印象，但是她講不記得，感覺有點像是在拒絕採訪的那種……而且我還想要用台語跟他們講話被他們拒絕，讓我覺得心靈受創（笑）（黃詠潔，2018/08/07，訪談紀錄）。

[25] 削蔗金：台語讀作 siah-tsià-kim，為早期日本召集台灣婦女至日本削甘蔗、跨海勞動的代稱。當時許多農村婦女被延攬至日本工作，或乘船、或搭機前往，在當地主要以採收甘蔗等農事為主賺取工資，通常每次能滯留在日本的時間大約為 3-4 個月左右。以鳳梨急行軍目前採集到的資料為例，三興村的陳厝寮地區與葉仔寮地區皆有女性長輩曾經參與此一跨海勞動歷程。削蔗金在當時蔚為風潮，有些長輩礙於家裡窮困因此選擇此一途徑賺錢。據長輩們表示，在日本的勞動過程中少有被壓榨的現象，大部分日本雇主會給予勞工們舒適的生活環境、豐富的伙食等，而除了工作之外，其他閒暇時間台籍勞工不能亂跑，若被抓到則有遣返回台的風險。

黃詠潔拜訪阿英阿嬤的當天，研究者也在現場，當時是由附近的雜貨店老闆娘帶著大家前往阿英阿嬤的家，並且先是由雜貨店老闆娘向阿英打招呼、詢問過後才換黃詠潔發問，但對於黃詠潔的提問，阿英阿嬤總是回答「忘記了！」之類的答覆。再加上一踏入阿英阿嬤家時，大夥兒就先被衝到面前的看門狗嚇壞了，而在過程中，黃詠潔試著要用台語和阿英阿嬤對話時，卻被阿英阿嬤說：「沒關係妳講國語就好！」也因此更為減損了黃詠潔的信心。

而除了這樣的狀況之外，還包括如何配合村民的生活型態，如何尊重與理解彼此對於「守時」這件事的看法。像當時為了採訪李伯與彩鳳、錄製《羅曼史》這一集廣播節目，宋慧昱、黃釋賢等人屢次拜訪李伯卻常常被放鴿子，回憶起這些經驗時宋慧昱認為：

> 我覺得李伯是有一點誇張，其他村民應該……以前遇過的村民就是你跟他約什麼時間，然後他就在那邊等你，約定好就是約定好。啊李伯是有點沒有把我們放在心上的感覺。因為像譬如說之前找簡欽阿嬤或是鄧翁雀阿嬤，或是珠華阿公，他們就是講了什麼時間，他會跟你講說這個時間可不可以，或是哪個時間可不可以，他就會跟你約好他一定可以的時間，然後他也沒有說特意等你，他就是那個時間就會在家裡，然後可能就有點在等你、或是在做其他事情，然後他一定會出現在那邊。啊李伯跟彩鳳就是第一次遇到、比較特殊，去好幾次都撲空，有好幾次嘛？反正就對啊有一次他們去泡溫泉。原本是我跟阿賢要做廣播的，然後去拜訪的時後發現他們跑去泡溫泉了，而且我們還是看阿月散步經過，然後她問我們在幹嘛，我們說我們跟李伯、彩鳳有約，她就說：「沒有喔，下午聽他們說他們要去泡溫泉。」才知道。就當下會覺得：「欸怎麼這樣？」但是下一次去的時候他就說啊沒辦法啊，就朋友找他去啊，真的沒辦法，那就是代表說朋友的那個邀約是比較重要的（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類似這種被村民放鴿子的狀況其實算是鳳梨急行軍的田野訪調經驗裡非常少數的狀況，尤其當李伯的狀況屢次發生時大夥兒都非常訝異，也不斷探究這之中的原因到底為何？究竟是李伯其實不喜歡參與廣播錄製？還是另有其他原因：

> 可能他就是臨時被朋友揪啦，因為鄉下人個性比較豪爽嘛，然後行程也不太固定，所以約了就走，然後有幾次我去是撲空的這樣子……當下一定會想說：「靠！怎麼那個說話不算話？」這樣子，可是後來想想就是，這就是他們的生活啊，我覺得就是年紀大了然後朋友約了，可能那個當下就是朋友約了嘛，興致一來就走了。我後來想想好像就沒什麼，可是事發當下會覺得很氣。因為你也知道，有時候學生常常就是時間很緊嘛，或是要常常抽出一個時間然後去訪，一個禮拜就那一、兩個時間，啊結果就被放鴿

子，不過我現在就覺得還好，現在看過來覺得那就是一個過程，也不會特別在意這樣（黃釋賢，2018/08/07，訪談紀錄）。

研究者當時也有參與急行軍的會議討論，在廣播節目即將播出的前提之下，宋慧昱和黃釋賢屢次想拜訪李伯卻時常無功而返，著實失落，但當時成員黃顯淨也有提醒大家，和村民之間的「時間約定」未必如大家以往想像的那樣。怎麼說呢？以常人的立場及經驗來看，會認為與對方約好什麼時間，那麼彼此就應該如期地赴約、出現，以常見的採訪現場來說也大抵是類似的狀況。但是由於鳳梨急行軍面對的是村民們，希望能進行長期的紀錄與觀察，因此尊重村民的生活型態顯得更為重要。尤其田野調查與廣播製播的過程其實都是有可能造成村民生活的困擾，因此更無法要求每一位村民都做到守時、守約的回應，反而應該回過頭來想：用什麼樣的心態因應、或者用什麼樣的方式跟村民約時間，才是最好的方法呢？像是後來黃釋賢為了書寫期末報告而去找李伯訪談時，也逐漸掌握了拜訪李伯的最佳時機與方式：

他不是在等我，他本來就在家裡，然後我過去看有人在家就過去問看看……就是我覺得我可能沒有很頻繁的去找他，沒有讓他覺得我好像一直來，而且可能他自己的為人也是很海派，就喜歡有人來找他，然後跟他聊一些東西。可能這幾次的互動都會蠻愉快的原因就是如果他已經不想回答了，我不會硬要他繼續講下去，或是一直在那邊等他回答，我大概會看一下狀況，好像沒辦法接下去了，我就可能看一下時間，然後說要上課之類的，就走了。我不會讓尷尬持續太久……有時候沒有對話是我們為了要沉澱、醞釀一下，或是讓對方講嘛，可是我有些時候會發現說這個時候出現的情況是，我們沒有辦法繼續下去，或是他覺得他現在不想講（黃釋賢，2018/08/07，訪談紀錄）。

後來的田野調查經驗中，黃釋賢未必會跟李伯約定個時間，有時候反而是看李伯在家時才會前往拜訪，並且適時地「進場」與「退場」，也讓這個方式逐漸形成黃釋賢和李伯之間的相處之道，更讓他發現有些田野資料的蒐集必須用時間換取，才有辦法問到更多、瞭解的更多。像是為了完成期末報告而跟李伯詢問三姓公廟與武館的歷史時，就有類似的狀況：

有一次我要跟他拿資料吧，然後因為他其實上禮拜跟我約好是這個禮拜某一個時間要去跟他拿資料，結果我到那個禮拜依照時間過去，過去的時候他說他沒有找到，然後我去那邊等，他說那不然他現在找，當下找給我。可是我發現他找很久，然後他說不然你先坐我們再聊，就是坐著這樣子，然後他就是也沒找到，接著他說他要去倒茶給我喝，可是那天我們閒聊完之後也沒有話題，然後他就一直看他的股票，剛好他朋友也來，我就大概

知道是時候要走了。因為他就一直倒茶給我，然後對話的對象也不會是我、是對他朋友，所以我就讓他跟他朋友去聊，我就說：「喔！我有事我先走了！」

然後另外一次是，我忘記是哪一個時候，好像也是做草根[26]的作業去找他，就聊一聊聊到武館[27]那邊，聊到最後我發現說好像沒辦法再繼續下去了，因為他就一直出現說，叫我去問誰問誰，問珠華或是問其他比較懂的人，他就一直說他不懂、他對這方面不懂，就是一些武館比較細節的東西……所以可能他回答不出來的問題、或是他覺得他沒有自信回答得好的問題，他就會希望我去問別人，所以我大概聽到這些關鍵字就會說：「喔！好那我就去問他。」我就不會再去打擾，因為一直問下去、一直待下去也是會尷尬在那邊（黃釋賢，2018/08/07，訪談紀錄）。

在這些交流的經驗中，黃釋賢認為李伯是個非常好客的人，即便覺得自己沒辦法提供更多資訊了，也不會明白地趕人走，反而是黃釋賢自己要學習從李伯的說法與用詞中得知，對談應該結束或繼續？繼續之後是否仍有更多資訊？而像「請村民幫忙找資料」這件事，更是要配合村民的時間與方便。以李伯的案例來說，黃釋賢認為當時繼續在現場也可能徒增李伯的困擾，再加上現場找不到資料、李伯的朋友也來到現場，使得「找資料」這件事反而是再更多次的拜訪，以及後續時間更為寬裕的情況下，李伯隔了幾週找到之後、主動借給黃釋賢的。

而在這互動過程中，更有趣的是，黃釋賢掌握了和李伯對談的訣竅，瞭解、認識李伯的生活之後，便更為清楚地知道要用什麼樣的方式與他開場聊天，也知道什麼樣的狀況必須適當地「離場」：

我覺得我跟李伯之間或許是他的風格、就是那個 tone 比較對吧！他其實就會希望你多聽他講，然後讓他一直講，他很喜歡講槌球[28]的東西。就是可能有時候你要去訪，你原本想問他跟廟有關的東西，可是你大概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時間都在聽他講槌球的事情，因為他很喜歡打槌球嘛，他又是隊長，然後還說出國比賽什麼的，他就跟我炫耀那些在槌球上的豐功偉業……或者是要先聽他講一下家裡最近發生的事情，對啊就是閒聊啦！或是他也會問我說：「啊你最近怎樣？最近在忙什麼？」這樣子。久了大概會摸清楚他的個性，所以就不會急著要去打斷他的話，或是急著想要問到我自己

[26] 草根行銷：為中正大學電傳所的選修課程，授課教師為管中祥副教授，藉由深入田野、閱讀相關文本的方式，向鄉民學習，並且期待能夠將學識上所學、所累積的榮耀歸諸於鄉民。

[27] 武館：根據黃釋賢（2018）的草根行銷期末報告資料顯示，早期在三興村陳厝寮的武館名「勤習堂」，成員有將近 50 位，每天晚上都有一群人在村莊內的空地操兵練馬、強身健體。武館有將近 50 位成員，但是近年來習武的場景已不復見，習武之人的兵器也已隱身在社區倉庫的角落。

[28] 槌球：三興社區有槌球隊，由李伯擔任隊長，帶著大夥兒每周固定練習以及參與各大賽事，三興社區的奪冠紀錄也是其他社區望塵莫及的，本篇研究中提到的黃菊阿嬤也是槌球隊實力堅強的成員之一。

想要問的問題。就會先讓他講啦，然後講完可能再從中找一些機會去問他問題這樣子。

然後他講完、他可能泡茶的時候，你就可以問一下：「欸！那個……」就可能我不會直接問到說廟怎麼樣，我會問說：「欸那個阿伯，你知道最近有發生什麼事嗎？」然後怎樣怎樣，我可能會從一個事件來問，來帶起我要問的內容。我可能不會直接插入話題，這樣會覺得很怪，然後這個時候你突然冒出這個點，他會先嚇到這樣……有一次他講完槌球，然後他就講到三姓公盃的比賽，他就開始介紹他的那個獎座。因為那時候我有問他：「欸你們槌球場最近怎麼比較少人了？」他就說：「沒有啦！」我就問他說：「那你最近辦的是什麼比賽？」然後他就說：「喔！就是什麼嘉義縣代表隊啊！」什麼什麼的，我就又問他說：「那你們平常練習怎樣怎樣？」然後「你們自己平常會比賽嗎？」他說：「會啊，像之前有辦三姓公盃。」然後我就可以接著問說：「啊那三姓公盃是誰辦？三姓公是誰？」這樣，就開始去問。我就不會很突然就說：「欸！阿伯！啊你知道三姓公是什麼嗎？」……因為有時候我去找他的時候，不會只有他一個人在那邊，可能他朋友在那邊，我可能就順著他的那個話題，然後直接去問。有些也是剛好誤打誤撞的啦！或者是，我覺得他幫我倒茶的時候，我也可以去問。就是因為倒茶算是一個轉折的地方吧，就會代表說這個段落的結束(黃釋賢，2018/08/07，訪談紀錄)。

談吐之間該如何應對進退、掌握「倒茶」的時機點進入新主題，成為了黃釋賢長期和李伯相處所累積的經驗與觀察，即便有時只是誤打誤撞，但卻也使得在三興村田野調查資歷較淺的他，越來越能掌握田野現場的狀況。而在錄製廣播的過程也可發現，「信任」是製播過程順利與否的關鍵，而信任的基礎源自於「認識」，因此成員們在此一歷程中隨時都在反覆檢視著自己和村民之間是否有足夠的認識與理解。而在這些相處的過程中，成員們發現，在田野中與村民之間對話的型態，也與一般大學生之間的互動不太相同：

噢其實我跟村民相處的時候都蠻緊張的，就是除非是一些已經有一些基礎的。像洪媽媽我就覺得還好，因為我就是嘴巴也在動、我在吃東西，就是我如果覺得尷尬的時候我就吃東西就好了，可是如果我當下沒有東西可以吃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尷尬。我就覺得像雜貨店大姐那裡的話就是，它就是外面的一個戶外場地，然後我們也沒有東西可以在手邊吃，那個時候如果聊到比較尷尬的話，就是可能突然沒話講的時候，我就會覺得已經很緊張了、早就很緊張了，然後又會說：「阿哈哈哈！最近怎麼樣……」那時候是馬上就接話進來。因為我們之前就是有聊天聊到空拍[29]的時候，像雜貨店大姊那邊超常空拍的，

[29] 空拍：在此一訪談過程中較為口語化的用詞，表示聊天過程中無人接話、無人回應的狀態。

空拍的時候我們就會突然又是「喔！最近鳳梨怎麼樣？」之類的。因為雜貨店大姊她家也是有種鳳梨的，就是如果是跟村民聊天的話，最常問到的就是：「啊最近鳳梨怎樣啊？」就是我們如果覺得尷尬的話就會這樣問。然後其實面對村民的時候都是很緊張的，就是對一些比較不熟、或是覺得那個關係可能要比較謹慎去建立的，那種就會比較緊張。可是像洪媽媽就真的不會，可能是因為邊吃也可以邊聊吧(笑）（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許雅如所說的空拍，就是聊天過程中停頓的片刻，有時可能是一個話題的結束，有時可能是一種不知道還能講什麼的停頓。尤其在村民的聊天場域中，大夥兒常常是面對面談天的，並不會邊滑手機邊聊天，也因此如何抓住村民聊天的方向、內容，成為了成員們進入田野裡必須學習的模式。根據上述許雅如的經驗來看，她發現在洪媽媽的早餐店裡，由於常常是邊吃早餐邊對談，所以當聊天到一個段落時，即便是空拍，也因為自己正在吃早餐，使得一切的氛圍也較不尷尬。當然這也包括田野對象（洪媽媽）本身給人的舒適感與自在感所致，這是人與人之間相處時最直覺、主觀的感受。面對其他較不熟識的村民時，植基於過往的田野經驗與觀察累積，許雅如也會依據田野現場的判斷，瞭解對方是否有種植鳳梨，因此使得「鳳梨」這個話題成為了普遍可以閒聊、彌補空拍的主題，因為這是村民日出日落生活中的一部份，總能有效化解許雅如認為的尷尬與空拍。而同樣的空拍狀況在郭育伶的經驗裡也有了自己的解套方式：

就是出現空白[30]的時候就會覺得好像有點尷尬，就要趕快想下一個問題要問什麼，就可能先轉移一下注意力吧，就先聊別的、變成閒聊那種感覺。就像是看到了什麼就：「欸？那是什麼？」或者是：「欸？你剛剛說安怎[31]？」就趕快先丟另外一個問題，可能之後再回去想清楚自己的問題意識，或是有什麼要補訪的地方，之後再說。因為有時候當下真的想不到，可是那就是一個聊天的狀態啊，就是跳脫一下自己原本的問題，然後可能就講一下感覺比較無關的事情這樣……就是可能問到不知道要怎麼問下一個問題的時候，也會轉移一下話題這樣，等於是說，就是因為心裡想著這是一個聊天的狀態，所以把它拉到別的話題好像也無所謂(笑)，然後來藉此就是因應那個接下來不知道要問什麼的尷尬狀態（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拋出別的問題」除了可以舒緩空拍的尷尬之外，也是在田野現場問完預設的問題之後，可以藉此重整思緒的時間，讓對談的主題回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也能藉機加深對於村民的認識與理解。當郭育伶和許雅如兩人共同製播節目時，「空拍」發生時大概會是這樣的情況：

[30] 與註解 29 相同，為較口語化的用詞。

[31]安怎：台語讀作 an-tsuánn，怎麼之意。

其實閒聊的時候，如果有空拍我們也會互相問：「現在是不是要接話？現在是不是要接話？」、「欸你接話吧！」、「丟個球吧！」所以我們還是會覺得那個空拍是有點不太自在。可是雜貨店大姐就會這樣（動作：雙手托腮）：「恩……」然後看著遠方，反正她就是坐在那裡沉澱之類的，然後我們兩個就會窸窸窣窣小聲討論，覺得是不是可以講什麼話……但是像珠華阿公跟翁雀阿嬤那邊如果空拍的話，我們通常也不會再丟什麼問題，我們就跟著空拍，不知道是不是相處比較久的關係就會這樣。可能因為他們也跟鳳梨急行軍比較熟吧！所以空拍的時候我們（許雅如和郭育伶）反而是互相聊天、互相講說：「現在還要問什麼嗎?」或是就像阿嬤可能就會問說：「啊你們還要問什麼？」之類的，他們就會主動問（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尤其許雅如跟郭育伶在搭檔製作多集節目前，也有累積了許多的田野調查經驗，對於急行軍既有人脈的接觸與互動也已瞭若指掌，唯獨在面對剛認識不久的村民時仍然較為生澀。也因此在經驗中剛好可以將與急行軍接觸較久的陳珠華阿公、鄧翁雀阿嬤，以及接觸較短暫的雜貨店大姊之間進行對照，使得空拍時產生的尷尬與不安因人而異，就連許雅如和郭育伶要互相確認是否還有問題時，也都會因為在熟悉或不熟悉的人面前，而有音量上、討論方式的差別。有時候甚至像較為熟悉的村民，也會主動詢問是否還有其他事情要詢問，而這也源自於過往與急行軍的互動及累積。

但是究竟「信任」這件事要如何確認呢？或者說要如何確定受訪者願意接受訪問、並且被電台放送出去呢？以郭育伶製作《育兒經》以及《庄內好滋味——早餐店特輯》的經驗來看，她歸納出了以下的方法：

一開始可能都以比較閒聊的方式切入，因為一開始如果講很學術性或是脫離聊天狀態的話題，就是蠻怪的啊，所以我們一開始也都是閒聊，像跟早餐店啊，然後再跟雜貨店大姊她們，也都是從閒聊開始。然後可能是聊到一個蠻熱絡的時候吧，也確認說這個受訪者其實蠻友善、蠻滔滔不絕的會想要跟你分享事情的時候，可能就會先試探一下，就是再把我們做的事情講清楚一點，然後他如果覺得是比較正面的回饋、就是比較正面的反應，我覺得我是用可能有點像沒有很認真、有點像開玩笑的方式說：「欸！那可不可以就是也請你錄一集啊？」什麼的，然後可能也會就是捧他幾句吧！就像是說：「這樣你的聲音會到廣播上欸！然後會放送給整個村裡的人知道欸！」之類的。然後就是慢慢地試探他要不要錄，如果說他的態度是像例如說像雜貨店大姊那樣是一個 180 度的轉變，可能就先暫停一下。可是如果是像早餐店他們，其實他們就會覺得欸蠻開心的、蠻願意，那就順著這個然後繼續說：「那我們就是可以邀請你啊！」就比較認真地邀請他（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透過相處、言談的過程中確認彼此的狀況，並且適時地修正，才有辦法讓村民著實地理解廣播節目的用意、以及製播的方式等，更可以讓鳳梨急行軍的成員們對於村民的認識與理解更進一步。在這些和村民相處的過程當中，相較之下較為沉默寡言、性格害羞、甫加入急行軍即開始製播廣播節目的黃詠潔，早期田野調查時常常因為過於安靜而被「身家調查」，村民常常問她來自哪裡、家裡的長輩關係與職業等，初期幾乎每次拜訪時都會被重複問個幾遍，也是因為這層互動關係，使得黃詠潔除了發現村民對自己印象較不深刻之外，更發現自己在平常蹲點認識環境與村民的過程當中，實在不擅長參與、進入村民的話題：

> 我真的實在是很難參與他們的話題，因為他們的話題有點太地方性了，我覺得就是好像只有那個圈子會知道。譬如說他們就是在那邊講說：「啊你知道那戶人家發生什麼事情嗎？」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在講誰，就很難猜。或者是他們最近也會約說要去幹嘛幹嘛的，然後那個我就也沒有辦法參與……可能是不熟吧！然後也不知道該怎麼，就是去了以後也不知道要聊什麼，因為本來生活圈也沒有什麼交集，然後他們在聊的東西也不是我熟悉的，那時候就會想說那這樣要怎麼聊天？然後就會很緊張，因為有的時候也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我就想說現在到底要怎麼辦？這樣（黃詠潔，2018/08/07，訪談紀錄）。

黃詠潔的焦慮與行為表現，其實是普遍對三興村感到陌生的學生會做出的反應。當時的她尚未對三興村有所瞭解，許多感受與認識都是透過舊成員的帶領，逐漸熟悉、進入狀況的，但是「到底要如何聊天」卻是除了熟悉田野環境之外，再加上個人人格特質，以及對於田野現場的敏感度等，綜合起來才有辦法做到的。尤其大學與社區在地理上並沒有過多的區隔，但是生活場域的不同，卻讓地理位置上非常相近、甚至幾乎重疊的兩群人（學生與村民），產生了不同的話題內容與性質。面對「無話可說」的情況，「找到自己可以待著的方式」成為了黃詠潔的解決方法：

> 一開始覺得尷尬應該是想說，「我是不是應該要講點什麼？」或者是「我是不是應該要跟他們主動聊天？」什麼什麼的。但是後來去了幾次就發現，其實如果我待在那邊的話好像也O.K.，就不會有那種一直想要講話、一直想要表現但是卻沒有做到的那種焦慮的感覺。所以隨著好像去了比較多次以後，就比較沒有那種一開始的尷尬感覺，就是找到了一個好像可以待著的方式（黃詠潔，2018/08/07，訪談紀錄）。

「自我定位」是田野中常常遇到的困難之一，因此對於安靜木訥的黃詠潔而言，要如何在很多村民聊天、聚會的田野現場找到自己的定位，成為了一開始的困境。但也透過自身的嘗試與觀察發現，其實「待著」並不影響自己的觀察行動，

更不影響村民的聚會，化解了自身定位的困境之後，反而不用急著表現什麼，更能沉穩地在之後的相處過程中更為自在。從這些生活到相處的經驗來看，有些成員因為拓展了新的人際網絡，因此對於新認識的村民是透過逐步認識的方式，慢慢找到彼此的相處之道。而有些成員因為找了既有人際網絡中的村民進行廣播錄製，因此更能有相對應的經驗可以互相呼應，甚至是做為借鏡，瞭解要用什麼樣的方式更真誠地與村民交流。較資深的成員們透過以往的經驗與方式，也逐步地在面對新的挑戰時重新修正自己過往的作法，而較資淺的成員們也並非一無所獲，反而從零開始慢慢累積，在這些或許開放也或許封閉的田野場域中，找到一些能和村民互動的適切方法，而當大夥兒每周在急行軍例會上討論這些狀況時，又更能增加彼此田野經驗的交流，讓己身的經驗值透過交流的方式逐步累積，也有了更多可以參考的方法。

第三節 從信任到廣播製播

在上述的歷程中，透過認識並取得村民的認同、信任之後，接著便能開始著手進行廣播的製播。但是在廣播製播的過程中，又該注意哪些事情呢？「庶民生活的語言及觀察」與「廣播主題的變化」是鳳梨急行軍成員們製播過程中的發現，將在以下的章節中做更詳盡的描述。

一、 庶民的生活、生活的庶民

郭育伶和許雅如發現，該如何將語言「常民化」、轉譯成村民聽得懂的語言，也是一大門檻。尤其當她們向村民說明要錄製《育兒經》時，村民常常無法理解的是，育兒經驗有什麼好做為廣播素材的呢？也或許是因為此一主題涉及個人的生活經驗，基於「家醜不可外揚」的想法之下，要把自己的私事公諸於世時，對於常人而言，難免會產生些許的抗拒與無法理解，因此在製播過程中遇到困難也是難免的：

> 要用比較常民的語言去跟村民互動，因為那時候《育兒經》我們就覺得說，講出《育兒經》然後大家就覺得：「那是什麼？我們就沒有經啊！我們就沒什麼育兒經可以跟你談！」（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因此當時她們思考著如何把語言轉譯地更為常民化，像是這樣的解決方法：

> 如果說我們是換個方式問的話，說不定會比較順利一點。就例如說……我那時候問阿伯的方式就是說，欸你養孩子的時候啊，你要去種菜(因為他原本講他的故事，就說他會去田裡工作什麼的)然後我就會換個方式說什麼：

「欸，那你種菜的時候你的孩子就是要怎麼顧啊？」然後「啊你以前都給孩子吃什麼啊？啊他玩耍、迫迌物仔[32]的東西是什麼啊？」、「啊你老婆生的時候有沒有吃什麼啊？」然後「孩子不乖要怎麼辦？」就是我覺得好像要轉換成一個比較接近常民的語言去跟他聊這件事情，就比較像在聊天吧！因為如果就說什麼「喔！我們想要問你的育兒經，請問你就是育兒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嗎？」之類的，他們都會覺得說：「沒什麼啊、沒什麼啊，小孩就是隨便養隨便大啊，啊這大家都一樣我有什麼好談的？」可是我覺得好像是要轉換成一個是比較貼近常民的語言然後去詢問他，就可以讓他講出更多的東西吧（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從郭育伶說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在「常民化」取材之前，必須更深入的瞭解受訪村民的生活與經歷，如此一來才能瞭解語言該如何常民。之所以能認識這位村民阿伯的生活，在當下亦是出於偶然，剛好村民阿伯樂於分享過往生活經驗，也使得郭育伶有了訪問的空間與機會，也才有辦法更進一步詢問跟廣播主題有關的事物。「常民化」語言的使用除了必須透過觀察、進一步理解之外，有時即便自己無法轉譯為常民語言，也能藉由受訪者的家人來進行。以黃詠潔製播第三季的《行行出狀元—日本打工經驗》為例，當時她們首次拜訪葉子寮的秀碧阿嬤，剛好秀碧阿嬤的孫子也在家，除了協助她們將問題轉換為台語之外，也為她們的訪談歷程增加了不同的觀點與角度，使得她更確信這些歷史是存在於庶民生活當中的：

我覺得那個孫子讓我感覺應該是問的角度會不一樣吧！就是如果我們問的話，可能會說：「啊你什麼時候去日本？」什麼之類的，然後他（孫子）可能會問說：「啊是不是那個誰誰誰還在的時候去日本的？」就是比較 detail 吧，也比較生活化，就問的角度會不一樣。或者秀碧阿嬤就會說：「啊你記不記得你那個阿祖什麼時候過世的？我就是那個時候去的！」然後孫子就會說：「喔我又沒有見過他，我已經忘記了！」……一開始就是覺得去日本打工這件事情，是沒有想過的一件事情，就是沒有想過台灣也有就是從歷史課本上面的話，不會有、也沒看過這種台灣勞動人口大量輸出到日本的歷史，尤其是婦女去做一些農事。但是從阿嬤她們那裡才知道說原來真的有這一段歷史（黃詠潔，2018/08/07，訪談紀錄）。

透過受訪者的家人轉譯訪談的問題，也讓訪談的門檻更為降低，甚至會把受訪者的人際網絡更開枝散葉地呈現出來。而有些受訪者的經驗更是未必曾與家人透漏過的，以研究者自身與黃詠潔共同參與的田野調查經驗中，前些章節提到不願受訪的葉子寮阿英阿嬤即是一例。當時阿英阿嬤的女兒也有出面，起初只是為了安撫家中不斷吠叫的大黑狗，後來則是協助我們轉譯問題、用更貼近的台語詢

[32]迫迌物仔：台語讀作 thit-thô-mih-á，玩具之意。

問阿英阿嬤。也在這詢問的過程中發現，阿英阿嬤的女兒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媽媽曾經到日本打工，「我都不知道我媽有這個經驗欸！」是當時在田野現場深刻地帶給研究者的訝異，也使得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因為有受訪者家人的陪同，有了更不同的發現。

在製播節目的過程當中，除了語言的使用、生活的觀察之外，更重要的還是必須回歸主題的訂定。如前面章節所述，鳳梨急行軍的廣播節目主題都是提早擬定好的，但是當田野現場發生狀況時，又該如何因應呢？

二、 節目主題如何制定？

以《育兒經》這集為例，當時除了找受訪者就花了許多時間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主題的呈現上，與起初擬定的有所落差。起初的主題宗旨在於提供一套鄉下人家、不同時代背景養育子女的方式，或許會有一些內容可以進一步歸納、整理，供聽眾參考，但是隨著受訪不易的狀況層出不窮，起初也讓許雅如對於節目的意義有些迷惘：

> 對於《育兒經》這集還是覺得怪怪的感覺，就是沒有一個明確的意義在。可是透過《育兒經》反而是學到育兒經以外的事情。像是可能我們遇到找不到素材的時候該怎麼辦？或者是因為在《育兒經》那集其實有問到那個阿伯他自己人生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覺得其實我當下已經沒有很執著在《育兒經》這一塊，就是當下在錄那個廣播的時候，還是以阿伯自己的人生故事來講，因為他也講到之前娶老婆怎樣，然後他現在的狀況怎樣，就是我們把它給記錄下來（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主題呈現的內容未必如預期的井然有序、可供聽眾參考使用，但是卻也聽到了更多關於村民的生活與故事，背後的脈絡反而更為重要，也讓這個主題有了更不同的風貌。甚至在錄製的過程中找到了更有趣的內容，像是成員宋慧昱與黃顯淨在製播第二季的《三興村選舉風雲》時，就發現了販厝區村民們之間的小聲對談是個可以發展廣播內容的契機：

> 有一次就是跟顯淨去錄那個選舉的事情的時候，她們就是偷偷的在講什麼的那種感覺，就是也沒有想要讓我們知道……那時候我們就繼續聽，是我們跟她們在講話，只是她們講一講突然就是用比較小聲的語氣，然後說：「那怎麼樣？怎麼樣？」但是那是一下子，就一、兩句而已，不是說她們就開啟她們的視窗，那個狀況就是她們突然在跟旁邊的人補充說明這其實是怎麼樣、怎麼樣（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從這神秘的小聲對話中發現了不一樣的機會，並且在一旁持續地觀察、聆聽村民說的內容，也在逐步瞭解的過程中掌握村民參與政治的方式與管道，並且引發宋慧昱和黃顯淨自身的好奇，想要一探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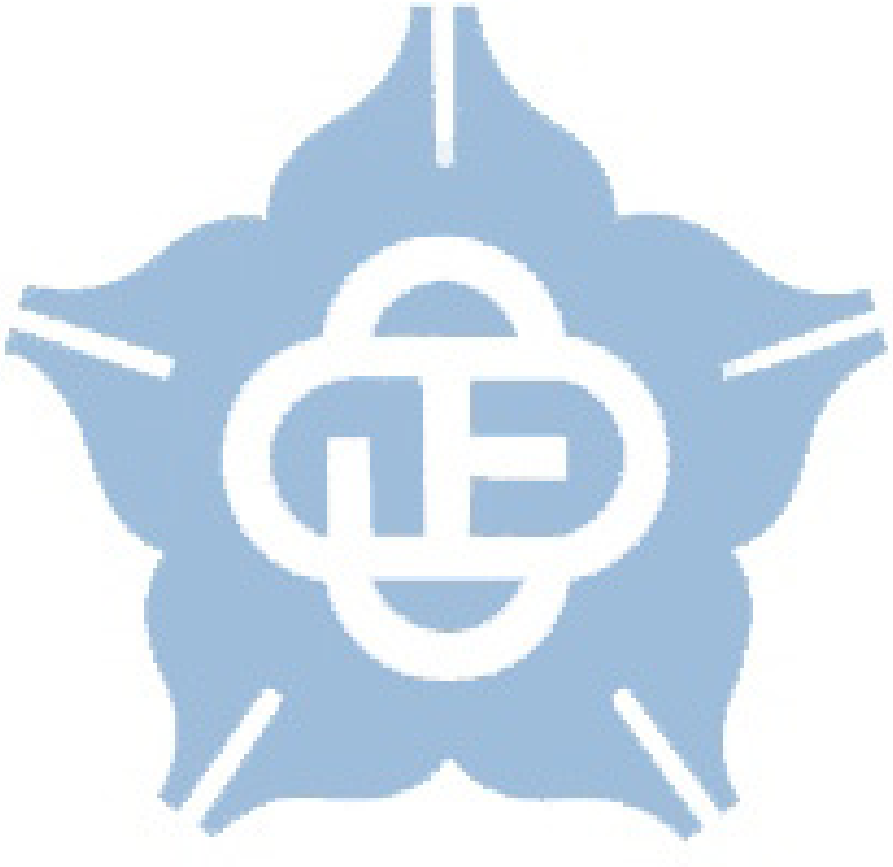
> 那時候是因為選舉快到了，就是現在這一波選舉，然後那個時候應該是翁章梁跟那個什麼達？張明達，就是他們兩個都在辦造勢晚會，然後剛好我們做那集的時候是張明達要辦造勢晚會，我們就想說可以去做這個題目，然後去錄一些現場的聲音。因為就是想說生活化一點，或是說一般民眾會觸及的事情這也算一個。因為就像我們在社區裡面也有阿嬤她們也說她們去參加誰誰誰的活動啊，然後她們對於參加這些活動的看法，或她們都受到兩邊邀請的時候會怎麼樣行動這樣子、或者怎麼樣的選擇。然後我們就覺得很有趣，因為那個造勢晚會有好幾場，在社區的時候已經聽到阿嬤她們說已經去過哪裡了，然後之後還有什麼，然後我們就按他們的時間在……應該是民雄國中那裡，去參加那個活動。其實就是去看看現場的狀況，然後瞭解一下說，喔！原來就是從三興村來講，阿公阿嬤他們有去參與，那其實我們在現場也可以看到其他村落的長者也好、也有年輕人、中年人，然後他們的政治參與的現場這樣子（黃顯淨，2018/11/15，訪談紀錄）。

也因此在該集廣播節目中，內容的視角從村民們聚會討論的地方，拓展到選舉造勢晚會的現場，這對於沒有選票的學生族群來說其實蠻特別的，黃顯淨也認為，平常其實不會知道太多跟選舉有關的事情，反而透過跟村民的交流、透過在社區觀察到一些現象，像是拜票活動等，才有辦法知道更多相關的資訊，並且能在實地參與及過往所見的經驗中，互相呼應、堆疊並認識地方的選舉生態。而這也更讓宋慧昱理解到，廣播主題與素材之間判斷該如何使用的標準，往往是自己的視野與觀點：

> 因為廣播的素材你也沒有限定說到底是什麼，而且本來就是從希望可以有一些生活當中的主題、比較貼近生活的主題，所以其實他們聊天的東西，也不是說不能做廣播素材，只是我們怎麼樣去理解，然後看怎麼樣發展。那感覺是靠我們自己，不是靠他們講些什麼（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在錄製過程中，正如宋慧昱所述，廣播主題與素材的取捨常常隨著田野現場的瞬息萬變而應變，而既然追求廣播主題與內容的生活化、多樣化，那麼多花時間瞭解田野現場的狀況，也成為了與一般廣播製播所需準備的事前規劃更不一樣之處，這時所謂的「擷取重點能力」其實也是成員們的重責大任，必須從田野現場中找到敏銳點，並且將內容藉機進一步瞭解、鋪陳為廣播節目的內容。尤其在製播這集節目之前，黃顯淨、宋慧昱早已常常出沒於販厝區，因此田野現場的村

民們其實都對她們倆人有印象，她們也較能掌握村民們聊天的內容與方向，綜上所述，這些經驗對於節目的製播與主題內容有著顯著的正向效果。在廣播製播結束後，除了豐碩的廣播節目成果之外，針對節目的放送效果、田野調查之後的省思等，讓鳳梨急行軍的成員們有哪些不同的思考呢？下一章節將進行詳細的介紹。



第五章 鳳梨急行軍的省思

伴隨著廣播製播的進程，鳳梨急行軍也會在每周的例行會議上討論製播過程中的反思與發現，以及廣播放送的效果等，因此本章節中將針對三個部分進行探討，分別是製播過程中進程安排與技術層面的省思，以及與成果層面相關的廣播放送成效、進行聲音保存時所產生的「困惑與迷惘」，以及製播結束後與村民之間的互動、田野省思，逐一探討廣播製播結束後的想法。

第一節 節目製播結束後的檢討

在這總共三季的製播結束後，研究者發現在原先探討範疇中的第二季到第三季歷程中，第三季的狀況其實偏離了原本的設想。在原本的設定中，第三季也有安排了許多精采的主題，尤其在第二季結束後，大家普遍反應田野調查的時間過於不足，為了因應大家進行田野調查的安排，再加上廣播的完成有賴錄製與剪輯音檔的技術，因此第三季的規畫為——前半季重播的舊節目為重新剪輯、修整過的內容，後半季才進行新節目主題的製播。但是在執行層面上卻未必如此順遂，後來連後半季的節目內容大多也是用前半季的方式處理，導致新的節目主題與田野調查主題並未如期發展與錄製，黃顯淨雖然在第三季的參與並不多，但透過每周開會的觀察，她以自身的角度認為可能有以下原因：

> 我覺得就是整體的這個安排還是太零碎了啦！就是說我覺得可能對我來講，做這個的動機可能不是很強烈，就是說我不知道做廣播這個方法，或者說我沒有仔細去思考，它要怎麼去發展成一個……比方說像民眾劇場，它的過程就是可能是一種培力，或者說是一種新的認識，這樣子。然後那個時候也是因為有老師來帶，或者說我們自己也有去做很多相關的學習吧，所以對這個方法的認識，基本上是會比較紮實，還有一個就是比較信任吧！因為它這個東西已經有很多的架構跟可以參考的經驗這樣子，然後自己又做了幾次這樣，或是相對上來講經驗比較多。但是廣播這件事情它對我來講，我覺得它會有一點讓我覺得很瑣碎。比方說從各個環節來講，就是說做田野可以就做田野啊，單純做田野。然後做廣播它又沒有辦法就是說那個觀看跟展演的關係，我覺得是很不明確的，這就是方法的一個部份嘛。那假如說做民眾劇場就很清楚知道說，我們最後的對象是誰，然後我們要跟他溝通什麼，然後我們希望至少在這個演出裡面我們達到什麼樣的效果，這樣子，可是廣播的這個東西它的方法就是不明確，然後可能我自己也沒有很仔細的去思考，就是說我要怎麼樣讓它變的比較明確，或者說可以在操作上要達成什麼這樣子。所以我覺得的確就是那個時候後來還沒有完成到第三季的原訂主題，應該就是這個原因吧！就是我就會覺得說，那其實可以就是依照我的問題意識然後做田

野就好，有點會覺得說：「欸，那做廣播就是要幹嘛？」這樣子，我覺得可能大家也會有這樣的疑惑吧（黃顯淨，2018/11/15，訪談紀錄）。

相較於民眾劇場時期有計畫、有方針的發展方式，「廣播」是一項大家初步接觸、共同探尋製播方法的成果展現之一，但是卻沒有與鳳梨急行軍較為類似的團體足以做為參考與模仿的典範，使得整個製播的規劃與執行呈現了不同的結果，甚至是人力上的配置也產生了困難：

另外也是因為就是整個廣播它假設說一個禮拜一集這樣子，就是它也可能是一個人要負擔兩集或一集這樣子，然後其實就是田野的問題嘛，就是說還有方法的問題，然後另一個就是我覺得技術的問題對大家來講好像還蠻大的。對我自己來講，我覺得比較大的是那個方法問題，就是說：「我為什麼要錄這個東西(笑)？我就把它寫成文字就好了！」然後我不知道我到底要錄給誰聽，或者說呈現出來它就是可以做為一個保存嘛，然後可能萬年以後(笑)有人聽到就：「哇！有這個事情！」這樣子。但是對我來講好像還是有一點不明確，然後我發現對大家來講好像技術問題，技術的門檻是一個蠻大的障礙這樣，錄音、剪接啊這個東西。因為其實我們一直沒有去很明確的討論或是規範這個事情嘛，就是告訴大家說：「喔！時間 30 分鐘，或時間 1 個小時！」然後你就把它剪接出來。當然可能現在就是電腦或者是技術這個東西它的學習可能已經不會是這麼困難了吧，但是可能對大家來講還是有那個門檻上的差異，這樣子。然後還有就是說要怎麼樣讓大家聽？聽的人是誰？它（收聽者）跟剪出來的、跟技術的連結就是說，它還是要有這個參照點，我覺得會比較明確。所以就是在這整個方法的模糊，也會在技術上產生困境這樣子。然後還有大家對技術門檻上要重新學習這件事情，會比較困難（黃顯淨，2018/11/15，訪談紀錄）。

人力上的困窘使得無論是田野調查、廣播錄製技術的精進等，其實都產生了連帶的影響。而當每一季節目開始執行時，常常每周就要產出一集節目，其實對於成員們來說都是不小的負擔。再加上尚未釐清廣播的收聽者與效益，也使得節目的製播過程中較為力不從心。相比之下，完整經歷過鳳梨急行軍民眾劇場時期的黃顯淨認為，雖然當時演戲的技術門檻較大，但是在問題的拋接與解決層面，卻相比廣播製播時期較能得到回應與解方：

我覺得其實演戲的技術門檻可能更大，可是因為它的方法明確、對象明確跟動機可能相對之下的明確，所以它其實也有老師來帶嘛，然後大家可以很快的把問題反應出來，就是拋接球可以很快地反應那些問題，或者說要做什麼事情它就是會比較快釐清，應該是說比較有參照的東西可以釐清，所以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多的困擾，或者說那些困擾是一個可以解決的、

待解決的。那如果是像廣播這個東西，我覺得它要解決的話，就是我們自己要花很多的時間解決，可是其實我們每次的開會時間都不太夠，因為可能同時還有很多事情要討論這樣子……以前做戲的時候是你要完成一個戲，它是一個有一點算是 Ending 的、最後一個火花這樣子，可是雖然廣播也是完成一個東西，但是其實它的能見度，還有它投入的資源，還有它雖然也是每周完成，但是它的火花可能對大家來講就沒有那麼大，我覺得這還是有關聯啦，就是說「呈現」，然後就是怎麼「被看見」，或者是說就是跟大家的重視程度也會有關係這樣子……可是我覺得那個累的程度也是做戲會比較高，因為做廣播你就也會有辛苦的時候啦，可是它可能就比較不是那麼長時間這樣子（黃顯淨，2018/11/15，訪談紀錄）。

民眾劇場的方法、呈現與領導有相對應的參照，但相反地，廣播反而沒有這些相關的配備與條件，成員們一切從頭開始摸索起，再加上鳳梨急行軍多工併行的狀態，使得廣播這件事能被好好討論的機會相當有限，更使得一集又一集的廣播匆匆開始，也匆匆結束，而這也成為了日後鳳梨急行軍若要製播廣播，必須克服的問題之一。

第二節 迷惘與省思

除了上述的問題之外，更需要深刻探討的還有廣播的效益這部分。究竟鳳梨急行軍製播了三季的節目之後，閱聽眾何在？是否有達到預期的聲音保存的效果？又或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多了哪些省思與改善方法呢？首先，在探索閱聽眾與聲音保存成效這兩部分中，雖然如前所述，黃顯淨認為產生了「不知道聽眾在哪裡」的困惑，但是回過頭來想，像郭育伶卻也認為這樣的歷程是必要的，也必然為廣播這件事帶來不同的發酵：

我自己會覺得這（廣播）是蠻重要的事情，因為我覺得我們做廣播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要很多人聽啊，然後如果有一、兩個人聽，其實也是慢慢在發酵吧！就是這一、兩個人聽，然後他們可能會告訴別人，或者是說針對這一、兩個人，然後他們就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其他的想法或什麼的，然後把它當成口述歷史來記錄下來，我覺得也是一個蠻重要的事情吧！等於是說我們不只是文字，我們還有一個聲音的紀錄，然後就會讓這些可以一直流傳下去。然後也許在某些時候，會變成一個蠻重要的資產或是可以回饋給這個村子，就是它事後的利用什麼的，我們目前也可能還不得而知啊！但我覺得並不能因為說它現在沒有人在聽、然後沒有受到關注就不去做這件事情，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蠻重要、留下這個聲音的紀錄這件事情（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不因為沒人聽就不做」成為了郭育伶製播廣播的核心價值，「閱聽眾在何處」的問題固然重要，同時也是鳳梨急行軍製播廣播過程中不斷尋覓的問題，但也不能因此而停下收錄聲音的腳步，無論收聽成效如何，郭育伶認為最重要的是紀錄的當下。黃顯淨也認為，整個歷程並沒有白費力氣，反而能做為未來的借鏡，最主要地，能在這嘗試的過程中累積更多的田野經驗，田野資料的深度與厚度也能於焉而生：

> 我個人就是可能比較不會完全那麼消極地看待吧！當然我覺得還是有很多可以再調整或改進，或是如果未來還要再廣播的話，它其實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尤其是在方法上，就是要怎麼做、然後為什麼要做、然後要做什麼，就是這些可能大家是要再共同釐清的。那如果是以現階段做的東西來講的話，其實我覺得有一些是蠻可以看得到累積。比方說就是像詠潔她們去採訪那個素蘭阿嬤嗎？其實我覺得那個是一個蠻好的主題，然後她也有帶莉庭[33]嘛，一開始好像只有詠潔而已吧，然後詠潔就有把那個主題帶到會議上來討論，那我就覺得蠻好的，我也有興趣，然後也有看、找了很多資料，相關的輔助資料，然後就是詠潔她自己也有把這個東西做成逐字稿，也知道就是說，欸這個東西它的……假設說素蘭阿嬤去日本打工的這個案例，然後它在其他地方，它是一個普遍性的存在，這個普遍性的存在它可以被討論到一個結構的層次，就是那個是在會議中我們有聊到的。那我覺得這個討論其實就還蠻好，而且是一個蠻紮實的案例這樣子。當然我自己是也覺得有學習到蠻多的啦！就是說從這個案例來看。那像另外我覺得也蠻好的就是說，就是第二個學期，我們不是希望可以有一些日常生活的比較主題嗎？然後就是像雅如跟育伶她們好像就有一些挫折吧！可是我覺得那也蠻好的，就是有一次走踏的時候，因為我都沒有跟她們一起去田野，就是我不是跟她們一起去田野，可是後來有一次帶走踏的時候就一起帶，然後育伶就有遇到那個早餐店的阿姨，然後她就是跟她蠻熟絡的，那個人是我們不認識的人，就是其實是我以前不認識的村民這樣子，然後我就覺得欸其實她們也有發展出一些自己的路線，或者是說可能她的人際網絡啊、她的認識這樣子，所以其實我覺得在這過程裡還是有一些累積啦！但是畢竟做的時間也沒有很長，以及就是說還有很多要改進、或者是說要再調整的地方，所以其實就是，可能當然中間有一些茫然或迷惘吧，可是就是我覺得那個是，其實應該是如果要解決的話，可以大家提出來討論解決的這樣子，對。但是也有一些收穫跟累積吧（黃顯淨，2018/11/15，訪談紀錄）！

以結果論來看，田野資料的豐碩累積與急行軍的人脈拓展，其實也是最初製播廣播時希望達到的目的，而在黃顯淨的論述看來，最後確實也有達到這些目標。

[33] 鳳梨急行軍的新進成員之一。

即便對於收聽成效感到迷惘與困惑，但不可否認的是，整個歷程裡成員們的體悟與感受卻是相當深刻的，甚至能將田野調查時產生的問題意識更加深化，做更進一步的探討與實證，而這樣的能力與好奇心，也才是能讓未來的田野調查歷程更加順遂的關鍵。

除了對於收聽成效的迷惘與困惑之外，製播廣播的過程中，由於有些田野現場需要花時間蹲點、觀察，研究者己身也常常會有「這樣有用嗎？」的質疑與感受，尤其是在蹲點時什麼都沒發現、一無所獲時，更會為自己在田野中的低敏銳度感到沮喪，田野中的患得患失有時也是伴隨著事前的期待與想像、甚至是過往累積的田野經驗，而有所不同。而這種「不知道要問什麼」的問題其實其來有自，成員黃顯淨認為這也是鳳梨急行軍從發展民眾劇場時，就曾經發生過的問題：

> 我覺得問題會是跟以前一樣，就是田野調查吧！其實跟以前的問題是差不多的，就是說如果田野調查它沒有一個問題意識的話，或者是說沒有可以更讓大家共同的討論、然後更進一步的深入下去，或者說大家沒有足夠的積極去做這件事情的話，就是那個故事或者是那個訪調的內容它就不會成形（黃顯淨，2018/11/15，訪談紀錄）。

如何形成問題意識看似一件簡單的事情，但卻是整個田野調查的歷程中，最不可或缺、最困難的部分。當沒有架構完整的問題意識時，在田野現場所詢問的問題也會變得較不立體、難以成形。類似這樣的困境，對於成員宋慧昱來說，也是她從民眾戲劇時期慢慢累積經驗，才有辦法克服的問題：

> 就是一直關注在某些問題上面，然後那些問題有時候如果你要一直更深入、更深入地問的話，一定是每次問完、每次田調完回來都要整理，然後同時也要有一些就是要看書啊、或是有一些新的知識，背景知識的補充，然後就是搭配或是互相的呼應，或是有一些其他成員給你一些意見，然後你才會知道說還可以怎麼樣去發展。所以之前我就常常會不知道要怎麼問下去，就是已經不知道說這個問題還能怎麼問下去，然後那時候就是其他像典翰[34]什麼他們就有去、就一起去啊，然後就聽他們的訪談的方式，就知道說：「喔！原來還可以朝哪個方向去問！」其實這個事情應該根本原因就是那個背景知識的不足啊，就是不知道怎麼問下去（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知識的不足」代表對於問題意識的本質沒有更多的閱讀與理解，也因此無法產生更多的想像與田野現場的呼應。為了彌補這些知識上的不足，如同前面章節所述、關於急行軍製作廣播歷程中所進行的讀書會、電影會等討論，其實正是具有補足知識不足的效果。而讀書會的重要性也是在每位成員實作田野調查與廣播製播後，更為深刻的體會，更加瞭解補充背景知識的必須性。在詢問村民的過

[34] 鳳梨急行軍舊成員之一。

程中，除了需要不斷向自己探尋知識的深度與厚度之外，更重要的是，宋慧昱認為從以前參與民眾劇場田野調查累積至今的經驗裡，讓她逐漸發現從「學生」的身份轉變為「村民」般的身份進行詢問時，可以更瞭解村民的生活、從聽到的生活經驗中詢問問題：

> 一開始我自己本來就是把自己當作是學生啊，然後用學生的身分去找村民啊，然後可能就是拉近學生和村民之間的關係。如果是「學生去找村民」感覺每次要不然就是要做一個什麼主題，要不然就是要寫田調，要不然就是要去找村民，就是如果真的沒有要田調、也沒有要做廣播、也沒有要幹嘛幹嘛，但是以學生的身分去找村民，感覺就是培養關係這樣子。但是就好像每一次都有不同種的目的，然後就會覺得好像……就是我想說如果都是這樣子想的話，會不會久了之後就覺得有點累吧！不是說我累了然後這樣想，我是說如果一直都是這樣子的話，應該久了之後會覺得有點累，因為每次都要想一個藉口去，或是如果沒有藉口的話就會覺得去了好像也不知道要去幹嘛。如果把自己當作「村民」的話，去找村民會比較自然一點，然後也是用他們的那種方式去跟他們溝通。就是把他當作是鄰居，把他當作是去散步然後找鄰居，然後你講的話也會比較自然一點，就是開始學怎麼樣跟鄰居講話那種感覺，像是「食飽未[35]？」然後就一些閒話家常，就是改變那個互動的方式。但是因為如果每次去然後就是要做訪談、要去問這些問題，然後跟就是剛剛說的比較是「村民對村民」那種、把自己當作村民然後去跟村民互動那種方式，就會比較貼近日常生活，然後變成說是我覺得很可以從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然後去發現可以問什麼東西……就是可能之前那樣子的方式是（學生問村民），有幾個主題的，譬如說我們想要瞭解這裡的農業，所以你一直去問農業的事情，然後找一些對農業比較瞭解的村民，然後去查一些相關的資料，然後去發展這些東西。然後跟第二種（村民問村民）就是在那個日常生活中，因為你瞭解他們的生活習性，或是瞭解他的家庭或其他的，就是瞭解他這個人之後，然後再從那一些他的生活周遭的事情去發現一些特別的地方，然後去問。一個是瞭解他的生活然後去發展主題，一個是從問題中去瞭解他的生活，就問一問才知道：「喔！原來你還有一個兒子在做什麼什麼！」或是問到什麼務農技術才知道說：「喔！原來你怎麼樣怎麼樣！」（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除了補足背景知識的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是融入村民們的生活之中，透過自身心境上的轉換、以村民的立場參與他們的日常，才有辦法更進一步地理解村民，也能在這過程中發展出更適合的主題，進行田野調查之後的成果發展。對宋慧昱來說，相較於「學生找村民」的方式，「村民找村民」的方式更可以消除以往的迷惘，尤其是那份擔心，擔心自己消費村民的太多、付出的過少，尤其是田野調

[35]食飽未：tsiáh-pá—buē，台語「吃飯了嗎？」之意，多用於打招呼時。

查的過程裡更能感受到一份「心安」：

> 會覺得比較心安的感覺，因為那個基礎是打在有那種「村民和村民」般的互動，那種互動一定就是雙向的，如果是「村民和村民」互動那就是雙向的嘛，就是你跟我講事情，然後我也跟你講我最近發生的、我也跟你講我爸爸媽媽的事情，或是我在學校的事情，就是一些個人、我自己的事情，所以那是雙向的。但是如果像是剛剛說的第一種（學生找村民）的那種方法的話，就有時候會覺得說好像一直是我們從村民身上在吸取一些東西，就是每次都是去找他們，然後問他們、或是一直聽他們說話，可是我們很少說話，其實那時候（民眾劇場時期）就有發現這個問題，就是那都是單向的，然後一直去「拿」，所以那個時候急行軍討論的時候也有說我們應該要增加一些平常的互動，就是有事沒事就去找一下，不是每一次去都是要問問題，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漸漸發展、然後又漸漸體悟到的那種轉變，就是其實大家都有發現這個問題，然後漸漸轉變，所以後來我就覺得那應該就是想像自己是「村民」那種感覺（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宋慧昱所說的漸進式的轉變，是從她參與鳳梨急行軍製作民眾劇場的時期即開始累積的，也在實作的過程中不斷找尋一種自己適合的方式，除此之外，她也認為「學生找村民」這種做作業式、一到村子裡就要問村民問題的田野調查方式，不僅久了也會讓自己過意不去，更可能造成村民的困擾，甚至無法再問出更深入的問題。但是只要身為學生的我們換個心態與身分，把自己想像成是「村民找村民」時，除了可以加深田野調查的廣度與深度之外，更能維繫與村民之間的情誼，達到「雙向」互動的意義。因此在鳳梨急行軍的田野調查討論過程中，成員們之間也常常提醒彼此有空時要到村子裡「走走」，藉由這種村民般的互動與關係，也能從鳳梨急行軍和村民之間累積出來的情感，看出一般學生和村民之間的互動，這兩種關係的落差。除此之外，學習如何在田野現場「待著」其實也是一門學問，參與村民們的日常對話與聚會，學習如何在這些看似雜亂無章的聊天過程中擷取田野的線索，像是當宋慧昱到販厝區參與田野時，總是會努力擷取阿嬤們的聊天內容：

> 就是聽，努力地去抓一些字，試圖瞭解她們到底在說什麼，或者看有沒有幾個話題可以插進去。就是你可能聽一些東西、就是一些詞，然後你可能整個話題聽不懂，可是有些詞你可能知道，她們有提到的某些詞，然後要怎麼插進去呢？就是譬如我會問說：「那個是什麼意思？」然後再慢慢問她們在講什麼……有時候就是你可能在那邊跟他們一起聊、或是聽，然後你也不一定有做了什麼主題，或做了什麼成果出來，可是就是認識、培養關係（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在培養感情、互相認識的過程中，擷取聽得懂的片段字詞，再加以詢問，把整個田野的輪廓點、線、面地圈出範圍、逐漸長出雛形，即便並非每次的參與都能直接、有效地有助於廣播節目的製播，但卻有可能是下一次節目主題的契機，甚至是廣播主題的核心素材之一，對於這樣的感受郭育伶也有類似的看法：

> 我自己會覺得說就是這個聊天、或者是這個沒有目的性的過程是重要的啊，因為那才是一個你真正地在跟這個村民相處的感覺跟狀態吧！而且我覺得他們聊天的內容也不是說完全沒有意義的，就是日常的閒聊之中其實我覺得有很多可以討論的啊，就例如說他聊天的內容其實也可以反應到很多的事情上，如果你事後去思考，就例如說誰家的孫子怎麼樣？兒子怎樣啊？然後嫁到哪裡去？去做了什麼工作啊？等等的，我覺得也可以反映他們很多的訊息。而且就連他們在什麼「地點」聊天？然後他對我們、跟我們一起閒聊的態度啊什麼的，我都覺得你要去想的話，其實也都是可以在裡面發現很多訊息的（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在田野現場「待著」不再只是毫無意義的事，反而成為田野現場可以擷取線索的關鍵，而也當然，對於不同的成員來說，並非每個人都能像宋慧昱、郭育伶這般地迅速找到一個在田野現場「待著」的方式，對於初次接觸鳳梨急行軍即參與廣播製播的黃詠潔來說，話少木訥的她有時也會對於參與田野現場藉以培養關係感到困惑，尤其當她初期在販厝區的田野現場，遇到許多阿嬤們齊聚一堂，但卻苦無切入點可以參與時：

> 會想說到底有沒有要來的必要，因為感覺就是參與不了，然後她們也是不會記得你，那這樣到底是有沒有真正的互動關係之類的。因為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說不想要因為廣播而去見面的感覺，然後想要可以參與她們的生活，或者是慢慢信任嘛，或者是更有信任感一點，但是感覺每次去但是達不到這種……我去的話好像每次去就是待到幾個小時，兩個小時就看一下時間，然後大概四、五點就會走，想說怕她們是不是要吃飯了……因為本來就是沒有事情所以才去那邊，那如果就是待得很短時間就要走的話，就是不會達到一個原本想要達到的目的啊，比如說我本來是想要趁人少一點的時候，想說如果待晚一點會不會人少一點？會不會比較好聊天？但後來就是人卻越來越多（黃詠潔，2018/08/07，訪談紀錄）。

無法掌握田野現場的狀況，使得即便只是「待著」也成為了一件困難的事，所幸後來黃詠潔也如前面章節所述地找到了適合自己待在現場的方式，既可達到和村民培養感情的目的，也可以讓她克服發言的障礙，靜觀村民們之間的變化。

除此之外，田野現場產生的迷惘還包括了挫折感，就像許雅如在製播、面對《育兒經》時的感受一樣：

> 《育兒經》哪一集真的是真的是超挫敗的，那時候也很迷惘，想說《育兒經》這集啊雖然是說它如果真的就是去問到村民，那就會是一個很好的歷史記錄、口述保存，可是又會想說：「我們現在說這些有用嗎？」就是那時候在做這集的時候就想說，雖然說是「保存」，可是其實都是大家知道的東西，就是大家養小孩都是這樣養過來的，所以會覺得說：「欸，是不是這邊就找不到一個……」找不太到一個方向吧！然後也不知道它保存下來之後除了可以紀錄聲音之外，還能做什麼？就那時候做這集因為一直找不到素材，其實就是一直撞牆，所以那時候又更覺得就是那集真的是非常讓人找不到方向（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田野歷程的挫敗讓田野經驗豐富的許雅如反覆思索著聲音保存的意義與目的，尤其是在素材的取捨上，一度讓她不知道方向在哪，所幸後來也藉由瞭解村民的生活、更接地氣的認知早期村民們撫育子女時艱困的環境等，使得這集廣播的意義不再只是被定位在「養育子女的方式」，反而鎖定在「紀錄村民們生活的環境」這部分，看似未必與《育兒經》有直接關係，但卻也是生兒育女背後最重要的脈絡。從旁觀察的黃顯淨也認為，田野調查與廣播製播的過程必須有一個完善的規劃，但由於大夥兒都是第一次接觸，所以難免有些現實與想像上的落差，而這也呼應了黃顯淨在前些篇章提過的問題：

> 田野調查的那個過程還是要有人帶，或者是說有一個完善的規劃會比較好。因為就是像廣播的安排它就是.....我覺得可以說比較沒有安排的這麼細緻吧！或者說在人力的分配上，因為一開始可能沒有想那麼多，所以大家人力上就是可能分組去做，就是說你這一集假設你幾號要做廣播，那你這之前就要去田野這樣。可能之前一開始有設定就是說每個禮拜可以針對就是下周的廣播去做田野的討論，或是說你田野了什麼可以在前一周做討論，然後在當周再做產製、錄音這樣子。可是就是大家沒有很紮實的去鋪排這個過程，所以就變成說準備的過程比較零散，或者說比較依照個人的能力跟意願去執行這樣子（黃顯淨，2018/11/15，訪談紀錄）。

時間、能力、人力的鋪排也都是田野調查、製播廣播的關鍵，因此當我們回過頭檢視時，仍會發現田野經驗的累積加上田野敏銳度的察覺，才是整個歷程中最重要的重點。而也因為每個人的狀況不同，使得田野的成效較為不同，像是對於從 2015 年就開始接觸、進入三興村的黃顯淨來說，在田野現場的互動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比方說像選舉那個節目，因為她們自己日常生活在聊，然後聊一聊我們也會有興趣，然後就會開始做這個方面的主題，然後也會進一步的問她們一些選舉的事情這樣子。可能對我來講是比較還好，就是說「做什麼事」或者是「要跟他們聊什麼東西」，是還好的（黃顯淨，2018/11/15，訪談紀錄）。

同時，黃顯淨認為每個人對於田野敏感度的不同，有部分原因也是受到個人的生活環境、知識背景、人文關懷等因素影響，並沒有孰優孰劣的區分，反而能增加田野的豐富與精采：

我覺得應該是每個人的狀況就會不太一樣，因為其實那個是對事物的敏感度也會不一樣，就是說你關心什麼事，然後你注意到什麼事，你就會朝那個方向去追問。然後有的人可能會往A路線走，有的人可能往C路線走，有的人往什麼路線走，就是因為每個人他的基本的知識背景跟學習的方式，或者是聆聽別人的重點都會不一樣，所以可能這個會有一些個人的差異……可能在鳳梨急行軍裡面，我覺得比較共同的應該就是會從「日常生活」下手，比較不會是說從一個議題，然後直接去切入問他們，就是會從他們的生活中，或者是說他們聊到的事物再去展開……這樣子可能親近感會比較強吧，然後別人、村民，或是跟你聊的對象他會比較願意跟你聊，因為你是進入到他的脈絡裡面，而不是讓他進入到你的脈絡、你的議題裡面（黃顯淨，2018/11/15，訪談紀錄）。

但是無論從生活中取材與否，其實都會面對「真實性」的問題，也就是說，受訪者所說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又如何有一套自己的方式去判別真偽？探索真偽的同時其實也涉及了如前些章節所述的「目的性」問題，許雅如就有相似的困惑：

如果是一些日常的內容，我就會覺得這會不會是廣播？或者這是口述歷史中需要的東西嗎？可是又會覺得這好像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們必須要刻意的去接觸，才能認識他們。可是又會覺得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不是需要這麼刻意？就是可能一直頻繁地去找他們啊之類的，這樣的東西會是我想要得到的真實的東西嗎？……可是後來又想說他們應該也不會這樣子想吧！應該是我自己想太多，他們應該不會這樣子想，就會想說，他們跟我講的應該都也是真的吧？應該不會是假的吧？反正他們都已經講出來了，他們都蠻直接的……因為他（村民）也沒有刻意遮遮掩掩，就會覺得他其實說的就是真的（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村民們的直接反應，成為了許雅如一套認定「真實性」與否的方法，而在「真

實性」與「目的性」之間進行平衡時，曾經感到困惑的她後來也認為，「目的性」的存在其實也能幫助廣播的製播，甚至進一步更加認識村民。而相同的「目的性」問題，當黃詠潔回顧初期的田野狀況時，也認為或多或少有被定位、目標過於明顯的狀況：

> 阿珠阿嬤就會說：「啊她們是不是又來找素蘭啊？是不是要來找妳？」或者問素蘭說：「她們是不是想跟你聊天？」然後素蘭阿嬤就說：「沒有啦！她們跟誰都可以聊天哪！幹嘛一定要找我！」好像就每次去都有點目標太明確（黃詠潔，2018/08/07，訪談紀錄）。

但是無論過程如何，對於黃詠潔而言，確實有達成起初製播廣播的初衷，像是在《日本打工經驗》相關的集數中，更讓她逐步實踐與對照田野中的生活與歷史：

> 應該是覺得好像除了歷史課本之外，或者是直接去問人的話，好像會更知道一些不同時代的事情，訪問完（素蘭阿嬤）才知道說：「喔！真的有這樣！」然後才去找那個資料……南華大學有一個教授好像有特別做論文出來，就是他訪問了在大林的人，然後也是有去日本那邊工作，也是有做削蔗金……我後來發現就是資料裡面的話，其實關於這個方面都很少……我就是很想要做好廣播，但是我真的都不知道怎麼好好做廣播，尤其是當第三季自己一個人主持的時候，要想說我到底要講什麼？我一個人我到底要講什麼？然後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但是覺得做廣播的過程應該會成長吧！譬如說一開始做得很爛，希望它可以做得更好一點……我覺得應該是有成長（黃詠潔，2018/08/07，訪談紀錄）。

製播過程中所累積的資料蒐集能力、問題意識發展能力，乃至於最技術層面的廣播主持能力等，其實都讓黃詠潔認為並非一無所成，也想要盡可能地做到最好。除此之外，在田野調查方面的能力也大有進展，當她帶著新加入鳳梨急行軍的成員進行田野調查時，也總能在田野現場發現，相較於初期那個安靜木訥、不敢發言的自己，後期自己的表現反而是相當主動並且無懼的。也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這一整套田野調查的流程、體系，甚至是製播廣播的順序等，其實都是靠著鳳梨急行軍成員們自行摸索、發展而來的，究竟田野裡有沒有一套 SOP 呢？郭育伶這麼認為：

> 我覺得做田野好像沒有一個固定的 SOP，就是因為要因應每個報導人的狀態，然後也有可能我們觀察到的一些細節啊，或這個地方的一些背景知識什麼的，然後就決定我們的態度，或者是要問什麼問題，然後還有要怎麼樣去切入我們所謂的「目的」這件事情（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田野方法的紮根是從實踐與反思中不斷發展出來的，像是許雅如也有類似的經驗，在第二季時她與郭育伶採用開門見山的方式進入田野、海撈村民，到了第三季時她改成用蹲點的方式進入田野，跑到了豐收村製播了一集與蔥抓餅阿姨有關的節目，兩季不同的經驗也帶給她不同的想法：

> 像去豐收做那個蔥抓餅阿姨廣播的時候，我覺得那時候是想說先做一個比較一開始基礎的認識，我先讓她認識我這個人，然後就是有跟她聊過天，讓她有點印象，我覺得應該是慢慢一步一步的來，就不會是像當初就是直接就——是喔！我知道這個居民有我想要的條件！然後就直接進入。我接觸蔥抓餅阿姨就會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方式就是，要讓她心裡先有我這個人、有我這個印象，然後再去做廣播，因為我覺得這個方式比較容易讓人家打開心房講話，(之前的方式)我覺得他們(村民)可能會有點害怕……其實我覺得開門見山會比較好(笑)那種以做廣播的話，就是單刀直入、直接問比較好，可是我覺得要維持關係的話應該是，就是先讓他有個印象，然後你們再慢慢去培養關係（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無論是哪一套田野方法本身就沒有優劣的問題，重點反而在於成員們如何在這之中找到屬於自己與三興村共同舒適的方法，進行田野調查。也能從這些經驗中，不斷地精進、淬鍊出更好、更特別的相處之道，像是後來宋慧昱也持續配合三興社區發展協會關懷據點的每周聚會，在三興村帶領村民們進行民眾劇場的相關戲劇課程，在帶領課程的過程中，她從平常的學生身分轉變為課程領導者的身分，身分上的轉變也讓她感受到與村民之間的距離又更靠近了一點，她以前面章節討論到的（圖 4）色彩光譜進行說明：

> 我覺得像是因為有去社區上課，應該整個鳳梨急行軍上了三次課，然後後來有一次我有去放紀錄片，然後還有上課，還有昨天也去上課，反正那次(第一次)我沒去，但是我覺得就後面兩次我去過就覺得有上課之後，好像又會更接近一點……雖然還是紫色區，可是你又是更靠近紅色、往紅色一點，因為他們就譬如說昨天去的時候，他們都說記得我，然後那個雖然就只是一個「禮拜四早上兩個小時」的時間，但我覺得有點像是一個魔幻時光的感覺。因為你在那邊就是整個關係就會變得很不一樣，你在那邊突然變老師，然後去帶他們什麼活動，就是身分什麼都變得不一樣。大家變的都聽你的，然後你好像變得很有學問還是怎麼樣，就你好像要去教什麼東西，也沒有教什麼，只是去帶一些活動、運動而已，然後在那兩個小時裡面我們可以做很多東西，就是像是昨天那種什麼打招呼遊戲啊，或是有一些很親近的互動，譬如說抱在一起、或是手牽手，就是感覺是那兩個小時之後，你踏出社區活動中心之後，你踏出那個門之後，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時空的感覺……平常你也不可能、也不會去跟他們這樣子抱在一起，或是談論

一些事情這樣子。然後身分也不一樣，就是「學生跟村民」還有「老師跟村民」，就是被叫「老師」還蠻奇怪的，但他們也不是叫老師，他們就叫我「阿昱」（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除了距離的拉進之外，還包括透過拍片的歷程更加認識村民們的生活，發現了與以往田野調查時不同的視角，並且能更進一步修正自己田野調查時該注意的方式：

因為一開始就跟認識陌生人一樣啊，你要先瞭解他有一些什麼忌諱的，然後有什麼相處、怎麼樣講他會比較開心，或是怎麼樣講話不行……可能日文班最明顯，就是珠華阿公的日文班。因為以前一開始去找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兩點到四、五點，然後一開始去的時候，我們就是想要認識珠華阿公跟這個日文班，就覺得很特別、很特殊，然後我們都會利用那兩、三個小時的時間去那邊訪談，那時候剛認識，等到漸漸比較熟了之後，尤其是又拍紀錄片[36]之後，就更瞭解他們整個一天當中，可能之前對我們來說就是那兩個小時的時間，其實就是日文班的全部。可是就是拍片之後，你又知道他（珠華）整天的生活，才知道那兩個小時的時間佔的只是一個小部分而已，所以就感覺是有點跳到比較遠的角度去看，然後就是回頭再想那兩個小時的時間，我們用那個時間訪談，可是其實那兩個小時他們是不適合訪談的（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在後續的拍片歷程中宋慧昱才發現，原來過往鳳梨急行軍成員們普遍認為適合去珠華阿公日文班進行訪談、田野調查的時間，其實是許多參與日文班的村民們最為寶貴的上課時間，雖然他們的上課方式就是不斷地練習唱日文歌曲，但是整個練習的過程透過她長期的觀察發現，其實是有脈絡與規律可循的：

以前剛認識的時候我們都想說那個時間剛好大家都來，然後可以利用那個時間訪談。但是因為拍片，然後你就常常在那邊坐很久，你可能在那邊坐滿兩、三個小時，然後你看到一些人來人往，你發現他們有一個進度，譬如說一開始來的時候就是先複習，一人先唱 6 首歌，先複習，然後接下來再開始唱新的歌、試試看新的歌，然後還有一個完整的歌譜、一條一條這樣試唱，因為他們都沒唱過。譬如說昨天唱到第 6 首新的歌單，然後今天你的 6 首複習完了，大家複習完就開始唱新歌，然後就從新的歌單裡面第 7 首開始唱，看誰唱得比較熟了、O.K 了，然後這首歌又歸類到誰的歌單裡面，然後下次就變成他要複習那 6 首裡面再加上去的新歌，還有可能後面會有

[36] 紀錄片：紀錄片《陳先生》由宋慧昱、黃詠潔、劉聰、洪育增進行中正大學傳播系畢業製作時所拍攝的紀錄片，主角為三興村日文班的陳珠華阿公。拍攝團隊中除了劉聰之外，其他人皆為鳳梨急行軍的成員。

其他村民來，會有歡唱時間，或是讓其他人唱的時間，就是會因為拍片的關係，然後坐久了、坐滿時間之後，才知道那個兩個小時裡面是有它每個時間該發生的事情，都有安排要發生的事情了。我有想到以前我們都用那兩個小時的時間，然後一直想要問問題，其實我有點忘記他們（日文班）那時候反應到底是怎麼樣，應該也沒有說不好或怎麼樣，可是就是覺得說，其實是有點打擾到他們唱歌進度、練唱時間，或是學習時間。可是他們也不會說：「這時間你們不要來啊！」或是「先不要講這個！」我記得那時候就是很多學生一起去，他（珠華）會邀請你一起唱歌，真的就是相處久了之後，自己才慢慢發現的，因為他也不會講，你才會發現：「喔！好像這個時間不太適合。」或是也不是劈頭來就要一直訪問，那時候都還沒有很熟，然後你一來就要訪問，反而是跟他相處久了之後知道這邊的生態（宋慧昱，2018/07/27，訪談紀錄）。

雖然宋慧昱是在後續拍片的歷程中才更加瞭解村民的生活型態等，但隨時地修正與反饋卻也是田野過程中的必要階段，也讓她更加瞭解什麼時機點最適合拜訪村民。透過這種反覆修正與反饋的歷程，才有機會達到黃顯淨所說的發展：

我覺得應該要把這些資料整理起來給他們……就是其實把成果做出來給對方也是一個負責的義務，對啊我們去找他們採訪，然後可能也可以透過這樣子過程有一些發展吧（黃顯淨，2018/11/15，訪談紀錄）！

透過製播過程中的技術反省、田野過程中的省思與反饋，伴隨著不斷修正己身的田野調查方法，更可以讓整個廣播的歷程與眾不同。不再只是做完節目就沒有了的火花，反而有更多值得醞釀的故事等待急行軍們採集。而除了上述反思之外，這些過程中成員們還有哪些與村民之間的關係延續與互動呢？

第三節 我與村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一般課堂作業或校園媒體的採訪，大多只是一次性的「消費」關係，即使是強調公共新聞的模式，學生也可以只是因為議題或報導而進入社區，未必能和居民有更親密的互動（管中祥、洪育增，2018）。如此一來，從關係的維繫層面來看，學生與受訪者的關係屬於單向、一次性的，當作業完成、結束後，大部分的學生就不會再回頭與受訪者聯繫關係了。雖然常見的採訪守則中，並沒有針對「後續維繫」進行客觀的評價與規範，但該如何做才不會造成受訪者的困擾呢？該怎麼做才能達到如前面章節中宋慧昱所說的「雙向互動」關係呢？

當我們探討這部分的問題時，其實應該追本溯源地討論到學校和地方社區之間的關係，尤其建校近 30 年間，對學生們來說大抵是 4 年到 6 年之間的短暫停

留，但學生們生活的每一天，也是村民們日常中的每一天，這 30 年以來累積了多少美名與臭名，也攸關著每一個學生個體與村民之間的互動，像是郭育伶就這麼認為：

> 我覺得那也跟長期下來這個學校的學生，跟村民的關係很有相關啊！因為之前訪問也有聽到說，以前其實可能學校跟村民會更密切的，例如說學校辦什麼活動，然後都會邀請村民去參加，然後村民也很喜歡就是三不五時地往學校跑，然後知道一些學校什麼活動啊、資訊，都是有的，可是現在就沒有這件事情。然後有時候就像跟雜貨店大姊聊天，或是跟早餐店的老闆娘聊天，也會聽她們說、就是她們也會詢問我們：「啊！學校最近有什麼活動啊？」然後「現在學校的狀況是怎麼樣啊？」也會問一些我們在學校生活的事情。我就覺得說，以前可能學校跟社區的互動也許是更密切的，就在建校初期的那幾年，可是後來漸漸地變得說學校跟村子好像慢慢走成兩個平行的空間，然後村民就是想要知道這些事情，就可能要透過詢問我們，但可以感受到他們很想、其實也蠻想知道說，學校現在的這些事情。就覺得好像變成說，現在這個是真的走成了兩個不同的平行的空間，然後大家各自在做各自不同的事情，就好像沒辦法被歸類說我們都是住在同一個三興村的同樣一個群體……因為像剛剛說的，就是村民可能都會覺得說：「啊學生都是怎樣啊！」就蠻多負面的觀感的，對啊可是就是因為我自己不只代表我自己，也是代表了整個大學的學生這件事情，所以我可能也會很容易地被劃在那個學生的地方，然後有很多蠻深刻的標籤、或者是印象在他們心裡，然後就會覺得說那個好像是一個很難突破的隔閡感吧（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有些根深柢固的刻板印象其實是累積多時的，但是當鳳梨急行軍們瞭解這些狀況之後，又能做哪些改變與維繫呢？

> 我們可能四年後也要離開啦！可是就我而言我覺得，我好像也不只是代表我自己、就是我的名字。就像我跟村民講我的名字，可是我覺得我的名字也不一定會被記得，或者是說幾年後、我可能畢業好幾年如果沒有回到這個地方，我可能就會被遺忘。但我覺得我可能會被泛指這個中正大學的學生、這個身分欸……就像是我聽到的是另外一個阿伯，那阿伯不是之前說傳播系的人找他演戲，然後就讓他在太陽下很久還沒有便當吃？對啊，或者是說開車、騎車很快啊什麼的，就是我覺得一件事情就可以很容易讓他們覺得說：「啊！中正大學的學生都怎樣啊！」就會被歸類，因為我覺得他們在這個地方生活然後中正大學就在他旁邊，然後學生會做作業啊什麼的很容易找上他們，或者是有些生活空間其實是一樣的，然後他們應該也會蠻習慣這種來來去去的感覺。就例如做功課的來來去去，我覺得我自己

也可能會是一個來來去去的角色吧！因為我也會畢業，可是我都會覺得說我可能代表的不只是「我是育伶」這個人，可能在他們眼中也會是個「中正大學的學生」這個角色，可能會是更鮮明的。然後我在那邊跟他們聊天啊什麼的，我覺得他們可能都會覺得說：「啊！中正大學的學生怎麼會來跟我們開講[37]啊？」什麼的，或是「啊！人也真好啊！然後會來給我們關心啊！」就是感覺會對他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吧！就相比那種放鴿子、不給便當吃啊、然後騎車很快很吵鬧啊等等的，就感覺能夠試著扭轉一些這些想法吧！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時候、到珠華家唱歌遇到那個陳阿伯，然後那阿伯就會說：「啊！你們中正大學都怎樣啊！」那個態度其實並沒有很好。可是久而久之我們不斷地去打擾他們之後，他的態度其實改善許多，然後也會覺得說：「啊！我們鳳梨急行軍跟他們（中正其他同學）是不一樣的。」對啊，所以一開始也會覺得說中正大學給他們這些印象，然後會有一種罪惡感吧！雖然不是我們做的，但會覺得說我們學校來了之後啊，然後可能影響到了他們的生活。或者是說一直這樣消費村民，然後讓他們就是感受很差，等等的，就有一種身為中正大學的原罪、那種學生的原罪的感覺。可是我覺得就是感覺自己就要更努力地去讓他們覺得說，中正大學學生的面貌不只是這樣吧！然後也希望能夠帶動更多人去思考這件事情。就是像我也會跟我身邊的朋友說，就是藉著跟他們分享田野的一些事情，然後也讓他們知道說：「噢！我們現在居住的空間不只是有我們，還有一群村民，然後他們可能有時候怎麼看待事情的？」或者是說他們有什麼樣的歷史文化啊什麼的，就是也會試著影響到身邊原本對村子漠不關心的這一群同學。因為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說：「啊！原來那邊住著一堆村民，然後長得跟學校附近不一樣！」等等的，然後有時候聽到一些負面說詞的時候也會影響田調的心情，可是就覺得說自己要更努力吧！然後也不要讓自己變那樣的人……其實後來都還好，因為也知道反正自己也不是那樣子啊（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從個體的身分出發，試著扭轉村民們的既定印象，不僅是郭育伶一人在實踐的方向，更是鳳梨急行軍長期以來透過每個個體、逐漸累積出來的成果。當試圖扭轉學校與地方社區之間的緊張關係之後，又該如何回歸到個體與個體之間，維繫學生與村民之間的情感及交流呢？尤其，鳳梨急行軍不希望村民只是幫助自己完成工作的「工具人」，從戲劇工作坊以來便進入村莊，從交朋友、請益開始，透過田野生活與村民長期互動，希望能保持長久的關係(管中祥、洪育增，2018)。那麼廣播節目製播結束後，急行軍成員又該如何看待與村民之間的關係維繫呢？甚至應該如何做呢？對黃釋賢來說，受訪村民就像是「鄰居」一般的存在，因此關係的維繫存在於日常生活之中，這也可以應用在與其他村民的互動上：

[37]開講（khai-káng）：台語「聊天」之意。

如果說平常看到他會跟他打招呼、然後他可能就會記得你，有你這個人。因為如果是次數很少，然後每次都花很長的時間，他可能還是認為你是要來做功課的。如果是每天都一個打招呼、一個眼神，我覺得可能就會比較像是一般人的互動。因為之前在做三姓公廟那個期末作業的時候，我跟村子裡早餐店的老闆就是這樣子。其實到現在我已經沒有去找他做功課了，因為他知道的事情我都已經問過了，可是我每次去買早餐的時候還是跟他打招呼，然後跟他聊天，就還是一樣平常的互動，也不會說特別刻意去找他買早餐，我覺得一開始是刻意去買早餐，可是後來是買到變習慣，畢竟很近、然後東西也很便宜這樣子，然後我會跟他聊天，他們看到我也會跟我閒聊一下這樣子（黃釋賢，2018/08/07，訪談紀錄）。

以日常生活做為起點、鄰居般的相處模式作為半徑，劃出一道道屬於學生及居民之間情感維繫的圓圈，減緩村民被「消費」的不悅，並且建立更多的信任關係。而這一套方式，回歸到人與人的相處上，其實也是如此，黃釋賢繼續解釋說到：

其實這種日常的這個小舉動我覺得可能會比刻意去找他聊天，還要好。我覺得人都差不多吧？譬如說我如果每天都跟你打招呼，然後每天跟你喇賽幾句，跟另外一種情況相比，另外一種情況就是我可能沒有很常找你，不過我每次去就找你聊很久，那種感覺應該是不一樣。因為每天都有一個熟悉感，久而久之我會覺得你這個人很熱情啊、或是很有笑容之類的……我覺得我每天都在做這件事情（打招呼），所以我就不會覺得說要刻意去認識、做認識這件事，因為我每天都在做啊！如果說為了認識而刻意去做認識這件事的話，我會覺得好奇怪喔！我都沒有想到說畢業之後怎樣，因為那是另外一回事吧（黃釋賢，2018/08/07，訪談紀錄）！

從生活中體現「認識」的真諦，而非透過作業或是相關的活動才做接觸，成為了黃釋賢與村民相處的指標，甚至是進一步地「把村民當作自己的鄰居」，也讓黃釋賢屢次從村民身上感受到溫暖：

我覺得像我去當兵當完回來，之前大學的時候買早餐的那個阿姨，她也認識我，然後阿松[38]的那個老闆娘也還知道我，所以我都覺得好像也不用特別去跟他講什麼，或者是挖他什麼東西，就是他也知道你這個人，他也會還記得我喜歡吃什麼，真的！我覺得很厲害！阿松的老闆娘在我當兵回來的時候，那時候我去買吃的，她還問我說：「啊你怎麼回來了？」我那時候沒有說我回來念書，那時候我說我回來打球，她說：「噢好！」結果之後她就問說：「啊你好像怎麼每天都在這邊？」我就說：「沒有啦，我回來念書這樣子（笑）！」我覺得其實好像他們都會記得，如果說你常跟他們……譬如說買東

[38] 阿松：全名為「阿松的店」，為三興村裡的快炒小吃店。

西跟他們聊一、兩句，久而久之你就會跟他認識。所以那個認識不是說你一定要去他家幹嘛，可是可能他知道你、你知道他，然後基本的一些瞭解這樣子（黃釋賢，2018/08/07，訪談紀錄）。

從日常中維繫情感關係，除了可以透過打招呼的方式之外，還包括買賣互動，而在這過程中，許雅如認為「雙向」的互動才是情感維繫的關鍵：

其實我們後續的關係，我們都是靠消費或者是去聊天，像洪媽媽早餐的話，我們就是有空就會找時間去。像這學期比較少啦！就是之前在做那一集的時候，就我們只要有經過，我們就會到那個洪媽媽早餐店去，就是吃個早餐之類的。之前有幾次是這樣，不然就是如果經過的話，我們就會去洪媽媽早餐店去吃，就是去吃一下早餐。然後像雜貨店大姊的話也是，就是有經過的話我們才會就是……就是比較平常啦！反而就不是特別去找雜貨店大姊、找她聊個天，而是就是可能經過，或是剛好有要去那附近的話，雜貨店大姊她坐在雜貨店外面，我們就會湊過去坐在她旁邊，然後跟她就是打個招呼……互相來往才會建立這段關係，那如果就是都只是單方面的話，我覺得這段關係是建立不起來的。所以我也覺得我不會感到說就是沒有常去就會對不起，就是經過的時候會打個招呼，我覺得就是很平常的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許雅如，2018/07/25，訪談紀錄）。

尤其與雜貨店大姊的情感維繫對許雅如與郭育伶而言更為重要，除了有起初被拒絕錄製廣播的經驗之外，她們也認為，必須讓村民從生活中認識她們，並且輔以多次的拜訪，讓彼此逐漸產生朋友般的情誼：

我那時候覺得說，好像要再更多次的去拜訪雜貨店大姊，就不能說我們做完這集廣播之後我們就不去找她，那你那樣才是真正的目的性啊，就是我們就只為了去找她就做了這集廣播，然後我們就走了，我覺得那樣才會讓她更加深我們是有目的這種感覺，那也是我們的揣測啦！但是後來我就跟許雅如說，就是我覺得好像要三不五時常常去找雜貨店大姊、跟她聊天打招呼，就算是閒聊也好，就是想要改變這樣的局勢。因為被拒絕錄廣播那時候就其實蠻尷尬的，她態度轉變的蠻明顯的，然後我們就會很擔心說，怕會被覺得說「有目的」這件事，所以我們覺得好像是要平常的時候，其實就三不五時地去找她聊天，然後才可以讓她覺得說我們其實不只是一次去找她錄廣播、錄這個《育兒經》，而是我們其實平常的時候也都會去跟她拉近關係這樣子……我們那段時間都比較常去找她，就到村子裡晃晃的時候，或者我們做下一集廣播的時候，我們遇到她還是會跟她閒聊幾句再走。以至於我上次走踏的時候，有特別去雜貨店那裡跟她聊天，就是那時

候有特別就是跟她介紹說：「欸我們是鳳梨急行軍，帶這些人來認識！」然後比較特別的就是找她聊一下這樣子(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尤其許雅如與郭育伶的這般維繫，也確實讓鳳梨急行軍拓展了更多的人際網絡，並且能讓村民們瞭解急行軍深耕地方的意念與想法。而對黃顯淨來說，村民們就像是好朋友般的存在：

就是好朋友，可以互相幫忙吧！因為假如說我現在是住在這裡嘛，然後有一些事情像我找房子，我就會去問他們之類的，或者說他們要租房子我就會幫他們、幫翁雀阿嬤在臉書發文嘛，或者說阿公他們有什麼手機的問題，我就可以幫忙一下。就是或者是說對朋友的事情你都可以對他們做，然後或者是說從其他的社區拿了很多香蕉，然後就拿去給阿公他們，因為我自己也吃不完這類的，就是好朋友。然後我覺得就是即便說可能不會就是常常敲臉書，就是像大學生的朋友，或者是說有網路世界的朋友，但就是也還好，不會因此而阻礙很多。因為我也有很多朋友就是你不會一天到晚跟他聯絡，但是你們還是關係不錯啊，那我覺得其實大概就是這樣子吧，就是跟他們（村民）也是這樣子吧（黃顯淨，2018/11/15，訪談紀錄）！

這也正如宋慧昱所說的，雖然這群老朋友並沒有手機，但在情感上卻也有與老朋友一樣舉足輕重的地位，透過生活上的互助與幫忙，也更能加深情感的維繫與扶持。同樣覺得村民像是好朋友般存在的，還包括黃釋賢：

最近一次再去找他（李伯）就是，因為我想說慧昱的畢製紀錄片是拍三興村的人，然後就跟他蠻有話聊的，就想說那時候要在學校首映嘛，然後我就因為剛好家裡有拿到酷卡，我就寫上他的名字，然後邀請他去。雖然他最後沒有去啦！不過我覺得也是至少他知道我，知道說欸我們、我跟他的關係，就是算好朋友這樣子。而不是說我一直去挖他那邊的歷史然後什麼，算是我自己的一點回饋吧……然後畢製首映之後，我隔一天還是隔兩天又再過去就說：「欸！那天怎麼沒有過來看？」就還問他說：「那你要不要看？因為我有買光碟。」我就問他：「什麼時候帶過來給你看？」這樣子……算還不錯的朋友，我覺得應該可以這樣講（黃釋賢，2018/08/07，訪談紀錄)。

「好東西互相分享」也正是朋友之間的情誼與概念，而在這過程之中，為了讓廣播不只是廣播，讓鳳梨急行軍所做的事情能有更多的發酵，每一位成員心中對於情感維繫的看法也有所不同。除了從「身份」上的轉換進而到改變自己的用語、說話方式等，也會在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拉近與村民的關係。而對於這一整套與村民相處的經驗與方式，郭育伶也認為相當具有發展性：

> 我覺得這是可以延續下去，就例如說我們鳳梨急行軍如果繼續支撐下去，那這樣的經驗、或者是這些過程啊，然後這些方式，其實也是可以一直持續下去的。它會是一個……我覺得我期待啦，它會是一個延續的過程，而不是隨著人的畢業然後就斷了，或者是說就是就停滯不前之類的（郭育伶，2018/08/07，訪談紀錄）。

廣播製播結束後，每一個階段產生的迷惘或許未必能得到解答，但卻在過程中不斷修正了成員們的田野調查能力與方式，甚至進一步找到了更多值得省思的方向，這些養分也將成為後續發展的能力之一。

第六章 結論

在上述章節的討論中，我們從認識、交流、信任、廣播製播等環節循序漸進地開始，乃至於最後的——製播結束後的省思，在這些歷程中交錯討論著每位受訪者看問題的角度，以及對於田野現場第一時間的反應，甚至是事後的想法與反饋等，皆可以從中發現較資深的成員與較資淺的成員之間的差異，然而這之中並沒有孰優孰劣，反而依附於每位受訪者不同的個性與人文關懷，各自產生了獨特的解決方法與想法。因此結論的部份我們可以分為三部份進行討論，分別是與鳳梨急行軍發展出來的田野調查方法有關的內容，以及回過頭來看，鳳梨急行軍的廣播製播藝術行動和校方、在地之間產生了什麼樣的對話與交流，還有最後一部份關於研究者的研究後記與反思。

第一節 鳳梨急行軍的田野調查方法如何形成

在前面的章節內容中，我們發現鳳梨急行軍的成員們洞察到在田野現場該如何自我定位、進行語言轉譯，甚至是認知到該進場還是退場，以及從村民的生活脈絡中理解守時的意義等，這些有趣的關鍵發現可以被歸納為成員們的田野調查方法，因此在本章節中我們將分為「鳳梨急行軍田野調查的方法」以及「田野現場停看聽」這兩部分進行探討，從這 6 位受訪者的經歷與行動中找出屬於鳳梨急行軍發展而來的方法。

一、 鳳梨急行軍田野調查的方法

在不同的田野現場中，隨著田野參與者擁有不同的背景、思考脈絡、個性等，也能發展出不同的田野方法，因此本章節中所要統整、歸納的方法，也僅限於這 6 位鳳梨急行軍成員與三興村之間的互動經驗，而這一套方法的特別之處也正是如此，正因為鳳梨急行軍是學生組織，並非校內的研究或學術單位，使得學生與村民之間的互動關係更為多樣化、更具可看性，也更能看出這套田野調查方法的獨特性。

若以分類來看，我們可以將成員分成兩組，一組為黃釋賢、黃詠潔組成（以下簡稱資淺組），另一組為黃顯淨、宋慧昱、郭育伶、許雅如四人組成（以下簡稱資深組）。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組成員之中，「參與資歷」的層面著實有相當明顯的落差。資淺組的成員們大概都是一進鳳梨急行軍即參與廣播節目製播，對於在地的風俗民情、人際網絡尚未熟悉時，即要踏入田野現場採集資料，其實是

有一定的門檻與障礙。甚至即便初期有其它資深組組員引導、帶領，但也因為製播廣播的人員編列不足，導致許多時候資淺組的成員們必須學習如何獨當一面，也因此，在第一階段「現身」部分的狀況與問題大多發生於資淺組，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代表資深組從未遇過相似的問題，只是當資深組踏入田野現場時，在所有遇到的問題中，或許因為先前田野經驗的累積，使得「現身」部分的問題比例就會相對降低許多，或者困擾的時間並不會太久，但相對的，卻也在其他層面遇到了不少問題。

像是資深組較易進行「開拓人際網絡」的嘗試，但卻也在嘗試的過程中發現，即便先前累積了不少對於三興村田野現場的經驗，但是當真正地面對「如何開拓人際網絡」這項挑戰時，並非克服心理障礙、現身問題等即可，更多時候是必須見機行事地融入對方所呈現的生活、思考脈絡之中，當機立斷地瞭解此時該做什麼事，該進一步談到錄製廣播的部分？還是先多做一些基礎調查與認識？這些需要被判斷的問題與內容，都是資深組的成員們必須在與新認識的村民們開口聊天、互相認識之際，邊談話邊思索的方向，看似簡單，實則不易。而這般的溝通與思考模式其實也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像是當我們與新朋友初次見面時、或者從事服務業時、進行業務推廣時，對於談話的敏感度也必須較高一些，才有辦法找出相處之道的蛛絲馬跡。因此，即便對於大多數成員來說，田野調查的方式並沒有固定的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又簡稱為 SOP），但是從上述的經驗中，研究者簡單地歸納、整理出了以下一套方法，如（圖 5）所示，這 6 位成員進入田野時，大部分是依循著以下的方式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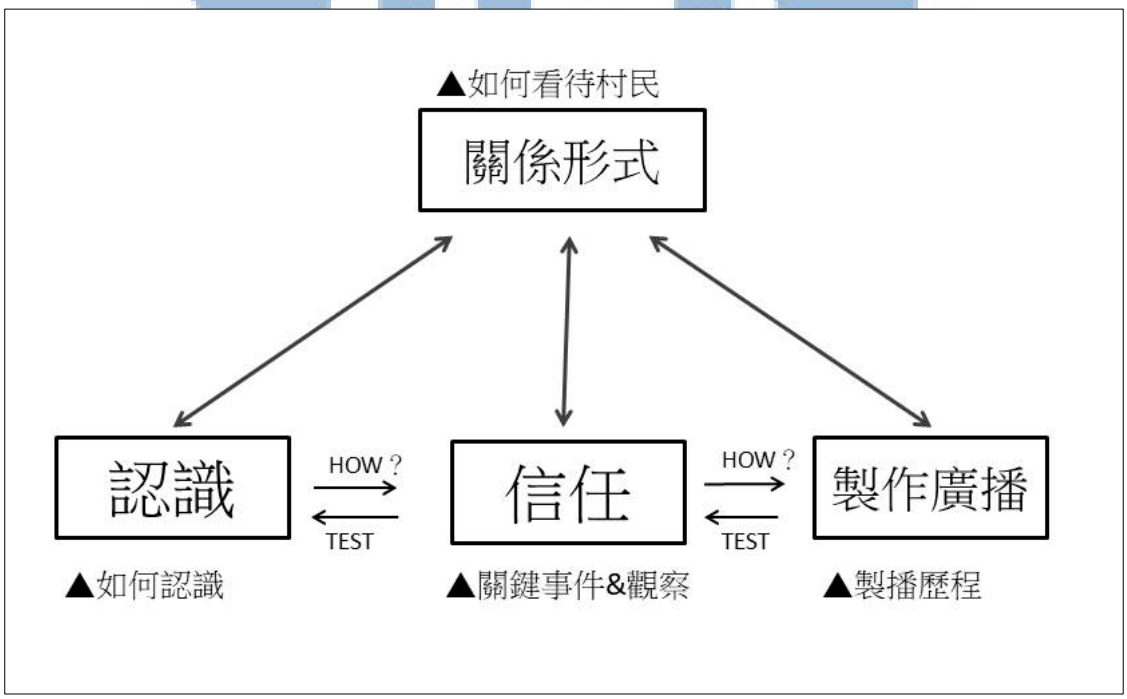


圖 5：鳳梨急行軍廣播製播田野調查方法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我們可以將鳳梨急行軍製播廣播節目時所進行的田野調查方法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認識、信任、製作廣播、關係形式，從「認識」開始時，到底該如何認識呢？在此階段就要回顧先前所述的內容，除了「依循舊人脈」之外，像許雅如、郭育伶是透過「海撈」的方式認識陌生村民，或者像是宋慧昱帶著黃詠潔、黃釋賢藉由具體的一張大合照照片，循線找到陌生村民。但是「認識」了之後，又要如何讓村民與成員們之間產生「信任」呢？在這個階段中除了成員們要盡可能地「現身」、讓村民瞭解什麼是鳳梨急行軍，再來則是透過一些關鍵事件的發生與觀察，才有辦法更加確認村民對於鳳梨急行軍的瞭解有多深刻、彼此的互動關係為何，更重要的，必須參與村民的生活之中，瞭解村民們所感受的環境與日常為何，才有辦法在這些互動的過程中取得對於彼此的信任。像是許雅如透過和早餐店洪媽媽之間的互動與言談，逐步認定早餐店洪媽媽將她們當作是「朋友」。或者像郭育伶認為珠華阿公與學生「唱歌同歡」的歷程也是一種朋友般的互動，甚至像是黃釋賢慢慢發現李伯不再把他當作客人，而是像朋友一樣地邀請他喝茶時可以「自己來」，這些互動過程都是透過參與村民的生活才得以瞭解到的。

而當成員們要從「信任」進階到「製作廣播」時，由於成員們討論之後發現器材要盡量地簡化才有辦法深入到村民的生活當中，並且讓村民覺得參與廣播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因此整個製播歷程強調的是「戶外錄音間」的概念，成員們必須隨機應變地拿出身上的錄音器材進行錄製，無論是在村民的家裡還是戶外。也因此「收音技術」是「製作廣播」的歷程中最容易被克服的問題，反倒是如何運用常民化的語言讓村民們瞭解該集廣播的意義，並且願意說出自己的故事，以及如何在錄製的過程中擷取主題的重點，掌握田野現場的方向等，成為了這個階段的重點。而上述三個部分——認識、信任、製作廣播也都和「關係形式」之間有著動態的呼應與回饋，在「關係形式」中，學生如何看待村民、與村民進一步地互動，反而是一種針對廣播節目、田野調查活動進行的檢討，並且回頭檢視廣播結束至今的日子裡，如何和村民們繼續維繫關係，達到鳳梨急行軍的初衷——和村民做朋友。

因此，透過這些過程的演變，我們可以發現這一套田野調查方法不僅是從左而右、順向進行的，在這過程中其實還有一些突發狀況，導致這套方法有可能在從左而右發展的過程中，需要不斷地倒回上一階段，因此每當要進入下一個階段時，其實正是對於上一階段的檢視，像是進入「信任」階段時，同時也是檢視著成員們在「認識」階段的過程與準備是否充分，或是在「製作廣播」階段，其實也是試驗著成員們和村民之間的「信任」與「認識」階段是否有充分的瞭解。像是宋慧昱原本以照片尋人的方式找到了阿月，認為彼此應該有足夠的認識與信任基礎之後，談到錄製廣播時卻發現阿月羞於參與，並且認為自己「不會講話」，反而找來了好友彩鳳與李伯協助錄製。又或者是像許雅如與郭育伶，原先認為和雜貨店大姊已經有基本的認識，彼此之間應該是有充分的信任基礎，可以進一步進行廣播錄製，但是卻在提出廣播邀約時發現彼此的信任基礎其實並不厚實，也需要再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理解。甚至是像黃釋賢、宋慧昱搭檔製作廣播時，原

先認為已經和李伯談好時間與內容了，卻在錄製當天發現自己被放鴿子，對於彼此的認識、信任基礎也重新有了不同的體悟，也在之後的反思歷程中產生了不同於世俗既定的「守時」想像。

而在這之中最微妙的關係莫過於「關係形式」與其他三部分之間的互相的呼應。以許雅如為例，由於當時和郭育伶搭檔進行廣播時，兩人與田野關鍵人物洪媽媽一直維繫著良好的互動關係，等到許雅如自己要製作《小時夢想 & 小學(求學)時之日常生活〈下〉》這集節目時，反而透過洪媽媽的牽線，找到了適合的受訪村民。不同的關係形式，也能有助於產生再製廣播的契機。當這所有歷程有可能由左至右順向發展，同時又由右至左地反覆檢視上一階段的歷程時，研究者發現「關係形式」其實也能讓成員與村民之間進行更深入的瞭解。

正如第四章後半段章節所描述的內容，許多成員們在廣播製播結束後依然與村民保持友好的互動關係，而這些關係的維繫也讓成員們更進一步的「認識」、「信任」、「製作廣播」。舉例來說，像黃釋賢在廣播結束後仍然與李伯維持鄰人般的互動，在這些互動的過程中他更加瞭解如何與李伯相處、李伯的興趣與喜好為何等，即便後來黃釋賢沒有再製播廣播節目，但是卻也在製作課堂期末報告的歷程裡對李伯有更深刻的認識與互動。或者像是宋慧昱，後來的她著手於拍攝與珠華阿公、三興村日文班有關的紀錄片，也在拍攝的過程中更加瞭解村民們的習慣與生活。甚至是像掌握田野調查訣竅的黃詠潔，因為與葉仔寮的雜貨店阿嬤熟識、關係維繫，使得她要在葉仔寮裡找到同樣具有日本打工經驗的阿英阿嬤、秀碧阿嬤，不再是一件困難的事，更能因此重新向其他村民「認識」、「信任」、「製作廣播」。每一階段的歷程都並非空穴來風，也並非單向地移動，反而是錯綜複雜、動態影響著，也讓成員們與三興村村民之間的情誼更加緊密。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透過這些成員們的經驗，鳳梨急行軍能逐漸發展出來一套在製播廣播節目時的田野調查方法，這套方法並不是單純地線性發展，反而在每個環節中具有更不同的火花，甚至會發現在知識上、態度上，每個個體有著不同的發展面貌，包括：如何向村民學習？如何尊重村民的生活？如何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反覆地向既有的知識求證及拓展視野？在這過程中，成員們必須考慮田野現場的狀況，並且將自身的經驗不斷地累積，甚至在每一個階段中有都有各自需要克服的難題，以及影響個人最為深遠的事件，所有經驗的總和，才能歸納、統整出這一套專屬於鳳梨急行軍與三興村之間的田野方法。也因此，當回到每位有機會參與田野現場的個體身上時，綜合上述成員們的經驗與反饋，另外一個我們必須要思考的問題是，在田野現場還有哪些要注意與面對的呢？

二、 田野現場停看聽

在田野調查的現場中，由於常常需要面對各式田野狀況的是參與者本身，因此本研究從上述成員們的經驗中，整理出以下的狀態，如（圖 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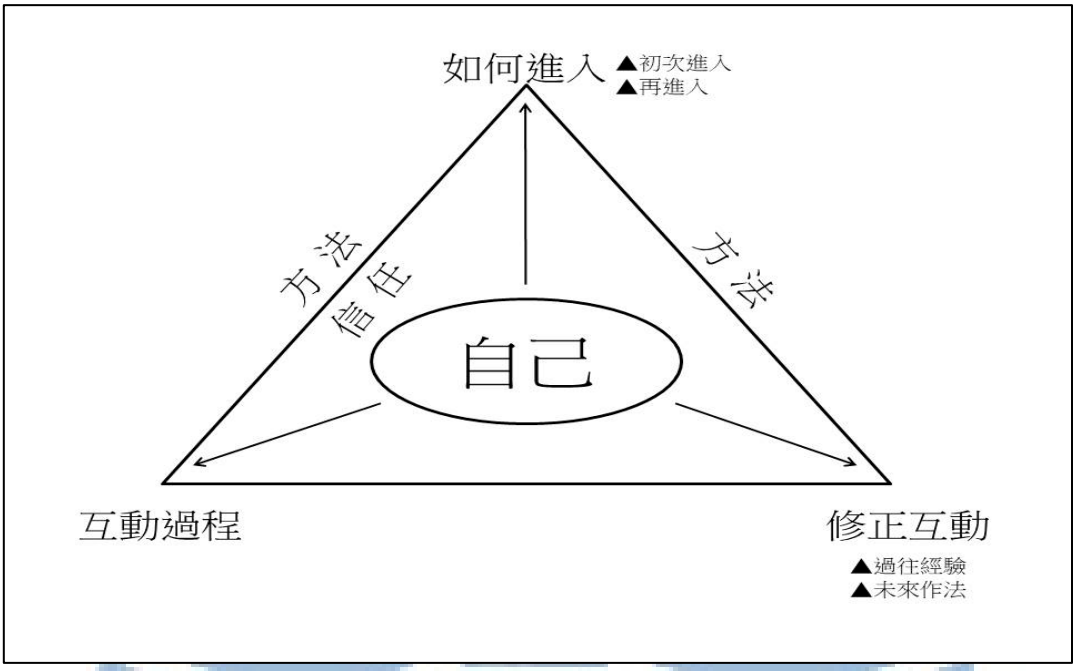


圖 6：參與者在田野現場的方法產生及過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尤其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發現，田野調查的歷程中，無論是性格、經驗還是個人背景知識所致，總有一些時候會遇到讓人不知所措的狀況，當突發事件發生時（例如：被拒絕訪談等），又該如何因應及面對呢？而當一切的田野行動以己身的主觀感受為前提出發時，我們可以將田野行動分為三種，分別是：如何進入、修正互動以及互動過程，其中，「如何進入」又分為「初次進入」以及「再進入」，「修正互動」也分為「過往經驗」以及「未來作法」。無論行動者本身是「初次進入」田野現場還是「再進入」田野現場，每次所產生的「互動過程」與「修正互動」的方式都會有所不同。在「互動過程」中，會產生一套「方法」及「信任」，讓行動者下一次回到田野現場時的門檻更低，甚至更加容易融入田野現場中。像是成員黃詠潔起初沒有太多的田野調查經驗，不知道該如何在田野現場「現身」與「自我定位」，但是卻在逐漸摸索的過程中，透過其它較為資深成員的陪伴，找到了「不用說話也能從旁觀察」的自我定位與方式，並且在使用這個方法的時候讓村民們逐漸熟悉她的出現，對她產生信任感。

而「互動過程」不僅與「如何進入」的歷程產生關連，更與「修正互動」的階段產生互相依存的關係，尤其「修正互動」中又分為「過往經驗」以及「未來作法」，代表著當行動者進行「互動過程」時，其實也在累積自身經驗的同時能夠瞭解到如何運用每一個已發生的當下，堆砌為「過往經驗」，並將這些經驗應

用於「未來作法」上，讓行動者與受訪者之間能有更適切的互動，同時更提供了一套「方法」，讓行動者懂得下次「如何進入」田野場域之中。再以成員黃詠潔為例，當她從其他較資深的成員身上學會如何找尋田野關鍵人物時，慢慢地把這個方法堆砌為自己的經驗，並且當自己要進入葉仔寮找尋陌生村民進行日本打工經驗的訪談時，將這套方法拿出來使用，也讓她成功地在新的田野調查區域裡找到符合廣播條件的阿英阿嬤與秀碧阿嬤。又或者以成員黃釋賢、宋慧昱為例，當他們在後續與村民的接觸經驗裡更加瞭解村民時，也更知道再次進入田野現場、拜訪村民時，應該要怎麼做才會更適切。或者像是個性大而化之的成員許雅如即便被歸類為資深組，但是她卻也坦白在許多時候與不熟識的村民相處時，其實自己內心是會感到焦慮的。因此她試著瞭解村民們聊天、相處時的習慣，並且理解到，在田野現場中「沒有話題可以聊下去」其實是一件無傷大雅的事情，因為這樣的聊天模式其實就是村民之間的相處方式，他們不會在意「沒有話題」的次數與時間長短，反而是有目的想要進行資料採集的學生們，才會有此一焦慮，然而焦慮的產生也實為不必要的。

諸如此類的回饋與反應，讓我們發現，當這套系統回應到鳳梨急行軍的行動時，其實更細緻地來看，每位成員在參與的過程中，在「如何進入」、「互動過程」、「修正互動」這三層的關係裡，有著許多不同的影響。尤其以鳳梨急行軍製播廣播的歷程來看，許多成員並非一次性地完成廣播節目即遠離田野現場，反而在後續的製播與行動中，才又在田野的場域完成行動的同時，更加認識自己，瞭解己身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克服被婉拒時的不自在、苦尋無受訪者的緊張感、甚至是待在田野現場的焦慮感等，而這些每個個體所要面對的困難，也在急行軍內部一次又一次的聚會中不斷地被討論，甚至是透過己身的探索，才找到解決的方法。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透過鳳梨急行軍的行動來看，無論是找到一套在田野現場進行調查的方法，還是克服主觀在田野現場的緊張與不自在等感受，最佳方法即是「多方嘗試」，多次的走入田野現場，才有辦法準確地抓到真正的恐懼與害怕，並且對症下藥、找出一套屬於自己的田野方法。甚至這樣一套紮根研究的精神，也因為成員們組成的不同，讓許多的探討更為多元與有趣，也正如紮根理論創始人之一的 Anselm Strauss 所認為的——社會世界裡事件的發生、進行以及吾人的經驗，都是不斷在萌生中的（Strauss & Corbin,1990/徐宗國譯，1997：27）。藉由這些不斷萌生的差異與經驗，找到田野的方向。

第二節　急行軍如何形成大學與地方的橋樑

透過上述章節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種以田野調查、製播廣播節目、媒體近用的方式，搭建了一座獨有的橋樑，連繫並促進大學與地方之間的知識交流、人際交流，甚至是歷史建構，建構一套屬於大學所在地、獨一無二的庶民文化歷史，而回到本研究的問題意識與核心——急行軍在三興村進行田野調查時的發現與經驗，以及中正大學與三興村之間的關係，透過鳳梨急行軍的行動中，又能窺探到哪些面貌，並且在大學與地方之間進行互動與交流呢？

過去，在世界局勢下產生的高等教育型態影響到亞洲地區的相關發展，甚至也讓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有了連帶的影響。而在這些影響之下，也使得中正大學於焉成立，扮演著地方大學的角色。在這歷程中，中正大學與其他大學一樣，爭取著政府部門所推動的高等教育相關計畫，並在建校近 30 年間也有不同的發展與面貌，但是即便校內整體環境與師資等資源有著顯著的正向提升效果，對於所立足的三興村又有哪些互動關係呢？中正大學的部分課程與服務學習等活動不外乎與在地社區有所連結，但是進行完一次性的課程與活動之後，帶給村民們什麼樣的觀感與感受呢？或者這些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資料與內容是否有進行完整的保存呢？是否也有將這些成果整理後反饋給村民們呢？研究者對於上述的提問都是存疑的，因此反觀這一整套從設計、執行到回饋的歷程，其實也是鳳梨急行軍進行田野調查時的核心，成員們的核心價值與認知即是——村民們沒有義務陪鳳梨急行軍做廣播，鳳梨急行軍做的廣播節目也不應該打擾到村民。因此在這個前提之下，田野調查的互動才有著許多反思的歷程。

而在前些章節中，成員郭育伶提到，在田野調查時觀察到村民們對於校園事務的好奇，村民們想要瞭解座落在住家隔壁的大學內發生了什麼事、想要參與大學的活動，但卻往往沒有相關的資訊，或者是對於中正大學的學生們存在著一些既有的負面印象，其實都是建校近 30 年間逐步累積而成的。若要藉由鳳梨急行軍的介入破除這些刻板印象與互動關係，其實是有困難的。但是從民眾劇場時期開始累積的田野調查成果與關係維繫，卻也讓這些難以被破除的事物一一地得到緩解的可能。就像郭育伶、許雅如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遇到村民們稱讚說：「中正大學的學生真好，還會來給我們關心。」或者認識雜貨店大姊時也被稱讚鳳梨急行軍做的歷史保留行動很好，這些稱讚與回饋，也逐漸在村民們的日常生活中發酵，就像郭育伶認為在日文班唱歌的陳阿伯起初對中正大學學生的印象也沒有很好，但是在鳳梨急行軍成員們的屢次拜訪、參與活動之下，也從陳阿伯的態度轉變上看見扭轉的契機。

綜觀而論，鳳梨急行軍所採集、紀錄的這套歷史並非與大學裡的學生無關，反而是學生們生活周遭的一切、求學歷程中的特別回憶與印記，並且在許多生活的細節裡，不再只是單純地生活習慣上的不同，反而能從這些差異中，發現村民與學生之間生活文化型態的不同、對於土地依存感的不同等。學生與在地村民不僅共同腳踏著同一塊土地，呼吸著同樣的空氣，更多時候是彼此的生活相互依存

著、影響著，而每一個個體的生活與成長確實並非孤獨的，而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產生著許多悲歡離合。這些透過民眾參與建立的過程，將可以讓居民有機會去省視彼此的關係、成長經驗，從而產生或增進相互認同（管中祥，2003）。村民們不僅從錄製廣播的過程中共同參與了歷史的紀錄，也能更加地認識、瞭解鳳梨急行軍。透過這樣的視角我們可以發現，中正大學與學生們所處的位置並非「他方」，而是真正的「地方」，也唯有互相認識與理解之後，才有辦法達到共好的境地。

在這些一來一往的田野調查、廣播製播過程中，或許容易感到氣餒、自我懷疑，但在這反覆與自我經驗、他人經驗對話的歷程裡，成員們發展出來的反而是更多的經驗累積與判斷標準，讓他們能乘著這股力量，邁向不同階段的發展。而這些對話的經驗裡也包括了鳳梨急行軍每周固定的例會時間、讀書會等活動，讓彼此之間有更多經驗足以參照、累積知識的深度與廣度。

我們也可以發現，除了平時軟性的閱讀、討論等活動持續地進行之外，在製播廣播的過程中所累積的關係形式、情感關係，無論是朋友般的互動、還是鄰居般的關照等，都會影響著成員們再度回到田野現場製播下集廣播節目時，加深、加廣對於該位村民的理解，因此在田野方法中「關係形式」所累積的情感，其實對於其他階段的效果是相當顯著的，也更能影響著和村民之間的互動關係，而這些互動關係不僅包括廣播節目的製播，還包括：完成其他課堂期末作業、紀錄片拍攝、甚至是與社區發展協會共同著手的社區課程等，無論是與剛認識不久的村民接觸，還是既有人際網絡中的村民互動，都能在前一章節提到的方法歷程中不斷加深、印證對於村民的認識與理解的範圍。

而不同於其他組織培力的方式，鳳梨急行軍的發展是相對較為多樣且多變的。這除了與鳳梨急行軍從「民眾劇場」轉型為「廣播製播」的歷程有關之外，也包括從「校內組織」獨立而出成為「學生社團」的身分轉變，這些變化也攸關著資源的多寡，以及組織的規模。在沒有校內組織相關課程的支持之下，鳳梨急行軍也相對的必須藉由參與社團招生活動等方式打開知名度、讓更多學生瞭解社團的屬性與本質，相較於在校內組織課程支撐下每學期有 30-50 位學生參與鳳梨急行軍的戲劇演出，當鳳梨急行軍獨立為學生社團至今平均每學期大概招收 1-2 位新社員，縱使不算太多，但卻也是鳳梨急行軍足以獨自負荷的範圍。而過往所奠基的田野調查基礎與人脈也沒有白費，反而是從這些基礎再發展其他可能，而要往哪些面向發展、如何發展，也都是成員們共同討論出來的，就像廣播製播時期一樣，雖然沒有一套成熟的方法，但大夥兒卻也從實作中學習、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一套因應方式，並且輔以每周的例會討論、每學期的讀書會討論，將這些實作的基礎堆砌成知識的堡壘，統整、歸納大夥兒的想法與方式，反而能更有系統的將這些方法傳承下來。就像成員宋慧昱、黃顯淨所說的，在民眾劇場時期遇到關於田野調查時的問題其實到廣播製播時期依舊存在，但也因為找到了克服的方法，使得過程中即便參與有些人畢業、有些人新加入鳳梨急行軍，卻也能遵循著這些方法與人脈產生不同的收穫。

縱使方法的累積與傳承是緩慢的、需要摸索的，但這樣的速度卻也恰如其分

地像是與三興村村民之間的互動一般細水長流，無論未來是否能有效地讓三興村村民與中正大學師生之間產生更多地瞭解與認識，讓中正大學與三興村之間有更多共好的相處，但至少這個累積的過程是緩慢又具有成效的，村民們開始知道什麼是鳳梨急行軍、鳳梨急行軍在做什麼、代表什麼，而學生們也開始認知要瞭解三興村、進行相關的採訪報導時，可以找鳳梨急行軍「指路」，未來也還有更多的機會產生互動。

鳳梨急行軍製播廣播節目《急行軍講東講西》時所發展而出的一套田野調查方法不是唯一的出路，它代表的是一種獨特的互動關係與模式，即便這一套方法未必能長久地適用於三興村與中正大學之間，甚至更無法推展到其他區域「大學與地方」之間的互動，但這是一套從三興村這塊「土地」長出來的方法，並且在現階段中專屬於這裡的人們共同經歷、驗證過的。而這樣的淬鍊與火花，也恰巧驗證了「大學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關係其實並無他法，必須先從認識、瞭解大學所在的位置開始，跟這塊土地上的人、事、物相互理解後，才有機會發展彼此之間的默契與經驗。

第三節 研究後記

正如成虹飛指出的：研究者進入田野的目的，多半是基於自己的研究需要，而不是基於田野當事人的需要（1999，轉引自周平、楊弘任，2007：101）。加入鳳梨急行軍是個偶然，跟著大夥兒進入三興村進行田野調查是出自於好奇、有趣，跟著成員們一起製播廣播更是組織變革的當下階段，自然而然的發展，而把組織內部成員們的心路歷程寫成論文，討論關於田野現場的一切外、內在變化等，更是出自於我自己的需要。除了前述章節內容描寫到的研究原因與角色扮演，對於我這種常常還在「感受自己的感受」的人來說，這段研究的歷程中更多時候的自問自答也正如成虹飛所述——我（的研究）是否也只不過是一位剝削他人、利用他者辛苦的生命（1999，轉引自周平、楊弘任，2007：101）？

研究的過程中，上述這項自問自答的命題，正如我想寫作這篇論文的起心動念一樣——在過往的田野經驗中，我總是不斷地進入一個又一個或嶄新、或熟悉的田野場域，但是當我在進行田野調查時，是否又只是在剝削他人、利用他者辛苦的生命呢？我又該如何在這些田野調查的經驗裡找到一套屬於自己的方法呢？而在我個人以往的田野經驗中，除了「完成計畫/課程方案」的目的之外，同時也會有關於「反饋」的省思，但我不解的是，這些反饋真的是當事人內心所期盼、願意接受的嗎？但是當走在研究之路上的最後幾公尺時，我赫然發現這些問題是不證自明的。因為村民們並沒有在與學生計較這些付出的多寡，所以互動的過程中格外地真摯、令人動容，而倘若他們真心地覺得干擾、想要認真與學生「清算」的話，那往往也能從互動的過程中深刻地感受到這份差別。正是因為村民們無私地願意與身為學生的我們分享故事、如同鄰居般地談天說地，所以我們才能逐漸

地在這些對話的內容中意識到「自己是否過於有目的性？」、「自己是否付出的不夠多？」、「什麼樣的付出才是村民們想要的？」等相關的問題。而在這些問題的茫茫大海之中，有些可以呼應到田野調查的倫理與道德、以及田野過程中的注意守則，有些則是回到行動者本身，回歸一種最單純、「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交流。

儘管這份研究裡有些內容或許看起來過於多慮、小心翼翼，但我想，正是因為這一份謹慎，才能讓鳳梨急行軍與三興村的老朋友們相處融洽至今。相較於其他學者對於田野調查初學者提供的建議——「做就對了！」像我這樣受到鳳梨急行軍成員們的帶領、浸泡在三興村老朋友們溫暖關懷裡的田野調查初學者更想提供的建議是——「感受就對了！」正如我起初踏入三興村時一樣，默不出聲地在一旁觀察，理解著眼前的 A、B、C 三人各是什麼樣的身分與角色、以及感受田野現場的氛圍，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或許如此一來，更能體會到上述章節的內容，像是黃詠潔急迫地想跟村民找話題、聊冬至，但卻收到一碗熱騰騰湯圓的不知所措與感動，或者是郭育伶在村子裡遇到雜貨店大姊時的殷切招呼，又或者像我，每次被販厝區的阿嬤牽著手說：「有空來坐喔！」的時候，眼裡總是熱淚盈眶。有些感受，會逐漸地在觀察中明白。

參考文獻

王振寰（2015）。〈序言〉，楊倍昌、陳政宏（主編）《大學新 5 功》。臺北：教育部。

王榆琮（譯）（2018），神尾文彥、松林一裕（著）：地方創生 2.0。台北：時報文化。

李政賢、廖志恒、林靜如（譯）（2007），Uwe Flick（著）：質性研究導論（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台北：五南。（原著出版於 1989）。

李筱嬋、陳政宏（2015）。〈績效遊戲——大學教育改革計畫的零和賽局〉，楊倍昌、陳政宏（主編）《大學新 5 功》。臺北：教育部。

沈宗瑞（2015）。〈全球脈絡的公共領域之開拓〉，楊倍昌、陳政宏（主編）《大學新 5 功》。臺北：教育部。

周妙穎、賴志軒、蘇慈宜、林育楷、林家驊（2018）。《中正大學原來是「甘蔗田」大學》，取自 https://goo.gl/W86QrH，上網日期：2018 年 1 月 26 日。

周晨虹（2014）。《美國大學社會服務的「大學社區參與」模式評估模式》，《廣州師院學報雜誌》13（5）：60-63。

林本炫（2007）。〈不同質性研究方法的資料分析比較〉，周平、楊弘任（主編）《質性研究方法的眾聲喧嘩》。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林秀雲（譯）（2013），Earl Babbie（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台北：新加坡商聖智學習。（原著出版於 1975）。

林育如（譯）（2012），Geoff Payne 和 Judy Payne（著）：研究方法五十個關鍵概念（Key Concepts in Social Research）。台北：韋伯文化。（原著出版於 2004）

胡元輝（2016）。〈從草根出發 讓溝通民主：台灣社區媒體新浪潮的形成與挑戰〉，胡元輝（主編）《在地翻轉—台灣社區媒體的新浪潮》。台北：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苑舉正（2015）。〈如何讓公民素養陶塑計畫推動高等教育改革〉，楊倍昌、陳政宏（主編）《大學新 5 功》。臺北：教育部。

徐宗國（譯）（1997），Anselm Strauss , Juliet Corbin（著）：質性研究概論（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台北：巨流。（原著出版於 1990）。

張可婷（譯）（2009），Michael Angrosino（著）：民族誌與觀察研究法（Doing Ethnographic and Observational Research）。台北：韋伯文化。（原著出版於 2007）。

張亦惠（2018.10.5）。〈中正大學附近嘉 106 鄉道將移除快慢車分隔島 改置中央分隔島〉，《中國時報》，取自 https://goo.gl/qvXt3n。

許夢芸、陳育含（譯）（2012），Clive Seale，Giampietro Gobo，Jaber F. Gubrium，David Silverman（著）：質性研究方法的實踐（上冊）（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台北：韋伯文化。（原著出版於 2004）。

陳彥錚、劉明浩、陳文學〈2016〉。〈打破學習邊界，塑造鄉鎮價值：暨大通識 R 立方學程的理念與設計〉，《大學通識教育典例》，241-257。大葉大學。

陳婷玉（2018）。〈【投書】「大學社造」不該只是扮家家酒！台灣 USR 的實踐困境〉，

取自 https://goo.gl/2zATba，上網日期：2018 年 9 月 12 日。
游美惠（2007）。〈女性主義方法論：研究的實作與實例〉，周平、楊弘任（主編）《質性研究方法的眾聲喧嘩》。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黃俊傑（2015）。《大學之理念：傳統與現代》。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黃釋賢（2018）。草根行銷期末報告〈談趣聊 X 陳厝寮〉。未公開資料。
楊思偉（2009）。〈《大學的功用》導讀〉，楊雅婷（譯）（2009），Clark Kerr（著）：大學的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台北：韋伯文化。（原著出版於 1993）。
楊萌芽（1993）。《民雄鄉志》。嘉義：民雄鄉公所。
楊慧莉（2015.4.18）。〈改革先鋒 16 廣播創意人艾塞邀您：一起採集生命的故事〉，《人間福報》，取自 https://goo.gl/UCgBcE。
廖嘉展、江大樹、張力亞〈2016〉。〈從社區總體營造到社群跨域治理：埔里生態城鎮轉型案例分析〉。《臺灣文獻期刊》，3（67），85-127。
管中祥（2003）。《全球資本下地方文化的衰退與再生產——以新店地區有線電視地方頻道為例》。世新大學博士論文。
管中祥、洪育增（2018 年，6 月）。〈與村民共舞：中正大學「急行軍講東講西」節目的在地實踐〉。論文發表於玄奘大學「媒體會流風的再思考」2018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新竹市：玄奘大學。
管中祥〈2018〉。《中正大學「積極學生」對本校社會參與及公共責任的看法》。非公開資料。
劉明浩（2016）。〈從參與典範反思社會工作高等教育〉。《社區發展季刊》，155，62-72。
劉明浩（2017 年，11 月）。〈微行動：大學生自主提案的實踐〉。論文發表於臺北醫學大學「自主學習與創新教學」學術研討會。臺北市：臺北醫學大學。
劉明浩（2018，4 月）。〈走向「自主學習」的教學實踐〉。論文發表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自主學習與創新教學大學之社會責任」國際學術研討會。南投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謝恩得（2018.5.3）。〈搶救繁華到衰敗的街區 南華建景系挑戰任務〉，《聯合報》，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3122607。
顏和正（2018）。〈【USR 案例】衝破高教紅海　日本大學地方蹲點〉，取自 https://csr.cw.com.tw/article/40466，上網日期：2018 年 8 月 2 日。
黃顯淨（2017）。《民眾劇場作為大學參與社區的可能與意義：以中正大學鳳梨急行軍為例》。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附錄 1：《急行軍講東講西》第一季至第三季主題簡介：

集數	時 間	主　　題	主 持 人	來　　賓
1-1	2017/3/25	走踏三興村	宋慧昱、陳怡君	無
1-2	2017/4/1	二戰前後的民間生活——民間生活的日本影〈上〉	宋慧昱、許雅如、黃顯淨	三興村居民鄧翁雀阿嬤
1-3	2017/4/8	二戰前後的民間生活——民間生活的日本影〈下〉	宋慧昱、許雅如、黃顯淨	無
1-4	2017/4/15	給我一個鳳梨苗，給你一個陳厝寮〈上〉	藍友謙、洪育增、陳左蓉	三興村居民陳勤學阿伯、王春玉伯母
1-5	2017/4/22	給我一個鳳梨苗，給你一個陳厝寮〈下〉	藍友謙、洪育增、陳左蓉	三興村居民阿美鳳梨的阿美阿嬤
1-6	2017/4/29	我家隔壁蓋大學	藍友謙、施侑杰、王兆軒	三興村居民陳珠華阿公、黃菊阿嬤、陳簡歛阿嬤
1-7	2017/5/6	(重播)我家隔壁蓋大學	藍友謙、施侑杰、王兆軒	三興村居民陳珠華阿公、陳簡歛阿嬤
1-8	2017/5/13	鳳梨急行軍的前世今生〈上〉	陳怡君、邱子芳	鳳梨急行軍畢業校友謝典翰、鳳梨急行軍成員許雅如
1-9	2017/5/20	鳳梨急行軍的前世今生〈下〉	陳怡君、邱子芳	無
1-10	2017/5/27	進來社區的第一步〈上〉	郭育伶、洪育增、林晏安	三興村居民志工隊隊長邱寶秀
1-11	2017/6/3	進來社區的第一步〈下〉	郭育伶、洪育增、林晏安	中正大學傳播系管中祥老師
1-12	2017/6/10	路邊 Club〈上〉	郭育伶、許雅如、田瑀	王哥鳳梨的王哥

1-13	2017/6/17	路邊 Club〈下〉	郭育伶、許雅如、田瑀	無
1-14	2017/6/24	三興村日文班 Live Show	許雅如、洪育增	三興村居民陳珠華阿公、陳簡歛阿嬤、黃菊阿嬤、阿中阿公、陳勤學阿伯、王春玉伯母
2-1	2017/10/23	阿公阿嬤羅曼史&婚姻習俗〈上〉	洪育增、宋慧昱、林晏安	三興村居民陳簡歛阿嬤、台北市居民劉彩芳女士
2-2	2017/10/30	阿公阿嬤羅曼史&婚姻習俗〈下〉	黃釋賢、宋慧昱、黃詠潔	三興村居民李新祥阿伯、彩鳳伯母
2-3	2017/11/6	女強人故事&三興村女性原生家庭成長故事	宋慧昱、洪育增、黃詠潔	三興村居民邱寶秀、玉瓊阿嬤
2-4	2017/11/13	育兒經	郭育伶、許雅如	在雜貨店巧遇的三興村居民阿伯、伯母
2-5	2017/11/20	庄內好滋味——早餐篇	郭育伶、許雅如	洪媽媽早餐老闆娘、雜貨店對面早餐店老闆及老闆娘
2-6	2017/11/27	身體保健知多少	洪育增	惠德診所蘇殷德醫師、三興村居民陳珠華阿公、黃菊阿嬤、陳簡歛阿嬤、玉瓊阿嬤、劉素蘭阿嬤、沈玉釵阿嬤
2-7	2017/12/4	流行歌曲介紹分享	郭育伶、許雅如	三興村居民陳珠華阿公、鄧翁雀阿嬤
2-8	2017/12/11	急行軍講東講西——精彩回顧	郭育伶	無
2-9	2017/12/18	行行出狀元&打工經歷	黃詠潔	三興村居民劉素蘭阿嬤

2-10	2017/12/25	小時夢想&小學(求學)時之日常生活〈上〉	洪育增、宋慧昱	三興村居民柯鄭蔚阿嬤
2-11	2017/12/25	小時夢想&小學(求學)時之日常生活〈下〉	許雅如	三興村早餐店的常客阿嬤
2-12	2018/1/8	選戰風雲序幕	宋慧昱、黃顯淨	無
3-1	2018/3/27	三興村走踏！新路線	許雅如	無
3-2	2018/4/3	(重播)三興村走踏！新路線	許雅如	無
3-3	2018/4/10	(重播)三興村日文班 Live Show	許雅如、洪育增	三興村居民陳珠華阿公、陳簡歛阿嬤、黃菊阿嬤、阿中阿公、陳勤學阿伯、王春玉伯母
3-4	2018/4/17	(重播) 阿公阿嬤羅曼史&婚姻習俗〈下〉	黃釋賢、宋慧昱、黃詠潔	三興村居民李新祥阿伯、彩鳳伯母
3-5	2018/4/24	(重播)女強人故事&三興村女性原生家庭成長故事	宋慧昱、洪育增、黃詠潔	三興村居民邱寶秀、玉瓊阿嬤
3-6	2018/5/1	(重播)庄內好滋味——早餐篇	郭育伶、許雅如	洪媽媽早餐老闆娘、雜貨店對面早餐店老闆及老闆娘
3-7	2018/5/8	(重播)身體保健知多少	洪育增	惠德診所蘇殷德醫師、三興村居民陳珠華阿公、黃菊阿嬤、陳簡歛阿嬤、玉瓊阿嬤、劉素蘭阿嬤、沈玉釵阿嬤
3-8	2018/5/15	(重播)二戰前後的民間生活——民間生活的日本影〈上〉	宋慧昱、許雅如、黃顯淨	三興村居民鄧翁雀阿嬤
3-9	2018/5/22	豐收百工地圖	許雅如	無
3-10	2018/5/29	草藥的秘密	洪育增	三興村居民邱寶秀、玉瓊阿嬤
3-11	2018/6/5	(重播)路邊 Club〈上〉	郭育伶、許雅如、田瑀	王哥鳳梨的王哥
3-12	2018/6/12	(重播)路邊 Club〈下〉	郭育伶、許雅如、田瑀	無
3-13	2018/6/19	行行出狀元—日本打工經	黃詠潔	葉仔寮阿英阿嬤、阿英阿嬤

		驗		的女兒、秀碧阿嬤、秀碧阿嬤的孫子
3-14	2018/6/26	(重播)進來社區的第一步〈上〉	郭育伶、洪育增、林晏安	三興村居民志工隊隊長邱寶秀

製表：本研究參考並增修內容自管中祥、洪育增(2018)